

# 应天 文化季刊

Yingtian  
Culture Quarterly

夏之卷  
2023



# 应天文化季刊

---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吴金山 郭文佳

副主任 高建立（常务） 陈晓明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媛媛 王立 王琰 于志刚

冯志伟 卢忠雷 刘万华 刘海洲

孙佳 吴金山 陈晓明 李卫军

张松林 张富林 李相中 李瑞华

郭文佳 高建立 常丽洁 薛立芳

总编辑 吴金山 郭文佳

主编 高建立 陈晓明

## 目 录

### 应天史话

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婚姻初探（王玉顺·1）

北宋应天府王尧臣家族考（张学勇·12）

### 书院研究

略论北宋应天府书院的官学化历程（王树林·23）

清代朱阳书院相关问题初探（刘万华·33）

### 人文往事

“回头十八年过”——师院琐记（常丽洁·42）

师专小忆（吉茂飞·44）

往日鳞爪（李路晨·46）

### 文学沙龙

水城威尼斯的魅力（孙君恒·48） / 世界杯圆心与审美社会学半径（二）（宋立民·52） / 红榔子（郭婉婷·59） / 山鬼不识字（张隽琪·61） / 忆江南（张晨晨·65） / 一个少年的故事（倪雪莹·66） / 再遇石头（郭梦奇·67） / 诗歌三首（商长江·68）  
继周堂读《庄子》随笔之四：解衣盘礴是说道（庄桂森·71）

### 学术论坛

《论语》尧形象述论（李可亭·74）

程晋芳治《诗》路向探析——以《毛郑异同考》为例（陈功文·79）

祥瑞与改制：汉武帝太始二年更黄金诏书探微

（张建文 解远文·87）



总编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 教学天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校秘书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焦泽智 张松林·97)

## 学子文苑

从“宝历年样”看中晚唐藩镇割据 (薛雯丰·101)

外来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 (务姗姗·107)

## 艺术空间

归德府衙 (高 远·116)

暮春上巳 (孙佳等·117)

人间光影 (李昊宸·119)

## 学术动态

我院教师参加河南省历史学会 2023 年年会 (·22) / 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振宏教授莅临人文学院讲学 (·70) /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文海教授应邀到我院讲学 (·70) / 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应邀为人文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78) / 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孙君恒教授应邀为人文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78) / 洛阳鸣鹤博物馆馆长赵林安先生莅临我院讲学 (·86) / 商丘市首届应天书院与应天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召开 (·96) / 我院历史学专业纳入一本招生 (·96) / 人文学院获批 2 项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 (·100) /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周书灿教授应邀到人文学院讲学 (·100)

# 致人文学院 2023 届毕业生

□ 高建立 院长

亲爱的 2023 届人文学院的毕业生们：

大家好！

时间太瘦，指缝太宽，转瞬又到了栀子花开、榴花照眼的毕业季，纵有万般不舍，千重留恋，但毕竟你们学业完成，要进入社会这个大家庭，这是大学四年寒窗苦读的归宿，也是你们多彩人生的启程。衷心祝贺你们收获毕业学成的喜悦！也衷心感谢你们和你们的老师们为学院发展所付出的努力、挥洒的汗水！

四年前，你们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与畅想，告别家乡、负篋远行，来到美丽的商师，进入人文学院读书求学。寒窗苦读的日子将永远是你们一生值得骄傲的财富，无论是图书馆里的挑灯夜战，春明湖畔的朗朗书声，文秀山巅的豪放抒情，智慧教室的认真聆听，还是网红桥上的绚烂五彩，湖心绿岛的咖啡飘香，音乐餐厅的舌尖记忆，宿舍楼前的樱花飞扬，这点点滴滴都会镌刻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妆点你们难以忘怀的人文往事。

这四年，你们走过了平凡时序中的春夏秋冬，但也经历了极不寻常的四季轮回，你们在大学里翘首期待的第一个春天，本以为是新生活的缤纷盛宴，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陡然降临而打破了你们的诗和远方。本是鲜衣怒马的飞扬青春，却不得不收起汪洋恣肆的激情、野马脱缰的奔放，敛心静气、埋头沉心于知识的求索、书海的徜徉。隔离的日子，也许你们不断翘首窗外的绿树红花；网课的时候，也许你们积满了郁闷压抑，但在共度艰难的时光里，你们也亲身感受到了师友送衣送饭的温暖和亲朋祝福的纸短情长。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疫情肆虐的日子里，也许大家被隔离得心情一地鸡毛，但抛家弃子、奔波于各个隔离点的白衣天使们不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吗？他们如浩瀚宇宙中的点点繁星，黑暗了自己，点亮了别人，那“别人”就有我们！也正是在这星光的闪烁中，我们各位开始变得成熟、活得包容、强了内心、大了格局！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无私回馈别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谱就了一曲协力抗疫、共度时艰的壮丽凯歌。云开雾散，华丽转身，留下的是一道春山眉黛的清丽风景！

你们这一届同学，在人文学院度过了极不平凡的四年，大家一边抗疫，一面学习，一度愤懑，一路高歌。无论是学院的工作，还是你们的学习，都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最近

两年里，历史学专业被评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今年开始一本线招生，实现了商师历史上零的突破；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优异成绩，经过教育部和河南省教评中心的师范专业认证，深受好评；学院有三门课程被评为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课程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迈上高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连续13年不间断获批成功，在院系级不是绝无仅有，但也高如峰岭；两名同学在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许源哲和张博文是获奖者的姓名。考研成功上岸的比例年年攀升，各种实践创新奖励层出不穷；五一节的汉韵霓裳、游园戏梦，重阳节的登高祈福、雅菊共赏，上巳节的曲水流觞、华服河灯，一次次溢满了校园青春的涌动。这就是你们昂扬奋斗的足迹，也是大家共同拼搏的见证。

当然，我们也有些许的遗憾：一楼125的周末影院还没有正式启动，即将开放的日子，你们却要远行；非遗大展的准备已经完成，在盛大开启的前日，你们离校的列车已经开动；应天书院博物馆，正在积极筹备中，也许来年你们的归来，可以沐浴满满的书院风。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古人送别的赠言。面对即将分别的你们，我也有几句话折柳相赠：

用责任之举温暖家庭，以乐观之情拥抱生活；用梦想之光照亮人生，以弘毅之志超越自我；用宽容之怀融入社会，以感恩之心报效祖国。

此一去，山高路远，再聚首，也许经年。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下一次相见会是何年何月，也许一回眸就是一世，一转身就是一生。

月台的汽笛声带走的是不舍的背影，眼眶里夺目的泪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魂牵梦萦。亲爱的同学们，请你们记住：春风飘荡的日子里，空中的纸鸢是我们的牵念；秋雨连绵的季节里，房檐下的雨滴，是我们望穿的双眼。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无论你们飞多高、走多远，人文学院永远是你们落脚的驿站、心灵的港湾，相离莫相忘，且行且珍惜，“常回家看看”！

Please remember, we love you forever!



## ● 应天史话 ●

## 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婚姻初探

□ 王玉顺



北宋时期，商丘不仅是宋朝的政治中心，是北宋的陪都南京和应天府，而且是北宋的经济中心和教育文化中心，也是商丘在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辉煌的历史时期。<sup>[1]</sup>特别是位于“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成为京东、京东南文人讲学游学的荟萃地，使得应天府尚学之风更为浓厚。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便得此惠泽滋养，学成与此，执教与此。成为书香世家，跻身士大夫之列。在崇尚文治的宋代，成了北宋时期的名门望族。其家族的婚姻选择自然也多与官宦、文人志士有密切关系。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其婚姻多看重才能，具有较高的

政治社会地位，其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也代表着宋代上、中层社会的婚姻观念。

### 一、北宋虞城王氏家族概况

#### （一）北宋虞城王氏的家世

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先祖为山西太原祁县人。张方平为王洙作的《赠给事中太原王公墓志铭》记载：“公讳洙，字希圣。占籍宋虞城。”<sup>[2]</sup> 欧阳修《赠给事中太原王（洙）公墓志铭》中，记载了王洙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和官职情况：“公（洙）应天宋城人也，曾祖讳厚，祖讳化，赠太傅。父讳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葬于应天府虞城县之孟诸乡土山原。”<sup>[3]</sup> 欧阳修《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尧臣公墓志铭》中记载：“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为唐辉州刺史，遭世乱，因留家砀山。砀山近宋，其后又徙宋州之虞城，今为应天虞城人也。…曾祖讳化，某官，赠太傅；妣戚氏，封曹国太夫人。祖讳砺，某官；父讳洙，某官，皆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袁氏，郟国太夫人。妣仇氏，徐国太夫人。…王氏自迁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双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sup>[4]</sup> 苏辙的孙子苏籀，为姑父王浚明作

的《故中奉敷文阁王公墓志铭》更加详细的记载：

“谨按王氏本姬姓，在太原祁县者。八世祖项为后唐辉州刺史。子孙避乱徙居单州砀山，去应天不远，至国朝移家于应天虞城。曾祖讳洙，通守泰州，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讳纯臣，任濮安懿王宫教授，迁河东漕，赠金紫光禄大夫。父讳廷老，任两浙漕左宣奉大夫。公讳浚明，字子家，熙宁八年，以世赏补太庙斋郎。”<sup>[5]</sup>

从以上资料看，应天府虞城王氏，自山西祁县迁徙到虞城县，至王尧臣为七世，皆葬在今虞城县古王集乡一带。

### （二）北宋虞城王氏的兴盛

虞城王氏一世为唐朝末年辉州刺史（佚名）。

二世王塤，资料缺失。

三世王厚“高隐不仕，藏书甚富，以道德教乡里，以惠施人”<sup>[6]</sup>。

四世王化，赠太傅。王化没有仕宦经历记载，死后追赠太傅。其妻戚氏，追封曹国太夫人。

五世王砺，“赠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司虞生五代屯会，委高贲，从儒者游，习通礼学，州辟从事，始为士族。时乡人正素先生戚君同文聚徒讲业，学者自远方至。仆射府君，戚之自出，著牒门下，以高业取甲科，仕至屯田郎中，名载国策。”<sup>[7]</sup>师从于应天书院祖师戚同文，是戚同文名弟子。承戚氏衣钵，传戚氏之学，其子孙多至通显。太平兴国五年(980)中进士，通礼学，踏入仕途后曾宦游金陵、余杭等，官至屯田郎中。后因子孙显贵，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王砺之妻袁氏，追封郛国太夫人。

六世，王砺长子王涣，宋太宗末年(997)举进士第，仁宗庆历元年(1041)以太子宾客退居南京。嘉祐二年改礼部侍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子宾客致仕王涣为礼部侍郎。涣退归乡里十五年余，因其从子参知政事尧臣言，特迁之”<sup>[8]</sup>。为著名的“睢阳五老”之一，饮酒赋诗，优游陪都。睢阳五老德高望重，在北宋士人心中享有盛名，对于南京应天府来说是一件文化盛事，它是南都文

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次子王洙，字希胜，是王尧臣之父。少年时亲聆宗师戚同文的教导。王洙几乎竭尽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应天府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他不仅是睢阳戚氏学堂弟子，更是应天书院的名师。应天府书院初建，即执教与应天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中服勤词学科的贡举，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墓志》云王洙曾撰《文集》十卷，《备对制策》十卷，但是今皆不传，所存惟诗一句“东湖富泉石”<sup>[9]</sup>。王洙为人高风亮节、有志于道，张方平评其“风调雨顺，凛凛有其节”<sup>[10]</sup>，他的事迹典籍记载的很少，仅可从他的《墓志铭》中对其加以了解：执教书院，育人才良多；在外为官，治理水患，造福一方，赈济饥民，存活百姓为多。等等。王洙卒时年仅五十六岁，张方平为之慨叹：“然才高而位不充，志大而时不与，曾莫展发，殁于中身，命也哉。”<sup>[11]</sup>虽然才智很高但是官位不显，志向高远而时运不济，未曾大展宏图便与世长辞，令人惋惜。王砺四子王渊，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合州刺史，卒赠青光禄大夫。五子王冲，大中祥符七年(1014)进士，知兴国军永兴县，后授武昌军掌书记。通判干州、平州。历知干、洋、泰等州，领南京留司御史台。六子王淑，天圣八年(1030)进士，都官郎，卒赠散大夫。七子王演，天圣五年(1027)进士，殿中丞，赠朝议大夫。八子王洙，天圣二年(1024)进士，尚书吏部郎中，卒赠给事中，特赐谥曰“文节”，官至尚书吏部郎中。王洙少年时就开始舞文弄墨，且诗赋皆能。幼随夫妻宦游，在兄弟八人中，王洙声名最显，学问最为博深。从年轻时起，王洙就以其博学多才而闻名于时。欧阳修在《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墓志铭》中称他“其生始能言，已知为诗，指物为赋。既长，学问自六经、史记、百氏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法、训故……故自其少也，一时名音，无所不学，学必通达，如其专家。臣贤士，皆称慕之，其名声誉天下。”<sup>[12]</sup>范仲淹也称赞他“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通达。绅之中，未见其比。



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sup>[13]</sup>德才兼备、满腹经纶的王洙得到多人举荐，多年在应天府任教，对应天府书院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极大贡献。

七世，最为显赫的是王洙长子王尧臣，天圣五年（1027）状元及第，参知政事，卒谥“文忠”。王尧臣为人诚恳，无所矫饰，知人善任。制词称其“艺文醇深，器识高正”，“智略可以断国论，经术可以纬皇猷”。王尧臣为人诚恳，无所矫饰，知人善任。与弟纯臣相友爱，世人以之为孝悌的榜样。<sup>[14]</sup>为官三十多年，呕心沥血，于政治、军事多所建树，一股清流，一派正气，清正廉洁的精神和道德思想，依然是当今清正廉洁的典范。王洙次子王纯臣，景祐元年（1034）进士，至和元年（1054）以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岷州，任转运使等职。王洙第三子王钦臣，“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欧阳修，修器重之。用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还，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sup>[15]</sup>早年以文章贄见文坛领袖欧阳修，深得器重。后以父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神宗熙宁二年（1069）赐进士出身。继承了父亲嗜古和藏书，为北宋著名的藏书家。王洙四子王陟臣，仁宗嘉祐六年（1061）探花，官检正中书吏房、刑房公事，权发遣两浙路提点刑狱。神宗元丰四年（1081），为度支判官，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右司郎中。王涣之子王稷臣，毕仲游《尚书郎赐金紫光禄大夫毕从古行状》中提到：“太子宾客王涣，亦老居睢阳，其子稷臣又请为宋城令，得请。”<sup>[16]</sup>张方平曾举荐王稷臣充任台阁，他在举状中称王稷臣：“性资通敏，操守方正，和而不杂于俗，清而不滞于物，器识才望，士之高选。”<sup>[17]</sup>张方平认为王稷臣不仅品行端正，而且明敏有才，无论是器识还是才名都是士大夫中的杰出人物。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乙未，“以度支郎中王稷

臣直集贤院，充颖王府翊善。”<sup>[18]</sup>七世中其他还有王献臣、王梦臣、王辅臣、王彦臣、王陟臣、王麟臣等十三人均均为进士第。

八世，八人中进士第，数王纯臣长子王廷老最优。王廷老字伯馥，皇祐五年（1053）进士出身。历官太常寺太祝、光禄寺丞，户部度支司郎中、两浙路转运副使等，官终朝散大夫、知虢州。宋高宗时，追赠左宣奉大夫。

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自太原祁县迁入虞城后，重视教育，家族意识较强。特别是应天书院滋养了王氏几代人，至王洙、王尧臣二代人发展达到鼎盛。北宋时期可谓是“芝兰玉树生庭阶”，枝繁叶茂、荣耀显赫。张方平在为王洙作的墓志铭中称“（王砺）实生才子七人，六登进士第。世绪炽昌，遂为睢阳冠冕。”<sup>[19]</sup>欧阳修在王尧臣墓志铭中言：“宋多名家，王实大族。”<sup>[20]</sup>苏辙评价王陟臣是名臣之后，学问上能传承家学，艺文优异。梅尧臣作为仁宗时期文坛巨匠，评价王洙家为“衣冠今盛族，兰玉旧家声”<sup>[21]</sup>，“盛族”，“旧家”指的是上代有勋劳和文学地位的家族。欧阳修为王洙作的墓志中把王氏的祖先追溯到周代王室：“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室。公世可考，实太原人。后家于宋，遂以蕃延”，<sup>[22]</sup>古人在为别人作墓志时，往往要为墓主追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欧阳修把周王子作为王家的祖先，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家族历史悠久且有身份尊贵，虞城王氏乃宋朝名家大族。虞城王氏家族在应天府可谓首屈一指，而且在北宋也享有一定的名气。自王砺之后“五代三十六进士，一状元一探花”<sup>[23]</sup>，俱有声于时，实属罕见，虞城王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代表。虞城王洙、王尧臣世家载入《中国文化世家》一书，称之为“王砺之后，他的子孙们代有隽秀，多登台阁，甚至位列公卿”<sup>[24]</sup>。

## 二、虞城王氏家族姻缘关系

宋代虞城王氏家族，是名门望族，文化世家，婚姻非常注重门第，其家族子弟所娶诸妻中多数为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门当户对的家世大族之

女。其女也大都嫁给其门户“不甚显大”者必为进士或“佳士”。朱长文在为王涣女儿（蔡挺的妻子）作的《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志铭》，评价“当是时，王氏澹以显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逦进联起”<sup>[25]</sup>。以门第择婚，成为大多数宰辅家族的共识，且大都在此后的仕宦中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才能，使家族地位迅速提高。

### （一）与戚同文家族

戚同文（903～976），宋州楚丘人（今商丘市梁园区北至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南一带），五代至北宋初年著名的教育家。生于唐朝末年，幼孤，以孝闻。睢阳学舍（应天书院前身）创办人杨恣的学生，勤励读书，不满一年，毕诵《五经》。值五代丧乱，绝意禄仕，思见天下统一，遂名同文。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在睢阳学舍办学，聚徒教授，门人登第者五十六人，王砺亦在其中。尚信义，好施与，不言人短。藏书甚富，好为诗。卒年七十三，门人追号坚素先生，一作贞素先生。

#### 1. 王化是戚同文的女婿

南通大学王树林教授在编著的《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中，记载了王砺的父亲王化的情况，“王砺的父亲王化是应天书院宗师戚同文的好友（当有姻亲关系），王砺是戚同文名弟子，承戚氏衣钵，传戚氏之学，其子孙多至通显。”

由王砺的儿子王洙口述，王钦臣记录整理的《王氏谈录》记载：“闺门之内，承顺父母颜色为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人极为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尝与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悦而退。”<sup>[26]</sup>

王庸敬编纂的《王氏通谱》中记载：“化，厚子。本名匡化，以避宋太祖，讳去上一字。晋天福元年丙申生。为齐州从事，宋景德二年乙巳九月卒，年七十，葬娄子邨石邑界之原。赠太傅。配戚氏正素先生女，封曹国太夫人。子一砺。”<sup>[27]</sup>

据此，王砺的父亲王化是应天书院宗师戚同文女婿。印证了王树林教授推断的王化与戚同文“当

有姻亲关系”的说法。

#### 2. 王尧臣的女儿嫁戚同文的曾孙戚师道

曾巩《戚元鲁墓志铭》记载：“戚氏宋人，为宋之世家。当五代之际，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乡里、远近学者皆归之者，曰同文，号正素先生，赠尚书兵部侍郎。有子当太宗、真宗时为名臣，以论事激切至今传之者，曰纶，为枢密直学士，赠太尉。有子恭谨恂恂、不妄言动、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为之志其墓者，曰舜臣，为尚书虞部郎中。元鲁其子也，名师道，字元鲁。”<sup>[28]</sup>这段记载，叙述了戚元鲁的家世。父亲是戚舜臣，祖父是戚纶，曾祖父是戚同文。

《戚元鲁墓志铭》又载：“元鲁初以父任为建州崇安县尉，不至。以进士中其科，为亳州永城县主簿，又为楚州山阳县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官，年三十有五。娶陈氏，内殿承制习之女；再娶王氏，参知政事文宪公尧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鲁死，而元鲁盖无兄弟。”<sup>[29]</sup>这里，简单记述了戚师道的情况。娶妻陈氏，是内殿承制教习的女儿；陈氏去世后又娶妻王氏，是参知政事文宪公王尧臣的女儿。

《王尧臣墓志铭》对王尧臣子女也做了这样的记载“女二，长适校书郎戚师道”。<sup>[30]</sup>

### （二）与刘敞家族

王砺是刘敞的外祖父。

虞城王家与刘敞的亲戚关系，因《刘敞传》开篇“刘敞字原父。举庆历进士，廷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其内兄也，以亲嫌自列，乃以为第二”<sup>[31]</sup>，而为众人所知。但一些人望文生义，认为王尧臣是刘敞的妻子的哥哥（大舅哥），实为谬误。汉郑玄在《仪礼丧服经传并记》注：“舅之子”，“内兄弟也。”此“内兄”应为“舅父的儿子”<sup>[32]</sup>，即表哥。

刘敞世为吉州临江人，宦宦世家。曾祖刘典，赠大理评事。祖父刘式，为“明经科”进士第一，尚书工部员外郎，赠户部尚书。刘式的五个儿子都考取进士，相继在朝廷做官，成为举世惊叹的进士

五兄弟。刘立之，字斯立，是刘式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刘敞的父亲。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历任福州连江尉、梓州中江知县、泸州知州、荆湖北路转运使等职，终于益州路转运使任上。

欧阳修为刘立之作《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墓志铭》记载：“夫人临沂县君王氏，赠尚书右仆射砺之女，先君若干年卒。”<sup>[33]</sup>《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注释为“赠尚书句：砺之女，王砺之女。王砺，《宋史·孝义传》载：王砺事母甚谨，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至屯田郎中。”<sup>[34]</sup>

刘攽有诗《在王四十处见舅氏所录外祖与日本国僧诗并此僧诗书作五言》，按照清朝王庸敬《王氏通谱》，王四十是王钦臣。“外祖与日本国僧诗”即王砺的《赠日本僧寂照礼天台诗》，此诗刘攽的舅氏王洙，让儿子王钦臣录于《王氏谈录》。刘敞、刘攽有多篇为王氏家族作的诗，如《读岷山诗寄献八舅龙图》《寄上濠州舅氏》《九月十四日于雍熙院为舅氏斋设作》《闻伯庸再安抚涇源》《贺王纯臣》《王仲至使北》等。

### （三）与蔡氏家族

#### 1. 与蔡廷家族

王砺的二个孙女先后嫁蔡挺。

宋城蔡氏“世以明经仕进”。蔡挺祖父蔡陟在宋真宗朝以吏能闻名，仕至国子博士；其父蔡希言官至泗州军事推官，蔡家也算得一个有地位的家族。虞城王氏与蔡家的社会地位基本相等。

蔡挺（1014～1079），字子正或子政，宋城人。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第。熙宁五年（1072），拜枢密副使，熙宁七年（1074）年，因有疾上书请求罢官，特罢为资政殿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元丰二年（1079）薨，享年六十六，赠工部尚书，谥曰“敏肃”。

张方平作的《蔡挺墓志铭》记载：“娶王氏，礼部侍郎致仕涣之女，赠汝南郡夫人；继

室，礼部之弟殿中丞演之女，封睢阳郡夫人。”<sup>[35]</sup>

朱长文作的《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志铭》详

尽的记载了蔡廷妻子的家世：“王氏之先原祈人也，其七世祖徙家虞城，遂居睢阳。曾大夫讳化，追位太傅，太傅生屯田郎中讳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太师生礼部侍郎讳涣，赠工部尚书，夫人侍郎之子也。”<sup>[36]</sup>

蔡挺的子辈一代，得益于蔡挺等人中进士入仕途，联姻范围得以扩大，联姻家族的官职相对增高。等。<sup>[37]</sup>

#### 2. 与蔡齐家族

王涣的孙女（王献臣女），嫁给了蔡齐的儿子蔡延庆。

蔡齐（988～1039），字子思，莱州胶水（今山东平度）人，大中祥符八年状元。官至参知政事。蔡齐才华横溢、不畏权贵、多谋善断，范仲淹为他写墓志铭，欧阳修为他立传，宋仁宗在其去世后赠兵部尚书，谥号“文忠”。历史上状元“跨马游街”的殊荣，始于蔡齐。

蔡齐与王尧臣同为宋朝名臣，并在一起共事。蔡齐向皇帝赵祯推荐人才道：“臣还有两个人选，王尧臣可为提典刑狱公事，而赵概可为提举常平公事。这两人皆为天圣五年进士，博学多才长于政事，可供官家挑选。”

《宋史·蔡齐传》载：“始，齐无子，以从子延庆为后。既歿，有遗腹子曰延嗣。延庆字仲远；中进士第，通判明州。”<sup>[38]</sup>

蔡延庆（1028～1090），字仲远，北宋莱州胶水（今平度）人，蔡齐之侄，过继给蔡齐做儿子。蔡延庆早年考中进士，历任明州通判、京东路提点刑狱、开封府推官等职。曾任河中府知府，秦凤等路都转运使。因熙河之战功绩突出，蔡延庆升任成都府知府兼兵马都钤辖，成为镇守川西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后又历任开封府知府等官职，62岁时卒于吏部侍郎任上。

范祖禹为蔡延庆的妻子作的《梁国郡君王氏墓志铭》记载：“夫人王氏，应天府虞城人。曾祖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妣某氏，某国太夫人。

祖涣，尚书礼部侍郎致仕，赠银青光禄大夫。祖妣某氏，某郡太夫人。考献臣，殿中丞。妣李氏，陇西县君。王氏，南都望族。。。年十七适东莱蔡公。公讳某，初出继伯父参知政事文忠公。”<sup>[39]</sup>

#### （四）与赵概家族

赵概的长女嫁给王洙的儿子王力臣。

赵概，字叔平，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他原名赵裡，后因梦中有神人在名册中书写“赵概”二字，遂即改名。官拜观文殿学士，赠太子太师，谥康靖。

天圣五年（1027），赵概和同乡王尧臣，殿试同时高中进士一甲，王尧臣高中状元，赵

概则是第三名探花，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史上的一段佳话。

王尧臣和赵概即是同年，又是同乡，同是虞城古王集人。《容斋随笔》载：“予家藏王淞《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二年有旨送两制看详，于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衔，其中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概…礼部郎中王洙。”<sup>[40]</sup>《续资治通鉴》载：“癸亥（初三起居舍人，知制诰吕溱，工部郎中、知制诰兼侍讲、史馆修撰王洙，一同任命为翰林学士。旧制，翰林学士六人，当时杨察、赵概、杨伟、胡宿、欧阳修一并为学士，于是给杨察加上承旨头衔，吕溱、王洙又同时授予翰林学士，王洙是第七员。”<sup>[41]</sup>王洙和赵概一并为翰林院学士。王尧臣、王洙、赵概同为宋朝重臣，关系甚好。

欧阳修为王洙作的《墓志铭》记载：“又娶齐氏，封高阳郡君。子男五人：长日叟臣，

早卒；次日力臣，太常寺太祝；次钦臣，秘书省正字。”<sup>[42]</sup>

王安石在为王洙之妻作的《高阳郡君齐氏墓志铭》记载：“夫人，故翰林侍读学士赠开府仪同三司王公讳洙之妻，故光禄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钦臣、秘书省著作佐郎陟臣、秘书省正字曾臣之继母也”<sup>[43]</sup>。

王力臣是王洙的次子，字均伯，太常寺太祝、

光禄寺丞。

苏轼为赵概作的《赵康靖公神道碑》记载“女二人，长适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适朝奉

大夫程嗣恭。”<sup>[44]</sup>

#### （五）与苏轼家族

苏辙的女儿嫁给王廷老的儿子王浚明，苏辙的孙子苏籀为王浚明作墓志铭。

以王尧臣为主的王氏家族，宋代是文化世家，在政治、文学、藏书、书法、音律等方面达到甚为辉煌，达到鼎盛。王钦臣、王廷老与苏轼、苏辙二兄弟来往密切，苏轼与王钦臣、钱勰、蒋之奇组合为“元祐四友”，交游和诗，终结为亲戚关系。

王纯臣的儿子王廷老，字伯馥，进士出身。历官太常寺太祝、光禄寺丞，户部度支司郎中、两浙路转运副使等，官终朝散大夫、知虢州（今河南灵宝一带）。南宋高宗时，追赠左宣奉大夫。苏轼和王廷老是神宗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1074）间，在杭州认识的。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排挤，熙宁四年（1071年）调任杭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十月，苏轼奉两浙转运司的命令，到汤村督开盐运河，安营扎寨在兰溪工地。当时王廷老则在杭州任两浙路转运副使，主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在治河工地上，苏轼为王廷老作《画鱼歌》。后来，王廷老知虢州为官，苏轼作诗《送王伯馥守虢》，苏辙《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为王廷老送行。王廷老退休后，苏轼作诗《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元丰八年（1085），苏轼复任朝奉郎，又为吏部郎中，起知登州。二月路过睢阳。退居南都的王廷老藏有赵昌的画轴，苏轼得知后，前去王家赏画。在王廷老家中，苏轼鉴赏赵昌之所画梅花、黄葵、芙蓉、山茶，作《王伯馥所藏赵昌花四首》诗。苏轼还借观了绢本设色、手卷《睢阳五老图》。

王浚明（王廷老的儿子），字子家。南宋初屡为知州历福建转运副使，淳熙初官至司农少卿。仕宦七十余载，历任二十官，官至中奉大夫。

苏辙的孙子苏籀，出自文学世家，领受祖辈薰

陶，故其诗文雄快舒畅，以词华而论，终为尚有典型，代伯父苏过为王浚明作《故中奉敷文阁王公墓志铭》，记载：“某之先伯东坡公，先人栾城公，夙从太原伯敬甫游，嘉祐文安公犹子也。以能出入持节浙部，时弛危弦，以宽瘖瘼。详谛警切见远识防之明，僚友赖焉。以为有不可及者，子家侍旁，冠而缔姻，栾城以妹氏归焉。苏宗五女，伦次季婿也。”<sup>[45]</sup>并详细的记载了虞城王氏家族的情况：“谨按王氏本姬姓，在太原祁县者。八世祖项，为后唐辉州刺史。子孙避乱徙居单州碭山，去应天不远，至国朝移家于应天虞城。曾祖讳洙，通守泰州，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妣徐国夫人仇氏。祖讳纯臣，任濮安懿王宫教授，迁河东漕，赠金紫光禄大夫，祖妣建康郡太夫人吴氏。父讳廷老，任两浙漕左宣奉大夫，妣硕人元氏，所生令人何氏。公讳浚明，字子家，熙宁八年，以世赏补太庙斋郎。仕宦七十余载，历任二十官，阶至中奉大夫。”<sup>[46]</sup>

李如篪《东园丛说》卷下曰“愚幼年尝见先人与王子家同直阁论文。王子家言及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常窃听之，一夕来奔，苏公不纳，而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暨公及第，已别娶，仕宦发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句，正谓斯人也。‘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之句，谓此人不嫁而亡也。……王子家讳俊明，官至中大夫、直秘阁，与先人道此语，时在绍兴三年，寓居于婺州兰溪县之西安寺。王公时已年七十馀，苏子由之婿也。”<sup>[47]</sup>

苏辙为王廷老作《祭王虢州伯敬文》，乃是以“某与弟某”即苏兄弟共同名义作的祭文，其中“轼官吴中”至“民亦少安”，是讲苏轼与王伯敬的交谊。自“事之难知，君以罪废。还家宋都，辙适在是”以后，是讲自己同王伯敬的交谊。而张道所引“遂以息女，许君长子”，即在这一段中。因此，“嫁王廷老之长子者”为苏辙之女，而非东坡之女。王廷老长子，向云无考。偶阅苏籀《双溪集》，有

代伯父苏迟所作《故中奉敷文阁王公墓志铭》中有“栾城以妹氏归焉”。这更无可辩驳地证明嫁王廷老长子者乃苏辙之女苏迟之妹。又云：“父讳廷老…公讳浚明，字子家”，“享寿八十有五”，“仕宦七十余载，历任二十官，阶至中奉大夫”，“赐三品服”。在苏辙诸婿中，王浚明最为显赫。<sup>[48]</sup>

#### （六）与魏廷式家族

王洙的女儿嫁魏廷式的儿子魏舜卿。

魏廷式（公元951年—公元999年），字君宪，北宋时大名宗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魏廷式进士及第，初次任职朗州法曹掾。转运使李惟清举荐他又吏才，任桃源县知县，升将作监丞。端拱初年，改任著作佐郎、通判颍州。淳化二年（991年），朝廷任命他为详议官。他多次提出建议，太宗满意他的精明强辩，升任他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不久，朝廷首次考核朝中大臣政绩高下，太宗皇帝任命魏廷式与枢密都承旨赵榕、李著共同勾当三班，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后来，破格提升他为主客员外郎、判三司都勾院，换任河南东道判官，改任户部员外郎，利州知州。至道初年（995年），出任宋、潭二州知州，由于善于处理官司，深得当地官员和百姓佩服。后又转官吏部员外郎、桂州知州，历任工部郎中。真宗即位后，改任刑部郎中，很快又任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又晋级右谏议大夫、知审刑院，出朝任泾州知州。<sup>[49]</sup>

魏舜卿，大名府宗城（今河北威县）人。魏廷式子。咸平二年为太常寺太祝，宝元二年知华州。咸平二年，其父病卒，以遗恩擢为太祝。<sup>[50]</sup>

张方平为王洙作的《赠给事中太原王公墓志铭》载：“一女归魏氏国子博士舜卿。”<sup>[51]</sup>

#### （七）与晏殊家族

晏殊的女儿一个嫁给王尧臣的儿子王朋老，一个嫁给王洙的儿子王陟臣。

晏殊（991～1055），字同叔，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进贤）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庆历二年（1042）三月，晏殊以刑部尚书、集贤殿

大学士、枢密使加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晏殊在应天府的时候，宋天圣五年（1027），知府晏殊聘范仲淹主管学府，他以育天下英才为己任，培养了大批人才，使应天书院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了北宋最高学府。这一年，应天书院的学生王尧臣、赵概分别高中状元和探花。

晏殊看到优秀的青年才子也会采取嫁女儿的方式来拉拢，最出名的女婿就是宰相富弼了。晏殊素以识人之明见长，那选择女婿当然要使出看家本领事实证明，经他选择的两位女婿均为人中龙凤，尤其是大女婿富弼系北宋名相、三朝重臣，曾三度拜相，是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杨察是晏殊的第二个女婿，敏捷能文，官至户部侍郎、三司使。晏殊去世时，与王氏所生的四个女儿尚未出阁。但从《晏氏宗谱》看，其他四个女婿也是官宦中人晏殊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王朋老，其父是曾任参知政事的王尧臣，王朋老本人仕至中大夫。第四个女儿的丈夫是何友直，于治平四年（1067）进士及第，官至左司员外郎。第五个女儿嫁给了王陟臣，他是晏殊好友、曾任翰林学士的王洙的儿子，嘉祐六年（1061）登进士榜，官至起居舍人。最小的女儿嫁给了熙宁三年（1070）进士的孙杰，仕至直龙图阁。<sup>[52]</sup>

王朋老，王尧臣三子，字大年，宋大理评事，出知兖州，卒赠太中大夫。女一适苏子由侄。<sup>[53]</sup>

王陟臣生卒年不详。字希叔，宋州虞城人。北宋嘉祐六年（1061）辛丑科探花。元丰元年（1078）官检正中书吏房、刑房公事，权发遣两浙路提点刑狱。四年，为度支判官。元祐二年（1087），为右司郎中。<sup>[54]</sup>

#### （九）与仇公著家族

王尧臣的母亲为仇公著的姑妈。

仇公著之祖先原为沧州人，世代在朝廷供职。宋代柳子文作的《宋故定州观察判官仇府君墓志铭》记载：“曾祖讳华，任尚书驾部员外郎，为青州牧，终而家焉。后赠工部侍郎。祖讳永，任尚书屯田员外郎。父讳谅，任国子监丞，累世皆列于朝。王文

安公，君姑之子也。文安公由进士第一参预大政，为宋名臣，封其妣为徐国太夫人。…仇公著由姑表兄参知政事王尧臣遗奏补为太庙斋郎而入仕。”<sup>[55]</sup>从墓志中可得知王尧臣母亲的家世，祖籍为河北沧州人，王尧臣外祖父任尚书屯田员外郎，舅氏为任国子监丞，表弟仇公著为人老成敦厚，“能安于命”，不与世争。因表兄参知政事王尧臣遗奏，补为太庙斋郎而入仕。从宦四十多年，历任德州德平县尉、广州司理、端潮筠三州军事推官、天平军节度推官、监楚州盐税、定州观察判官等较低级官职。“终以不得志，而无所大施”。

王庸敬《王氏通谱记载》：“王洙，配仇氏，妇德顺而正，母道慈以严。初封清源县君，追封南阳郡太夫人，又封徐国太夫人。”<sup>[56]</sup>

《宋故定州观察判官仇府君墓志铭》的墓碑，由柳子文承议郎签书定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云骑尉借绯柳子文撰文，朝请大夫试将作监上护军赐紫金鱼袋王同老书丹，撰写时间为北宋绍圣三年（1096）。王同老即王尧臣的长子。墓碑在山东省青州市出土，现收藏于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中。

### 三、虞城王氏家族姻亲关系特点

#### （一）看重“门当户对”

应天府虞城王氏是文化世家，是北宋最负盛名的望族之一，故其婚姻也非常注重门第。如宋城蔡氏“世以明经仕进”，蔡挺祖父蔡陟在宋真宗朝以吏能闻名，仕至国子博士；其父蔡希言官至泗州军事推官。蔡家也算得一个有地位的家族。正因为这样，蔡挺才娶了礼部侍郎王涣的女儿。当时，王家“寢以显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逖进联起”，与蔡家的社会地位基本相等。家族的姻亲多为官僚大家的子孙或名士，他们彼此之间能够通过姻亲关系相互维护，成为政治上亲密的伙伴，在政治生活变幻莫测、经济基础不稳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缔结“门当户对”的婚姻为家族保持政治地位稳定的又一手段。

#### （二）长辈“志同道合”

也多与同僚、文人志士婚姻结缘。这些人因为“志同道合”而成为僚友，有的僚友本来就是姻亲，有的因僚友而结为姻亲。同年之谊，交往之深，政见之合，仕进的需要，都使得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结为儿女亲家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宋仁宗天圣五年同榜进士，王尧臣和赵概，即是同乡，又是同年、同僚，结为亲家；而赵概又与韩琦、文彦博、包拯、吴育等都构成了亲戚关系。蔡齐与王尧臣同为宋朝名臣，并在一起共事；王廷老与二苏，先为同聊，后结为儿女亲家；王洙的女儿和侄女嫁给蔡挺，蔡挺第三子，娶张方平女；蔡挺第六子，娶范仲淹之孙女，范纯仁女；等等，构成的婚姻关系网错综复杂，互为表亲，互为连襟。所谓的“志同道合”者，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广结姻亲。他们利用血缘关系来巩固既有的政治关系，结成一个个政治集团，在官场上相互提携，彼此帮助。韩琦也曾得到了同年王尧臣的提携。西夏叛乱，韩琦被派往陕西前线抵御，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其部下任福贪功冒进而兵败好水川朝廷追究主帅之责，韩琦罢知秦州。王尧臣此时为陕西体量安抚使，上言：“二人（韩琦、范仲淹）者，皆忠义智勇，不当置之散地”。第二年，“仁宗思其言，乃复以琦、仲淹为招讨使”<sup>[57]</sup>。有了这些同年姻亲的支持，韩琦仕途渐入佳境，成为北宋历史上连相三朝的一代名相。当然，韩琦也经常不遗余力地提携自己的同年。反映了统治阶级为摆脱政治权力的不稳定感而作出的一种努力，最终目的还在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此左右朝政，虞城王氏家族婚姻也参与其中，王钦臣与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辙、苏轼也被列入《元祐党籍碑》。在进行党派势力之争时，相对于党派利益来说，姻亲关系占了上风，宋代上层政治联姻对朝政产生的明显影响。

### （三）祖门“亲上加亲”

“亲上加亲”古代在名门望族里极为常见，名门望族一般有权有势，家财万贯，生活富有，选择

近亲结婚，相互了解，在可信度和忠诚度上相对较高，遇到事情会上下一条心，利用集体力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还有利于家族的强大和稳定。如苏轼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弗，王弗过世后，又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王闰之也做到了“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虞城王氏家族也有这种情况，王砺的二个孙女，也是堂姊妹关系，先后都嫁给了蔡挺。自王化之后，虞城王氏四代人都从师与戚同文，承戚氏衣钵，传戚氏之学，二代结为姻亲，当为中表婚，属世代通婚的类型之一。无论是中表婚、续弦婚、过继婚都是世代通婚的一种形式，形成亲上加亲的关系，目的是增强家族之间的联系，维系家门不坠，为家族更好地发展服务。如王尧臣年长蔡挺11岁，与蔡挺同为应天府人，同时在应天府书院学习。蔡挺与王尧臣本为同乡，二人在书院中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们的交流可能相比其他人更加频繁，由此加深了王尧臣对蔡挺的了解程度。加上蔡挺后来又是王尧臣的姑父，王尧臣安抚陕西之时请奏蔡挺担任自己的秘书一职。这次陕西之行，使蔡挺接触到了宋夏边境情况，王尧臣的防边策略，为此后多次击退了谅祚对北宋的进攻，积累宝贵经验，蔡挺在大顺城保卫战中击败西夏，为蔡挺的提拔做了很大帮助。

### （四）世代“无缘皇室”

通过上述可看出，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主要与宰辅家族、普通官宦世家和文化世家进行联姻，与当时较有名望的地方士族结为姻亲，但是仍旧没有突破阶层的限制，并未与统治阶层的皇室有联姻。

### 结语

宋代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生活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其仕宦生涯集中于宋仁宗一朝。而宋仁宗时期是北宋社会新矛盾的凸显时期，所处时代背景对王氏家族的变迁和兴衰，影响极大。应天书院的文化氛围，科举制度的发展，对虞城王氏家族成员入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王氏后人因此而获得官位，壮大了王氏家族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影

响，同时也为王氏家族的婚姻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虞城王氏家族成员，宋代时期著作、诗词歌赋很多，王洙有文集十卷，不传；王尧臣主持编制的《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刘敞在《王冲墓志铭》中言王冲“喜读书属文，尤长于诗。诗凡千余篇，读之其志可见也。”<sup>[58]</sup> 欧阳修撰《王洙墓志铭》称其“文章千有余篇”，而《宋史·艺文志》别集类著录了王洙《昌元集》十卷；吕颐浩《忠穆集》卷七《跋王仲至诗》：“王仲至诗十卷。仲至名钦臣，世为睢阳人，博学善属文，尤工于诗”<sup>[59]</sup>，王钦臣有《广讽味集》五卷；等等。不知何故，大多佚失不存，对研究虞城王氏家族的历史、文化和婚姻关系缺乏广泛详尽的资料。虞城王氏家族婚姻谨见于传记、墓志铭、王氏通谱所记载，有些来自野史，如与晏洙家族的婚姻关系，有待考证。对虞城王氏家族的发展，有待于开发，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王玉顺，男，1963年生于河南省虞城县古王集乡，王尧臣三十一世孙。本科学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员。

#### 参考文献：

- [1] 郭文佳：《试论商丘在宋代的历史地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第15页。
- [2] 张方平：《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第688页。
- [3]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37页。
- [4]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56页。
- [5] 苏籀：《双溪集》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9页。
- [6] 王庸敬：《王氏通谱》卷七《辉州刺史派世系》，上海图书馆藏，1894年，第2299页。
- [7] 张方平：《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88页。
- [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中华书局2004年，第4468页。
- [9]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5页。
- [10]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688页。
- [11]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89页。
- [12]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46页。
- [13] 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05，第481页。
- [14] 王树林：《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86页。
- [15]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6668页。
- [16] 毕仲衍著，陈斌点校：《西台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04，第264页。
- [17]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10，第690页。
-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049页。
- [19]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10，第690页。
- [20]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56页。
- [21]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975页。
- [22]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46页。
- [23] 王庸敬：《王氏通谱》，卷七《辉州刺史派世系》，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第2299～2363页。
- [24] 王树林：《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86页。
- [2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 [26]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0，第155页。



- [27] 王庸敬：《王氏通谱》，卷七《辉州刺史派世系》，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第2299页
- [28] 启功：《唐宋八大家全集·曾巩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10，第454页。
- [29] 启功：《唐宋八大家全集·曾巩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10，第454页。
- [30]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56页。
- [31]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一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7164页。
- [32] 郑玄：《仪礼丧服经传并记》，学部图书局，清宣统元年（1909年）
- [33]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37页
- [34]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庐陵文钞下》[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35] 张方平：《张方平集》卷四〇《蔡挺墓志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1页。
- [3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 [37] 刘亚龙：《北宋宋城蔡氏家族研究》，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 [38] 脱脱：《宋史》卷286《蔡齐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36页。
- [39] 胡建林：《太原历史文献辑要》第3册宋辽金元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12，第387页
- [40] 洪迈著：《容斋随笔》，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1.07
- [41] 毕沅：《白话续资治通鉴》，长沙：岳麓书社，1997.12
- [42]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47页。
- [43]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临川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09，第3563页。
- [44] 张春林：《苏轼全集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668页。
- [45] 苏籀：《双溪集·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35.12，第209页。
- [46] 苏籀：《双溪集·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35.12，第209页。
- [47] 李如麓：《丛书集成初编东园丛说》，商务印书馆，1937.06，第52页
- [48] 曾枣庄：《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巴蜀书社，2018.03，第30页
- [49]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6933页。
- [5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08，第165页。
- [51] 张方平：郑涵点校《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10，第690页。
- [52] 邹晓春：《北宋大神晏殊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08，第241页
- [53] 王庸敬：《王氏通谱》卷七《辉州刺史派世系》，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第2331页
- [54] 蔺德生，赵萍：《历代鼎甲小传》，北京：语文出版社，2016.09，
- [55] 王华庆：《青州博物馆编，青州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3.12，第222页
- [56] 王庸敬：《王氏通谱》卷七《辉州刺史派世系》，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第2328页
- [57]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6628页。
- [58] 王云五主编，刘敞撰《丛书集成初编 1906 公是集 8》，北京：商务印书馆
- [59] 高志忠，张福勋：《全宋诗补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第74页

# 北宋应天府王尧臣家族考

□ 张学勇

宋代进士，是科举制度选拔的产物，也是科举制度有利的维护者和执行者。进士作为古代社会的精英，自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自五代至国初的王砺，



到王砺之子王涣、王洙等皆登进士第，再到官至相位的王尧臣及兄弟行王钦臣、王献臣、王梦臣等及以后子孙们，多举进士。据统计，王氏家族从第四代到第九代的100多年间，六代共考中进士38人。他们学行并称，孝悌传家。以文学、吏治通显于北宋中后期。这个终北宋一代的显赫的文化世家，与应天书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以后应天书院建设与发展，王氏一门做出很大贡献。

## 一、应天府虞城王氏先祖探源

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王垕，系出自太原。后唐时，为辉州刺史，因有治行，世居太原祁县。王垕

乡避五季之乱，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后又徙宋州，遂为应天虞城人。<sup>[1]</sup>北宋欧阳修写给王尧臣的墓志铭中记载：“公（尧臣）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为唐辉州刺史，遭世乱，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后又徙宋州之虞城，今为应天虞城人也。”<sup>[2]</sup>王垕，字景和，唐光启元年乙巳（885）正月七日生，后汉乾祐二年己酉（949）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五，葬虞城双金邨之原。配张氏，子一，厚。

王厚，字世德，梁开平四年庚午（910）五月二日生，高隐不仕，藏书甚富，以道德教乡里，多以惠施人。宋开宝八年乙亥（975）卒，年六十六，葬娄子邨石邑界之原。配袁氏，字化<sup>[3]</sup>。

王化，本名匡化，以避宋太祖讳去上一字，晋天福元年丙申（936）生，为齐州从事。宋景德二年乙巳（1005）九月卒，年七十。葬娄子邨石邑界之原，赠太傅，配戚氏贞素先生女，封曹国太夫人，子一，砺。<sup>[4]</sup>戚氏贞素先生即戚同文。

戚同文是王砺的外祖父，即姥爷。欧阳修在给王洙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了王洙的曾祖父王厚、祖

父王化、父亲王砺的名字和官职情况。“公（洙）应天宋城人也，曾祖讳厚，祖讳化，赠太傅。父讳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sup>[5]</sup> 南通大学王树林教授编著的《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记载了王砺的父亲王化的情况。“王砺的父亲王化是应天书院宗师戚同文的女婿，王砺是戚同文的外孙，承戚氏衣钵，传戚氏之学，其子孙多至通显。”<sup>[6]</sup> 王洙撰《王氏谈录》记载：闺门之内，承顺父母颜色为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人极为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尝与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悦而退。<sup>[7]</sup> 这段话也证实了王氏和戚氏的姻亲关系。王氏状元王尧臣的一世祖应是北宋欧阳修给王尧臣写的墓志铭中记载的“其六世祖某为唐辉州刺史”，后“徙宋州之虞城”，就是应天府虞城人。

由此可知，王砺的父亲是王化，王化的父亲是王厚，王厚的父亲是王垕，王垕的父亲为“唐辉州刺史”，后“徙宋州之虞城”。

如王垕的父亲是虞城王氏一世，那么王垕就是二世，王厚就是三世，王化就是四世了，王砺王化就是五世了。

## 二、应天府虞城进士家族王氏

### （一）王氏第五代进士（1人）

王砺（957～？）：字汝坚，王化子，王厚孙。周显德四年丁巳（957）七月六日生，事母甚谨。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登苏易简榜进士，仕至屯田郎中。天圣年（1023～1032）正月八日卒，初葬虞城土山邨（cūn）。嘉祐四年（1059）八月十日改葬于宋城县平台乡石落原。以孙尧臣贵，赠尚书右仆射、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崇祀乡贤<sup>[8]</sup>。

王砺踏入仕途后曾宦游金陵、余杭等地。太宗雍熙（984～987）末，由秘书丞知袁州府。真宗景德二年（1005）四月，王砺以职方员外郎知越州，官至屯田郎中。王砺“从儒者游，习通礼学，州辟从事，始为士族。”<sup>[9]</sup>

《王氏谈录》中记有王洙回忆其父王砺，“先

公在金陵、余杭，清夜多作诗，必召吾起草，或属数句。未成且假寐，吾持笔侍侧，往往至中夜不敢退”<sup>[10]</sup>。

王砺配袁氏封郛国太夫人。继张氏茂直女，封兗国太夫人。继孙氏，封莒国太夫人。继毛氏，封崇国太夫人。子八：涣、洙、文秀、渊、冲、淑、演、洙。女一：适尚书主客郎中刘立之<sup>[11]</sup>。

长子王涣，字释之，于景德二年（1005）登李迪榜进士。次子王洙，字希圣又字蓄之，于景德二年（1005）登李迪榜进士。三子王文秀，从释法名元秀，宋勅法慧圆辨大师，塔号：光相。四子王渊，字望回，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登姚华榜进士。五子王冲，字景儒，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登张观榜进士。六子王淑，于天圣八年（1030）登王拱臣榜进士。七子王演，字演之，于天圣五年（1027）登王尧臣榜进士。八子王洙，字原叔，一作字源叔，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登宋郊榜进士。

### （二）王氏第六代进士（7人）

1. 王涣（977～1068）：字释之，王砺长子，王化孙。宋太平兴国二年丁丑（977）十一月日生，景德二年（1005）与弟王洙同登李迪榜进士。历礼部侍郎致仕。熙宁元年戊申（1068）五月十八日卒，年九十二岁。赠尚书，葬归德州宋城之原。初，庆历（1041～1048）末，山阴杜祁公衍谢政，居睢阳，结五老社，吟醉相欢，士大夫高之。涣，时以太子宾客致仕，与斯社其三人，则卫尉毕世长、兵部朱贯、驾部冯平，五老各有社诗传世。归德府城西二里旧有五老祠，明正德中（1506～1521），少保俞琳檄知州袁经建。嘉靖丁酉（1537）圯于水，知州王文琳移建护城堤内，在今西门外一里许，宋钱明逸有五老图诗序，明朱景贤有睢阳五老遗像碑记。清田兰芳有五老祠记，陈履中、查岐昌、陈洛各有诗。

王涣配丁氏，封济阳郡夫人。子九：鼎臣、献臣、梦臣、同臣、正臣、谔臣、稷臣、辅臣、迕臣。

长子王鼎臣，字公器，又时重。宋国子直讲，配丁氏，子二：镇、中立。二子王献臣，于庆历六

年（1046）登贾黯榜进士。三子王梦臣，于天圣五年（1027）登王尧臣榜进士。四子王同臣，宋进士。五子王正臣，字允中。宋宣教郎。配氏，子三：锴、维、严老。六子王谔臣，字君昌。宋吏部侍郎，卒赠中散大夫。配氏，子四：中、汝嘉、甫、汝立。七子王稷臣，于天圣八年（1030）登王拱辰榜进士。八子王辅臣，于天圣八年（1030）登王拱辰榜进士。九子王迕臣，字近之，早夭。<sup>[12]</sup>

丞相祁国公杜衍 80 岁，驾部郎中冯平 87 岁、兵部郎中朱贯 88 岁、礼部侍郎王涣 90 岁，年纪最长的司农卿毕世长，时年已经 94 岁。这五位长寿老人均是“退休高官”且年至耄耋。出于对睢阳五老的敬重，应天府当地一位丹青高手为五人各绘制了一幅全身像，题名《睢阳五老图》，并让五人在图上赋诗。钱明逸于至和三年（1056）为之作序。此画绘制精美，尤其是人物脸部描绘细腻生动，栩栩如生。欧阳修、晏殊、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十八位北宋重量级人物纷纷在画上题诗题跋。

北宋至清末，上百位名人为之题赞，可谓流传有绪，堪称一部国宝级画作。《睢阳五老图》的珍贵不仅在于画作本身，历代名家的题跋在书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该画于民国时期以册页形式被一分为五流出海外，《毕世长像》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冯平像》和《王涣像》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朱贯像》和《杜衍像》藏于黑文耶鲁大学博物馆。

2. 王洙（980～1034）：字希圣又字蓄之，王砺次子，王化孙。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980）十月日生，风调雨顺，凛凛有奇节。登景德二年（1005）李迪榜进士。释褐试校书郎，临江决曹掾。未之官，丁父艰服除，调潍州团练推官。弭水患决，疑狱迁大理丞，知楚州山阳县改丞殿中，详议判刑赐五品服，时天子游心治方，乐闻谏言，命百官转对，洙上便宜十余条，皆见纳用，终屯田郎中。景祐元年甲戌（1034）四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五。著有文集

十卷，《备对制策》十卷。葬宋城石洛之原，张文定公方平志其墓，集贤院学士刘敞撰行状，以长子尧臣贵，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王洙配仇氏，妇德顺而正，母道慈以严，初封清源县君，追封南阳郡太夫人，又封徐国太夫人。子二：尧臣、纯臣。女一：适国子博士魏舜卿。见《宋史·戚同文传·东都事略》《宋史·王尧臣传》及张方平撰本志，刘敞撰本状并欧阳修撰尧臣志，王珪草尧臣封赠制。

长子王尧臣，于天圣五年（1027）举进士第一。次子王纯臣，于景祐元年（1034）登张唐卿榜进士。

张方平《乐全集》载：“公（洙）奋曰：此非吾时邪？起就贤良，举文中高选。”<sup>[13]</sup>“翰林掌邦计，以赞禋礼之勤，故公有夕郎之赠，教忠继志，庆灵用集。”<sup>[14]</sup>

3. 王渊：字望回，王砺四子，王化孙。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登姚华榜进士。试国子四门助教，以宰相富弼奏试将作监主簿，刘敞为草其诰。历合州刺史，卒赠银青光禄大夫。配刘氏，子三：清臣、端臣、宗臣。继周氏。

长子王清臣，宋三班奉职，配氏，子一：迕。次子王端臣，字方叔，宋太常寺太祝，历将作太祝。卒赠太中大夫。配张氏，天章阁待制兼集贤殿修撰，友直四女。子六：述、将、邈、迎、邃、觉。三子王宗臣，字方伯，宋录事参军。配沈氏，子一：迈。<sup>[15]</sup>

4. 王冲（989～1056）：字景儒，王砺五子，王化孙。宋端拱二年己丑（989）生，大中祥符七年（1014）登张观榜进士，得试校书郎，知兴国军永兴县。父丧解官，服除。选于吏部，试判优等，为武安军掌书记，授武昌军。天圣（1023～1032）初，改著作佐郎，知寿州、霍丘，徙蜀州晋源，改秘书丞，知陈留。当是时，章献太后垂帘听朝，中人罗崇勋用事，冲以法绳之，请谒无所听，大姓田滋等由此惧，造飞语以奸利事污冲。太后怒，下冲吏，使中人，杂治之，讯掠甚急，冲义不屈，宁必死，不肯少自下，狱遂不具，然犹坐除名。徙雷州。景祐（1034～1038）

初，上始亲政，尽斥逐罗崇勋等。诸附丽之者亦贬废，言事者多以冲不辜闻。天子亦自识其名，复起为卫尉寺丞，改著作佐郎知越州会稽。康定(1040~1041)初，复为秘书丞，通判干州。未几，通判华州。月余，擢知干州迁太常博士，知洋州。郡故无学，冲为立黉(hong)舍，收其才子弟，得二三十人。亲教养之。由此彬彬然兴于学，与西州等矣。迁屯田员外郎，知泰州，改都官。岁饥，发常平仓以食饥者，凡所活数万人，使者上其治，为淮南第一，赐緋衣鱼符，改职方领南京留司御史台，就迁屯田郎中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受诏未行。嘉祐元年丙申(1056)十一月甲子，以疾终，年六十八。后三年十月甲子，葬于宋城县仁孝乡某里。集贤院学士甥刘敞志其墓。冲生平不妄悦人，虽穷困益坚。于时人鲜所合，而范文正公特知之，数荐于朝。其为政也，兴利若不及，去恶如恐失之。喜读书属文，尤长于诗<sup>[16]</sup>。

王冲配平原华氏，魏太尉歆之后，卫尉寺丞，辑女，淳化元年庚寅(990)生，妇道母仪，称于其族人。封平原永寿冯翊三县君。治平三年丙午(1066)十月丙辰卒，年七十七。熙宁元年(1068)八月庚申合葬冲莹。甥刘舍人敞为之志。刘敞在墓志铭载：“夫人自幼至老，妇道母仪，称于其族人。其族人固当世之所称美，而夫人有加焉，则其贤可计校等级而知也。”<sup>[17]</sup>子三：汉臣，真臣，彦臣。女三：长适大理寺丞尚颖，次适屯田郎中孙珪，三适进士马临。见公是集冲本志，彭城集华夫人本志，华氏冲志，作葉氏，当是缮写之误。

长子王汉臣于皇祐五年(1053)登郑獬(xiè)榜进士。次子王真臣，宋试将作监主簿，出为楚丘县尉，历国子监直讲。三子王彦臣于宝元元年(1038)登吕溱榜进士。<sup>[18]</sup>

集贤院学士刘敞在写给王冲的墓志铭曰：“为道者有言，白则涅矣。刚则缺矣，嗟嗟舅氏。涅而不变，缺而不卷。硿硿其声，矫矫其行。极晦而明，其辱则荣。孰不公侯，孰不耄期。人也天欤，其止于斯。我葬舅氏，悠悠我思。铭以藏之，以写我悲。”<sup>[19]</sup>

5. 王淑：王砺六子，王化孙。宋天圣八年(1030)登王拱臣榜进士，官都官郎中，卒赠中散大夫。墓在城县汴河南原。配丁氏，子四：隣臣，良臣，晋臣，谋臣。

长子王隣臣于宝元元年(1038)登吕溱榜进士。次子王良臣，字唐叔，宋集贤院直讲。三子王晋臣，字明叔，宋应天府推官。配张氏，子一：纪。四子王谋臣，字诚之，宋大理寺丞，雄州机宜，卒赠朝散大夫。配氏，子二：默、汝明<sup>[20]</sup>。

6. 王演：字演之，王砺七子，王化孙。宋天圣五年(1027)登王尧臣榜进士，官殿中丞，卒赠朝议大夫。配李氏，子二：表臣，禹臣。

长子王表臣，宋滑州白马县令，配郭氏，子二：绅、绾。次子王禹臣，宋西京金判，配氏，子二：经、绘。<sup>[21]</sup>

7. 王洙(997~1057)：字原叔，一作字源叔。王砺八子，王化孙。宋至道三年丁酉(997)八月十九日丑时生，少聪悟博学，记闻过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登宋郊榜进士，为庐州舒城尉，坐事免官，后调富川县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荐为府学教授，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擢史官检讨，同知太常礼院，为天章阁侍讲，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成，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士。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伎杂坐。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又徙徐州府。时京东饥，洙诱商出粟，以哺流民，因募其壮者为兵，得千余人，盗贼衰息，有司上其最为京东第一，徙亳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洙学问经术，多识故事。宜在朝廷，复召为检讨、同判太常寺、侍讲，充史馆修撰。拜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至和元年(1054)九月，为翰林学士。至和三年(1056)以兄子尧臣参知政事改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嘉祐二年丁酉(1057)九月甲戌朔，以疾卒，年六十一。累官至尚书吏部郎中，阶朝散大夫，勋轻车都尉，爵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及卒，

赠给事中，特赐谥曰“文节”。以卒之，本年十月辛酉葬于虞城县之孟诸乡土山原。欧阳文忠公修志其墓。为人宽厚乐易，孝于宗族，信于朋友，诸孤不能自立者，皆为之嫁娶，学问复极渊博。自六经、《史记》、百氏之书，至于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训诂、篆隶，无所不通。预修《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制度》<sup>[22]</sup>。皇祐（1049～1054）中，诏撰《大享明堂记》二十卷，又诏修雅乐。著有《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王安石称赞王洙：“显显王公，学问文章，族为大家，爵禄宠光。”<sup>[23]</sup>

王洙配董氏继胡氏，皆前卒。继蒲阴齐氏，莫州防御推官、永清女，大中祥符四年辛亥（1011）生，好读书，能文章，有高节，美行善，抚诸子。阖门欣欣无一异言。始封文安县君，又封高阳郡君。治平二年乙巳（1065），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终于亳州其子之官舍。齐氏虽时为诗，然未尝以视人及终，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洁旷远，非近世妇人女子之所能为。又得遗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治平三年（1066）十月初八日，祔葬于虞城县孟诸乡田丘里。王荊公安石志其墓。王安石称她为“好读书，能文章，有高节美行。”<sup>[24]</sup>

子五：叟臣，力臣，钦臣，陟臣，曾臣。女一：适尚书职方员外郎陈安道。

见《宋史·王洙本传》，欧阳文忠公集洙本志，《宋史·东都事略·王尧臣传》并耆旧绩，闻及临川集齐氏本志。按《东都事略》称洙卒年六十。今据本志作六十一。

按洙志称子男五人，一女。长子叟臣早卒。齐氏志首言力臣、钦臣、陟臣、曾臣，称齐为继母，末言四男一女，竟无叟臣名。窃谓齐氏志，无叟臣或是早卒，故与继母云云。则诸子为董出胡出并一女，或出自齐氏，均无可考。故子女均载齐氏之后。

长子王叟臣，早卒。次子王力臣，字均伯，宋光禄寺丞。三子王钦臣，字仲至，赐进士及第。四子王陟臣，字熙叔，于嘉祐六年（1061）登王俊民

榜进士。五子王曾臣：字季，于宝元元年（1038）登吕溱榜进士。<sup>[25]</sup> 欧阳修称赞王洙：“公考朝廷，儒学之臣。退食于家，洗洗子孙。”<sup>[26]</sup>

### （三）王氏第七代进士（13人）

1. 王献臣：字公谔，王涣次子，王砺孙子。宋庆历六年（1046）登贾黯榜进士。官至殿中丞。配李氏，子一：镕。

王镕，字君范，宋赞皇令。配顾氏，子一：定国。<sup>[27]</sup>

2. 王梦臣：王涣三子，王砺孙子。宋天圣五年（1027）登王尧臣榜进士，任都官，增光禄大夫。见《宋史·戚同文传》。配张氏继舒氏，子四：铨、铨、铨、铨。

长子王铨，字器之，宋清水令。配郭氏，子珍国。次子王铨，字平甫，宋开封府判官。配氏，子一：观国。三子王铨，任安肃军司法。配氏，子一：经国。四子王铨，字成老，官知府<sup>[28]</sup>。

3. 王同臣：字叔调，王涣四子，王砺孙子。宋进士，奉直郎转朝奉大夫，卒赠特进。配许氏，子二：镐、汝冀。

长子王镐，字武京，宋大理评事。配氏，子五：安国、义国、华国、彦国、靖国。次子王汝冀：字朋远，朝奉郎临登闻鼓院出知兖州。配齐氏，子二：迪、适<sup>[29]</sup>。

4. 王稷臣：字弃（棄）之，王涣七子，王砺孙。宋天圣八年（1030）登王拱辰榜进士，任度支郎中，梓路提举。见《宋史·戚同文传》及《归德府志·选举志》。配氏，子一，著老。

王著老，字寿朋，宋抚州知录。配氏，子三：伉、何、褒<sup>[30]</sup>。

5. 王辅臣：字佑之，王涣八子，王砺孙子。宋天圣八年（1030）登王拱辰榜进士，以通直郎知制诰。配氏，子三：革、篋、将<sup>[31]</sup>。

6. 王尧臣（1003～1058）：字伯庸，王洙长子，王砺孙子。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宋咸平六年癸卯（1003）二月日生，天圣五年（1027）举进士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湖州。召试，以著

作佐郎、直集贤院会。父冲坐事出，尧臣知光州。丁父忧，服除，为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景祐四年（1037）擢知制诰，同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诸司库务，迁翰林学士知审官院。陕西用兵为体量安抚使，将行请诏劳来关中，凋弊仍犹贼平蠲租二年。仁宗从之，使远备言兵寡势分之弊，又言韩琦、范仲淹二人皆忠义智勇，不当直之散地，又荐种世衡、狄青有将帅才。仁宗乃以琦、仲淹为招讨使，而使尧臣再安抚泾原。既还上言，自元昊叛命，由泾原入寇，朝廷置帅府于泾原，诚合事机，然频经败覆，士气不振，愿精择将，佐易以旧兵兵力完实，则贼不敢入寇矣！未幾以户部郎中权三司使，时张永和和建议收民僦舍钱以助军费。尧臣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乱也，议乃定迁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为群牧使。丁母丧，服除，复为学士、群牧使，再迁给事中。皇祐三年（1051），以本官为枢密副使。嘉祐元年（1056）三月，拜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三年戊戌（1058），迁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年五十六。为人纯质，虽贵显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世称孝悌者言王氏。典内外制十余年。其为文词温丽。

景祐（1034～1038）初，奉敕修《崇文总目》六十卷，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己丑，上之，有文集五十卷。将终，口授其弟纯臣遗奏，以宗庙至重储嗣未立为忧，天子愍然，临其丧，辍视朝一日，赠左仆射，太常谥曰“文安”。

嘉祐四年（1059）葬于宋城县平台乡石落原祖莹之次。欧阳文忠公修志其墓。元丰三年（1080），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欧阳修给王尧臣写的墓志铭中说：“宋多名家，王实大族。族大而振，自公显闻。公初奋躬，以学以文，逢国多事，有劳有勤。利归于邦，怨不避身。帝识其忠，谓堪予弼。俾副枢机，出入惟密。遂参政事，实有谋谟。谁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饰之赠。长于百寮，考德惟称。维古载功，在其庙器。今亦有铭，幽宫

是闕。”<sup>[32]</sup>

配丁氏，封安康郡夫人。子三：同老、周老、朋老。女二：长适校书郎戚师道。次适。见《宋史》及《都东事略》本传，并欧撰本志。又毕沅《续资治通鉴》。张方平评价王尧臣为：“通材雅望，辉光笃实，践历显重，为朝廷羽仪，岩廊之瞻，积有日矣。”<sup>[33]</sup>

按榆莢邨谱载尧臣生咸平四年（1001），无卒年。今以本志称卒嘉祐三年（1058），年五十六。由是，上溯所生当在咸平六年（1003）。若咸平四年（1001），则年五十八矣。今据志推数改四为六，又榆莢邨谱于本志三子外载第四子锡老，称字公辅，官将作监主簿，早卒。窃谓锡老既已出仕，即使早卒，志内必无不载之理。兹从志载同老等三人，不载锡老，又志称次女未嫁，故适下阙之，以俟考。

长子王同老，字公佐，宋大理评事。神宗朝以水部员外郎为秘阁校理。初父尧臣执政时，尝与宰相文彦博、富弼、刘沆劝帝早立嗣，且言英宗尝养宫中，宜为后，为诏草，挟以进，未果立。元丰三年（1080），同老进遗稿，论父功。帝以访文彦博，具奏本末，以故加赠尧臣及易谥。配柴氏。子六：景融、景蕢（fén）、景文、景先、景俊、景辉。次子王周老，宋太常寺太祝，早卒。三子王朋老，字大年，宋大理评事，出知兖州，卒赠太中大夫。配氏，子一：致明。女一适苏子由姪<sup>[34]</sup>。

7. 王纯臣：字仲庸，又字道。王洙次子，王砺孙。宋景祐元年（1034）登张唐卿榜进士，历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兼密阁校理。卒葬石落原兄兆之次。见张方平撰王洙志，并附见欧阳修撰王尧臣志。配吴氏，封健康郡夫人。子四：廷老、商老、莘老、元老。

长子王廷老，字伯敷，配元氏，子一：俊明，字子嘉，宋中奉大夫，直敷文阁，配苏氏子由姪女。子八：棟、桂、棣、稅、楫、权、柄、械。次子王商老，字仲隐，宋通直郎，任枢密院编修，配氏，子三：起明、昌明、原明。三子王莘老，字行甫，宋朝奉郎知广济军，配氏，子一：纪明。四子王元老，

字芳叔，宋承奉郎。<sup>[35]</sup>张方平评价王纯臣为：“文雅开敏，邦之彦也”<sup>[36]</sup>。

8. 王汉臣：字纯之，王冲长子，王砺孙。宋皇祐五年（1053）登郑獬（xiè）榜进士。为长举令改汲县，历秘书省著作郎。见冲及华夫人两志，配马氏，子四：瑀、瑾、琥、瓌。<sup>[37]</sup>

9. 王彦臣：王冲三子，王砺孙。按咸池谱称彦臣，宋宝元元年（1038）登吕溱榜进士，浦口谱，彦臣行传后注云通判亳州。同年，司马温公有诗送之。窃考刘敞撰冲志，彦臣作某称尚幼。刘敞撰华夫人志称彦臣未仕，冲以嘉祐四年（1059）葬华夫人。以熙宁元年（1068）葬，宝元元年（1038）均在其前，如彦臣果登吕溱榜进士，两志不应如此说两谱云云。以同名牵合，今均不从。配氏，子一：璿。<sup>[38]</sup>

10. 王隣臣：王淑长子，王砺孙。宋宝元元年（1038）登吕溱榜进士，官太常博士。配氏，子：濩。<sup>[39]</sup>

11. 王钦臣：字仲至，王洙三子，王砺孙。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欧阳修，修器重之。用荫人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陕西转运副使。元祐（1086～1094）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还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开封尹。钱勰入对，哲宗言比阅诏殊，不满人意，谁可为学士者，勰以钦臣对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为学士，钦臣领开封改集贤殿修撰，知和州徙饶州，斥提举太平观。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卒，年六十七。“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雘（chóu）正，世称善本。”<sup>[40]</sup>著有《广讽味集》5卷。配寇氏，子六：宁祖、翊祖、从吉、尊祖、耽、彦朝。

长子王宁祖，宋法曹，配氏，子一：闳。次子王翊祖，字子正，宋泗州司理参军，卒赠通直郎，配氏，子二：闾、闾。三子王从吉，配氏，子二：祖安、祖文。四子王尊祖，字子祁。五子王耽，字得允，宋文登县丞，配氏，子三：间、闾、闰。六子王彦朝，字文道，宋将作监主簿，配氏，子一：问。<sup>[41]</sup>

12. 王陟臣：字熙叔，王洙四子，王砺孙。宋

嘉祐六年（1061）登王俊民榜进士，历秘书省著作佐郎，配氏，子一：干。

王干，字谊伯，宋陕西路提举，配氏，子三：闾、闾、闾。<sup>[42]</sup>

13. 王曾臣：字季，王洙五子，王砺孙。宋宝元元年（1038）登吕溱榜进士，官秘书省正字，配韩氏，子一：泉。

王泉，字仲习，宋迪公郎，配氏，子四：闾、闾、闾、闾。<sup>[43]</sup>

#### （四）王氏第八代进士（8人）

1. 王镇：字维宁。王鼎臣长子，王涣孙。宋宝元元年（1038）登吕溱榜进士，任雷州海康令，配李氏，子二：达、浚<sup>[44]</sup>。

2. 王廷老：字伯馭（yáng），王纯臣长子，王涣孙。宋皇祐五年（1053）登郑獬（xiè）榜进士。尝守虢，苏轼有诗送之。配元氏，子一：俊明<sup>[45]</sup>。

王俊明，字子嘉，王廷老子，王纯臣孙。宋中奉大夫，直敷文阁<sup>[46]</sup>。

3. 王镒：王梦臣三子，王涣孙。宋嘉祐二年（1057）登章衡榜进士。任安肃军司法，配氏，子一：经国。

王经国，字子修，王镒子，王梦臣孙，王涣曾孙。任杭州于潜县令<sup>[47]</sup>。

4. 王汝翼：字朋远，王同臣次子，王涣孙。宋嘉祐六年辛丑（1061）登王俊民榜进士。朝奉郎临登闻鼓院出知兖州。卒赠中大夫，配齐氏，子二：迪、适<sup>[48]</sup>。

长子王迪，字允志，王同臣孙，王涣曾孙。

次子王适，字允蹈，王同臣孙，王涣曾孙。配氏，子二：<sup>[49]</sup>。

5. 王铎：字成老，王梦臣四子，王涣孙。宋治平二年（1065）登彭汝砺榜进士。官知府，配氏，子四：持国、畿国、立、城。

长子王持国，字维叔，王梦臣孙，王涣曾孙。宋宣教郎，配戚氏，子八：琳、璞、瑛、瑜、瑀、珙、璟、球。次子王畿国，字军叔，王梦臣孙，王涣曾孙。



宋宣教郎，配氏，子四：嗣庆、余庆、积庆、承庆。三子王立，王梦臣孙，王涣曾孙。宋郊社齐郎。四子王城，字公瑀，王梦臣孙，王涣曾孙。配氏，子二：昭庆、倓寿。<sup>[50]</sup>

6. 王迎：字逢吉，王端臣四子，王渊孙。宋绍圣元年（1094）登毕渐榜进士。终南剑州知州，配氏，子三：修、璆、琳。

长子王修，字思永，配氏，子一：余庆。次子王璆，字仲玉，一字中立，宋从事郎。三字王琳，字季玉<sup>[51]</sup>。

7. 王经：字子立，王禹臣长子，王演孙。宋绍圣元年（1094）登毕渐榜进士，历转运使，配氏，子一：兴宗。

王兴宗，配氏，子二：涛、铸<sup>[52]</sup>。

8. 王维：字持道，王正臣次子，王涣孙。宋绍圣四年（1097）登何昌言榜进士。历节度判官，配氏，子一：求。

王求：字子野，王维子，王正臣孙，王涣曾孙。宋承直郎，配氏，子四：霆、需、霍（shù）、霭<sup>[53]</sup>。

（五）王氏第九代进士（7人）

1. 王达：字通叟，王镇长子，王鼎臣孙子，王涣曾孙，宋元丰五年（1082）登黄裳榜进士。历官签书枢密院事。<sup>[54]</sup>

2. 王浚：字渊叟，王镇次子，王鼎臣孙子，王涣曾孙，宋嘉祐六年（1061）登王俊民榜进士，历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特赐柱国开国公。<sup>[55]</sup>

3. 王珍国：王铎（qi）子，王梦臣孙，王涣曾孙。宋庆历六年（1046）登贾黯榜进士<sup>[56]</sup>。

4. 王光国：王中长子，王谔臣孙，王涣曾孙。宋庆历六年（1046）登贾黯榜进士。任陈州项城主簿（bó），配氏，子一：著<sup>[57]</sup>。

5. 王经国：字子修，王镒子，王梦臣孙，王涣曾孙。宋元丰五年（1082）登黄裳榜进士。任杭州于潜县令，配氏，子二：维、齐<sup>[58]</sup>。

6. 王迪：字允志，王汝翼长子，王同臣孙，王

涣曾孙。宋元丰五年（1082）登黄裳榜进士。朝散郎知忠州，配氏，子一：勇<sup>[59]</sup>。

王勇，字道，任中奉大夫。

7. 王观国：字元宾，王铨子，王梦臣孙，王涣曾孙。宋元丰八年（1085）登焦蹈榜进士。历广西运判，配氏，子二：爽、怵。

长子王爽。次子王怵，字悦道，宋迪功郎<sup>[60]</sup>。

（六）王氏第十代进士（2人）

1. 王勇（fū）：字道，王迪子，王汝翼孙，王同臣曾孙，王涣玄孙。宋元符三年（1100），登李釜（fǔ）榜进士。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中奉大夫，卒，葬临江车清江县建安乡三郭之原。配氏，子三：倜、傥、倚。女四<sup>[61]</sup>。

2. 王三恕：字端伯，王问长子，王彦朝孙，王钦臣曾孙，王洙玄孙。宋进士，历浙西安抚司参议官，配氏，子五：仲仁、仲义、仲礼、仲信、仲智。仲仁字诚之，宋金溪主簿。仲义字宜之。仲礼字节之。仲信字延之。仲智字行之。<sup>[62]</sup>

三、应天府虞城六代进士表

| 应天府虞城王氏六代三十八进士录<br>(以王坝为一世始迁祖) |    |        |     |                            |
|--------------------------------|----|--------|-----|----------------------------|
| 世代                             | 姓名 | 年代     | 榜第  | 官职                         |
| 五世                             | 王砺 | 太平兴国五年 | 苏易简 | 屯田郎中，<br>赠尚书右仆射、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
| 六世                             | 王涣 | 景德二年   | 李迪  | 礼部侍郎，<br>太子宾客退居南京，卒<br>赠尚书 |
| 六世                             | 王浚 | 景德二年   | 李迪  | 屯田郎中，<br>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

|    |     |        |     |  |
|----|-----|--------|-----|--|
| 六世 | 王渊  | 大中祥符元年 | 姚华  | 合州刺杀，赠银青光禄大夫。                                      |
| 六世 | 王冲  | 大中祥符七年 | 张观  | 屯田郎中，领南京留司御史台。                                     |
| 六世 | 王淑  | 天圣八年   | 王拱臣 | 都官郎中，卒赠散大夫。  |
| 六世 | 王演  | 天圣五年   | 王尧臣 | 殿中丞。卒赠朝议大夫。尚书吏部郎中，阶朝散大夫，勋轻车都尉，爵开国伯。卒赠给事中，特赐谥曰“文节”。 |
| 六世 | 王洙  | 天圣二年   | 宋郊  | 都官，赠光禄大夫。参知政事。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
| 七世 | 王梦臣 | 天圣五年   | 王尧臣 | 度支郎中，梓路提举。   |
| 七世 | 王尧臣 | 天圣五年   | 王尧臣 | 通直郎制诰。   |
| 七世 | 王稷臣 | 天圣八年   | 王拱臣 | 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兼密阁校理。                                   |
| 七世 | 王辅臣 | 天圣八年   | 王拱臣 | 通判亳州。  |
| 七世 | 王纯臣 | 景祐元年   | 张唐卿 | 太常博士。  |
| 七世 | 王彦臣 | 宝元元年   | 吕溱  | 秘书省正字。   |
| 七世 | 王隣臣 | 宝元元年   | 吕溱  | 殿中丞。   |
| 七世 | 王曾臣 | 宝元元年   | 吕溱  | 汲县令，秘书省著作郎。  |
| 七世 | 王献臣 | 庆历六年   | 贾黯  | 秘书省著作佐郎。   |
| 七世 | 王汉臣 | 皇祐五年   | 郑獬  |  |
| 七世 | 王陟臣 | 嘉祐六年   | 王俊民 |  |

|    |     |      |     |                       |
|----|-----|------|-----|-----------------------|
| 七世 | 王同臣 |      |     | 赠进士<br>奉直郎转朝奉大夫，卒赠特进。 |
| 七世 | 王钦臣 | 熙宁二年 |     | 陕西转运副使，知成德军           |
| 八世 | 王镇  | 宝元元年 | 吕溱  | 雷州海康令。                |
| 八世 | 王廷老 | 皇祐五年 | 郑獬  | 知虢州。                  |
| 八世 | 王镒  | 嘉祐二年 | 章衡  | 安肃军司法。                |
| 八世 | 王汝翼 | 嘉祐六年 | 王俊民 | 朝奉郎，临登闻鼓院出知兖州。        |
| 八世 | 王铎  | 治平二年 | 彭汝砺 | 知府。                   |
| 八世 | 王迎  | 绍圣元年 | 毕渐  | 南剑州知州。                |
| 八世 | 王经  | 绍圣元年 | 毕渐  | 转运使。                  |
| 八世 | 王维  | 绍圣四年 | 何昌言 | 节度判官。                 |
| 九世 | 王珍国 | 庆历六年 | 贾黯  |                       |
| 九世 | 王光国 | 庆历六年 | 贾黯  | 陈州项城主簿。               |
| 九世 | 王浚  | 嘉祐六年 | 王俊民 | 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赐柱国国公。     |
| 九世 | 王达  | 元丰五年 | 黄裳  | 签书枢密院事。               |
| 九世 | 王经国 | 元丰五年 | 黄裳  | 杭州於潜县令。               |
| 九世 | 王迪  | 元丰五年 | 黄裳  | 朝散郎知忠州。               |
| 九世 | 王观国 | 元丰八年 | 焦蹈  | 广西运判。                 |
| 十世 | 王勇  | 元符三年 | 李釜  | 中奉大夫                  |
| 十世 | 王三恕 |      | 赠进士 | 浙西安抚司参议官              |

作者简介：张学勇，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 参考文献：

- [1]《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页。
- [2] 欧阳修《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公（尧臣）墓志铭》。
- [3]《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页。
- [4]《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页。
- [5]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一《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十一人物志三名师二王洙、王洙。
- [7] 王洙撰《王氏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
- [8]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页。
- [9] 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10] 王洙撰《王氏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全宋诗》五四第1册第598页。
- [11]《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2页。
- [12]《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页、第4-13页。
- [13]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14] 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15]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2页，第20-22页。
- [16] 刘敞《尚书屯田郎中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王公（冲）墓志铭》。
- [17] 刘敞《舅（王冲）氏华夫人墓志铭》。又钦定《四库全书·彭城集》卷三十九，宋刘敞撰。
- [18]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2页，第22-25页。
- [19] 刘敞《尚书屯田郎中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王公（冲）墓志铭》。
- [20]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2页，第27页。
- [21]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3页，第27页。
- [22] 据欧阳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
- [23] 据王安石《高阳郡君齐氏墓志铭》。
- [24] 据王安石《高阳郡君齐氏墓志铭》。又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临川文钞，三秦出版社，1998年9月，第3565页。
- [25]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3页，第27-33页。
- [26] 据欧阳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
- [27]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4页。
- [28]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5-6页。
- [29]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7-9页。
- [30]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3页。
- [31]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3页。
- [32] 欧阳修《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
- [33] 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34]《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3-17页。
- [35]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17-20页。
- [36] 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37]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23页。
- [38]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24-25页。
- [39]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26页。
- [40] 《宋史·王洙传》二九四卷。
- [41]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28-30页。
- [42]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31页。
- [43]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

第 31-32 页。

[44]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3-4 页。

[45]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17 页。

[46]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17 页。

[47]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5-6 页。

[48]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9 页。

[49]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9 页。

[50]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5-7 页。

[51]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21 页。

[52]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27 页。

[53]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10 页。

[54]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3-4 页。

[55]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3-4 页。

[56]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5 页。

[57]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11 页。

[58]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5-6 页。

[59]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9 页。

[60]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5 页。

[61]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9 页。

[62] 据《太原王氏通谱》卷七，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第 30 页。

## ●学术动态●

### 我院教师参加河南省历史学会 2023 年年会

3 月 10 日至 3 月 12 日，河南省历史学会 2023 年年会暨“历史学前沿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新乡举行，本次会议由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我校历史学专业教师郭文佳、李可亭、高建立、朱凤祥、孙旭、冯志伟、付先召、薛立芳等当选为河南省历史学会新一届理事，郭文佳、李可亭、高建立、朱凤祥当选为新一届常务理事。

## ● 书院研究 ●

## 论北宋应天府书院的官学化历程

□ 王树林



北宋书院教育的兴衰过程，实是由私家办学到成为官学而书院特征功能逐渐消亡的过程。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书院的官学化。也既书院于宋初由私人学堂，伴随着历史发展，官府对书院的掌控一步步加深，最终被收入官学的递进历史。北宋时期的书院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应天府书院从建立、发展、消亡，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以应天府书院为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为认识北宋书院教育，具有典型意义。

北宋应天府书院的前身是五代至宋初时期宋州学者戚同文私人办学的学堂（或称学舍）。戚同文去世后，学堂一度衰落。戚同文之子戚纶、戚维兄

弟为官后，在宋州富民曹诚的捐助下，重新兴复修建，一时学堂声望又起。当地府上奏其盛况，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将戚氏学堂正式赐名为“应天府书院”。

宋建国之初虽提倡文治，但一时无力兴复和创办地方官学来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因此朝廷对书院采取了赐额、赐书、赐田等多种形式的支持。当时影响较大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等都得到了朝廷不同程度的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赞助。而应天府书院地处宋州，临近汴都京师，同时它又是太祖龙兴之地，真宗之初既改宋州睢阳郡为应天府，不久又升为南京，为北宋陪都之一。创建此处的戚氏学堂，声望又高，名气又大，朝廷对其更为重视，所以戚氏学堂是皇帝第一所赐名的书院。而与其他书院相比，其官学色彩与官学化进程，也比其他书院更快、更明显，因此也更具代表性。应天府书院发展在北宋一代大致经历了书院期、府学期、南京国子监学期三个历史阶段，现就每个阶段的官学化历程，考论如下。

### 一、赐名后，官学色彩步步深化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仁宗景祐二年

(1035)

应天府书院自真宗皇帝赐名起，即有了浓重的官方色彩。赐名为“应天府书院”，也即是应天府的书院，这与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书院已有很大不同。《宋史·戚同文传》谓：“诏赐额为本府书院，命纶子奉礼郎舜宾主之，署（曹）诚府助教（重建学堂的投资者），委本府幕官提举之。”<sup>1</sup>主书院者虽仍是戚氏后人戚纶之子戚舜宾，书院运作再也不仅仅是私家所为，而成为朝廷委派官员管理学府。授于书院建设投资者曹诚“应天府助教”，让曹诚捕管书院事务，曹诚已经不再仅仅是应天府的一位普通富户，而成了朝廷命官，还享受了国家的俸禄。整个书院又“委本府幕官提举之”，也即应天府政府机构里的幕僚官吏（主官的辅官），来分管应天府书院工作。

戚氏学堂（或称睢阳学舍）从初建到宋初，在戚同文的经营管理下，成就显赫。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弟子中中进士者有56人，10余人入宋廷台阁。戚同文去世后，戚氏子孙戚维、戚纶、戚舜宾等继承了这一辉煌的教育产业，意欲将“戚氏学堂”发扬光大。另外，戚同文学堂培养出的大批学人，他们也不愿因老师去世而学堂衰落不振。再加上应天府民，几十年来对学堂已有深厚感情，当地百姓以有这样有名气的师长、有成就的学堂而自豪。应天府富民曹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愿“出资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sup>2</sup>，重建学堂。学堂再建应是工程浩大，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大约应在戚同文去世后的二十年左右的宋真宗咸平、景德年间（1001-1005）就已兴工建造，景德年间（1005-1007）又恢复了往日的收授生徒的教育活动。到了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是因为当时学堂“博延生徒，讲习甚盛”，所以才有“府奏其事，上嘉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的盛举（同上）。戚氏后人与捐资者曹诚都明白，书院只有得到官方的支持，才能行稳至远。赐额“应天府书院”后，并且命原有教管人员戚舜宾主管书

院，戚同文名弟子王砺之子时举贤良的王洙掌其教务。而整个书院仍依原有学堂的管理方式运行。这是当时政府在不遐办学的世情下，对书院教育的肯定与支持。以“赐额”这一褒扬形式，肯定了应天府书院在当时教育体系中的合法办学地位。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记载，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秋七月，命内侍都知阎承翰奉安太祖、太宗圣像于南京鸿庆宫。九月，上御景福殿，下诏亲试亳州、南京路所荐送的服勤辞学、经明行修的举人，得进士张观等二十一人，赐及第并除官。这是一次恩试，参试者多为在应天府书院研学的寒门子弟。“上谓宰相曰：‘近岁举人，文艺颇精，孤贫得路。然为主司者亦大不易，徇请求则害公，绝荐托则获谤。’王旦（时为宰相）曰：‘今郡县至广，人数亦繁，必须临轩亲试。至于南省解发，非朝廷特为主张，则虽责成主司，亦难以集事也。’”<sup>3</sup>当时入国子监的学生皆为官僚出身子弟，寒门子弟读书求学多在私家书院。应天府书院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政治环境，得真宗皇帝法外开恩，单独下诏亲自考试，是当时天下其它书院所无法享受的。为此，应天府书院也就成为当时“孤贫”学子向往的学府。

李及于仁宗天圣元年（1031）九月徙南京知应天府。三年（1025），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乞添解三人。”<sup>4</sup>当年十一月，朝廷批准增进士解额三名给应天府书院。对于应天府书院的学生来说，这又是一个备受鼓舞的消息。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的恩试必定不是常遇，而增给进京进士考试的解额，则是政府的法定制度，以后将年年如此。应天府能获得进士解额的增加，不仅仅是朝廷赏赐，这也是应天府书院学子繁盛及地方政府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

仁宗天圣五年（1027）晏殊知应天府，直接关心书院的发展建设。时范仲淹因母丧赋闲南京，晏殊请范仲淹主应天府书院讲席。在官府的大力支持

下,书院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史·晏殊传》:“知宣州,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sup>5</sup>《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亦有同样记载,将晏殊直接干预应天府书院的办学,看作政府兴学的开始。天圣六年(1028)五月,晏殊奉诏还京。临行,复奏荐王洙留任应天府书院说书。《玉海》卷一六七《应天府书院》条云:“(天圣)六年九月,晏殊言请以王洙充书院说书,从之。”<sup>6</sup>王洙为戚同文弟子王砺之幼子,应天府书院成立之初主教名师王洙之弟,天圣二年(1024)进士,授贺州富川县主簿,未到任而充应天府书院说书,与范仲淹共主应天府书院。因素负文藻,深明经义,为书院师生所敬仰。时三年任满,范仲淹建议晏殊能将王洙留任。范仲淹代晏殊《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云:

右臣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羣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当州近辅之郡,宜崇治本,兼至圣文宣王庙已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非有讲贯,何以发明!臣窃见贺州富川县主簿充应天府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御前进士及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在彼讲说已满三年,伏望圣慈,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于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向方。干冒圣威,臣无任云云。

7

这则史料大致有三层意义,正可透视出当时国家的教育现状、南京应天府急需经学讲师及书院的官学程度等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国家“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是致治天下的大计。只有培养出“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的人材,并“命之以爵,授之以

政”,才能有“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的盛王之治。其次,说明了大宋王朝经过太宗、真宗之治,至仁宗时已“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而应天府为“当州近辅之郡”,更宜崇治根本。而当时南京“至圣文宣王庙已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圣文宣王庙(孔庙)应是书院的中心建筑,是说应天府书院更需讲说之师。其三,是说贺州富川县主簿充应天府书院说书王洙留充南京讲书的必要性和已具备的条件。这也正好说明应天府书院的师资多有朝廷在职的七、八品官员充任。由此可见,应天府书院已作为应天官府书院,除自身内部日常管理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外,其他的如建设发展的大政方针、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书院学生的政治出路等,都已皆由应天府官府决定了。

晏殊由应天府知府入京为御史中丞的当年,即天圣六年(1028)十二月,“诏免应天府书院地基税钱”<sup>8</sup>。处于闹市中的应天府书院及赖以书院运行经费的学田,每年地税,也是书府不小的一项重要费用开支。免除地基税无疑为应天府书院免去了不小的经济负担。这大概也于晏殊入京,对当朝政府的建议有关。

仁宗明道二年(1033)十月,宋廷准应天府书院“置讲授官一员”<sup>9</sup>,此讲授官为朝廷命官,与之前的书院讲说范仲淹、王洙等人不同,他们皆为在朝其他在职官员而由他官“充”任是职,而不在朝廷职官名目编制之内。而此置讲授官,是正式进入了朝廷职官名目的编制。朝廷所置讲授官一名,既满足了书院扩大规模后增加师资力量的需求,也是朝廷直接派到书院的政府教员,使书院的官方色彩进一步加深,政府对书院的管控也进一步加强。

纵观应天府书院的整个书院期,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对整个书院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使应天府书院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官学替代品的作用,并一步步强化。朝廷对应天府书院的支持,为

应天府书院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受到应天府书院师生的由衷欢迎，他们以书院所受的恩赐为荣。范仲淹作于天圣六年的《南京书院题名记》即描绘了当时的繁盛，表达了他作为应天府书院学生、教师的自豪。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南京书院题名记》用“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形容书院生员之盛况；用“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比喻应天府书院学术、文风之昌茂；以“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sup>10</sup>，来描述应天府书院培养人材之丰硕。文辞间流露着范仲淹对书院繁荣昌盛景象的欣慰与骄傲。

宋初朝廷干预书院，主要是支持而非控制，这些支持虽均来自朝廷，但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努力。应天府知府李及为增加进士额积极向朝廷请愿，应天府知府南京留守晏殊对王洙和范仲淹的引荐与留任等，均是地方政府为书院发展所做的贡献。应天府书院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几十年间成为北宋士子向往的求学之所。不久，随着北宋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政策的改变，应天府书院也被正式纳入地方官学体系。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称应天府府学，使书院进入了完全官学时期。

## 二、改府学，完成书院官学转化

仁宗景祐二年（1035）至庆历三年（1043）

随着北宋战事稍息，政治社会逐步稳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实力增强，至宋仁宗赵祯的景佑、

庆历年间，开始广泛设置州县之学。

其实太祖、太宗、真宗并非不重教育，太祖在位曾三幸国子监。太宗亦两幸国子监，并降辇听李觉讲《易》之《泰卦》，赐直讲孙奭五品服并听其讲《尚书·说命》三篇。皆因四方战事未消，无暇顾及。另外，五代至宋初，由于政权更替、战事不断，至使民间读书的经史典籍，皆极缺乏。其书籍问题到了真宗时期，才基本解决。真宗命馆阁文臣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景德二年五月，真宗亲幸国子监阅书库藏书，问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邢昺，邢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真宗听了大喜，说了一句话，却道出了国家难以顾及学校教育的真象。他说：“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sup>11</sup>正是书院的兴起，才填补了官方教育的不足。

宋仁宗大力提倡儒术，尊重并支持地方政府设置州县学。据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六载：“仁宗即位，崇儒术以劝学者。乃首命龙图阁学士冯元以领监事，特重之。上曰：‘讲学之废久矣。执卷者不知经义，非学校不兴，而上之教导有不至耶。’诏孙奭、冯元荐博明经术者以名闻。”（同上）仁宗认为天下官府讲学之废已经很长时间（自宋建国以来），至使一些执卷之文人不懂经义，并不是学校不兴，而是朝廷教导重视不至。《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六载：“天圣九年，青州王曾以州阙学教育诸生，乃缮官舍为州学，请国子监羣书，上从其请。其后天下有请建学赐书与田，并从之。”从此，诸路州府之学相继建立。至“庆历四年，宋祁上言，于是诸路、州、府、军、监，并皆立学校，及二百人以上又立县学。”（同上）

《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六记载从仁宗明道元年（1032）至宝元二年（1039）这七、八年间州府立学盛况云：

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许寿州立学，仍赐九经。



知州侍御史朱谏请之也。

明道二年五月庚寅，许大名府立学，仍赐九经，从王曾之请也。三月乙未，赐亳、秀、濮、郑四州学田各五顷。

景佑二年三月丁酉，诏国子监直讲一员兼领监丞主簿事。十月己巳，许苏州立学，仍给田三顷。十一月辛巳朔，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仍给田十顷。九月壬寅，赐郑州学田五顷。十月壬子，许蔡州立学。十二月乙丑，许孟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景佑三年正月己酉，许洪州、密州立学，仍各赐田五顷。

三月癸巳许潞州、常州立学。

四月乙亥，许衡州立学。

五月戊子，许许州立学。

五月壬辰，许润州立学。

五月戊戌，许真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六月戊申朔，许越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六月壬子，许阶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六月甲子，许真定府博州、郟州立学，各给田五顷。

八月甲寅，许并州立学。

九月庚辰，许绛州立学。

十月辛未，许合州立学。

十一月乙亥，许江州立学。

景佑四年正月戊寅，赐蔡州学田十顷。……

宝元二年二月庚午，许明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三月丙辰，许泉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十一月辛丑，许建州立学，仍给田五顷。（同上）

从以上史料统计，自天圣九年（1031），青州王曾缮官舍为州学开始，至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许建州立学止，州府共立学28处，加上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共29处。赐州府学田除苏州3顷，应天府、蔡州10顷外，各州皆赐田5顷。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二》记载：

自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赐田给书，学校相继而兴。近制，惟藩镇立学，颍为支郡，（蔡）

齐以为（请）而特许之，故有是命。又蔡齐请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庆历诏诸路州府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于是州郡不置学者鲜矣。<sup>12</sup>

在这州府遍立学校的浪潮中，本来就已经是应天府的书院的应天书院，自然也就结束了补缺官学的历史作用，于景佑二年十一月，应天府书院改称为应天府府学了。改称府学后，并又“仍给田十顷”。官府所拨学田十顷的收入作为学校办学经费，这无疑给处于兴盛期的应天府书院以永久且稳定的经济来源，为书院运转提供了坚实的经费保障。此时的书院虽然改为府学，仍依旧“府学”、“书院”并称。在此之后八年的府学期间里，应天府书院逐渐遵照地方州郡之学统一的模式发展，在教育管理、院费开支的诸多层面，已不完全具备独立的办学权利，这无疑对书院的自身发展，有其不利的方面。如学田经费的管理，就应遵守一定的学田制度。北宋的学田，归工部之下的屯田司管辖，由屯田郎中、员外郎掌管。《宋史·職官志三》：“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刈、兴修、给纳之事。凡塘泺以时增减，堤堰以时修葺，并有司修葺种植之事，以赏罚诏其长贰而行之，分案三，置吏八。”<sup>13</sup>在宋代高度的中央集权下，学田租金的处置、拨款等管理都遵照朝廷的政令使行，书院的经费自主权受到限制。除此之外，书院在改为府学后，也失去了自由讲学、延请名师的自主权，书院原有的活跃繁盛的学术氛围，也随之渐趋萧条冷落。

府学之初，生员还可自主择学，书院生员来源还一遵旧制。当时山东、徐州及今河南东部的生员到书院研学者甚多。直到庆历五年三月，仁宗下诏：“天下见有官学州县，自今只许本土人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本贯。其所在官吏，仍不得以州学公用为名，科率钱物。令转运司常察举之。”<sup>14</sup>到了这年十二月，“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sup>15</sup>，书院又进一步升为国子监学，其生徒来源又进入了

另一个层面。为此，整个府学年的八年中，学生来源还基本上一仍其旧，并未太受官学化的冲击。

府学八年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应天府推官石介和应天知府夏竦。石介未中进士前曾在应天府书院修学，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三云：

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独闻其勤，约因會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使以食还，王益重之。<sup>16</sup>

据许毓峰编《石徂徕年谱》，王侍郎即王洙，因子王尧臣而赠官侍郎。洙为应天府书院御赐院名之初的名师。石介于天圣六、七年间寓学书院，时范仲淹与王洙、王洙兄弟皆执鞭教务，孙复亦来游学，一时学术甚盛。仁宗景佑元年（1034），石介任南京留守推官，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说他“官于南京，常以经术教授。……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sup>17</sup>。他亲自提举应天府书院，并执经授徒，颇能上继范仲淹之风。时刘随以工部郎中知应天府，亲视府学，于东序藏书处观书，但又“索观佛氏画像，以为佛与老氏与吾圣人为三教，三教皆可尊”<sup>18</sup>。石介大为不然，上书极言儒学之正，批驳刘随信佛言论（同上）。卫道护儒，以传承戚氏儒学为宗旨。景佑二年（1035），夏竦继刘随以刑部尚书知应天府，宋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载：夏竦“景佑元年，徙青州。明年，徙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后二年，以户部尚书入为三司使。”<sup>19</sup> 据此，夏竦自景佑二年至宝元元年（1038），在南京三年余，他与石介共同支持书院发展。景佑二年十一月，“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仍给田十顷”<sup>20</sup>。这十顷学田，仍夏竦上书争取所得。消息传开后，书院师生大受鼓舞。石介借此移书书院生徒，一方面颂扬朝廷养贤育才的皇恩，一方面宣传儒家之道，并教育生徒，不要忘记创立学府的戚纶和争取十顷学田的夏竦。石介《移府学诸生》告诫学生：重道养贤，不仅是

大宋王朝、也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国策。而只有“讲习在堂，朋友在序，图籍在府，器服在厅，岁有公田，日有常秩”，才能“内足以乐乎志，而外足以进乎道”。书院创建三十余年来，虽然解决了“讲习在堂，朋友在序，图籍在府，器服在厅”的问题，“君子养贤以居众材，养优而后责之以道”，但“养”的问题，也就是办学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书院的发展。虽“贤，重也；食，轻也”、“学本也，养末也”，但“食”与“养”的问题不解决，何谈“内足以乐乎志，而外足以进乎道”！当年戚纶建书院学舍，解决了为学之所；而夏竦请来了学田，解决了办学经费，所以石介认为“南京学立于故大谏戚公（谏议大夫戚纶），成于今留守夏公（夏竦）。大谏为建学宫，学之有取无不给，惟养士之具未称。留守从天子请田千亩，以食于学，养士之具又称”。从戚纶到夏竦三十年，“而学乃成”。其实石介讲了书院从创立到彻底成为官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书院改为府学的重要意义。为此他告诫生员“诸生不可以负二公矣”！<sup>21</sup>

在府学年的这八年里，应天府书院由民间彻底走入官府，不仅有了为学之所，也由官府解决了“养”士之资。其办学性质和教育教学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三、升国学，书院功能彻底消亡

仁宗庆历三年（1043）至钦宗建炎二年（1128）

应天府府学于庆历三年（1043）十月，升为南京国子监学，成为北宋最高中央学府之一，直至高宗赵构在南京称帝的建炎年间（1127-1130），南京国子监历时八十八年。应天府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的完全官化，一方面令平民子弟惋惜，即使那时地方州府之学已大量兴起，但应天府书院的辉煌成就，是后起书院与州府之学无法超越的；另一方面，对于应天府的民众而言，应天府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无疑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应天府书院的迅速发展是北宋历史发展中社会进程的必然，也是北宋书院由私人办学一步步官学化的必由之路。

在南京国子监学八十八年的历史中，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南国子监因革兴废，早已不是书院旧貌，但作为书院的沿续，院址、藏书、生徒研学讲学的教育本质并未改变。虽然名子不再称应天府书院，我们仍然将这八十八年的历史，记入书院发展的历史沿革进程。

陪都府学升为国子监学，并不是从应天府书院始，在此之前的景佑元年（1034），西京（洛阳）河南府府学就已升为国子监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仁宗景佑元年（甲戌1034）五月云：“以河南府府学为国子监。后唐同光三年，初建文宣王庙。咸平三年，重修。旧止名府学，于是直集贤院谢绛论奏，乃正监名。”<sup>22</sup>

府学升为国子监学后，其性质完全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入监生徒的变化。进监入学的门槛提高至中央官学标准。当时国子监的入学条件是“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sup>23</sup>。仁宗庆历二年（1042），朝廷接受王洙的建议，整顿国子监，将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也收入国子监读书，另设“四门学”培养他们。所谓“四门学”即“用《礼记》四郊立学之说，于四门置学”<sup>24</sup>。也就是国子监的生徒，除国子监生之外，进一步扩大的生员。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在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四门学始此。唐隶国子监，有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五百人为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八百人为庶人子弟之俊异者。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二《学校·唐六学》引《唐书·选举志》云：“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以七品以上子、庶人之俊异者为之……。”<sup>25</sup>另外其他三学是书学、律学、算学。宋至仁宗庆历二年，因为当时还没有太学之建，始置四门学。庆历三年（1043）二月，“仍请立四门学，以士庶子弟为生员”<sup>26</sup>，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仁宗庆历三年（1043）二月云：“辛酉，国子监言：自今补说书官请以四人为定额，及岁所

试监生不合格且留听读，三试不中者黜之。仍请立四门学士，以庶人子弟为生员，以广招延之路。并从之。”<sup>27</sup>这些政策给平民子弟提供了入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的机会。但紧接着要求生员各回本籍，又接着是京师太学的复兴，这不仅使国子监四门学很快消亡，也给处于陪都地位的南京国子监学之生徒来源带来不利。

庆历四年（1044）三月，朝廷建学更制的政策，使由府学刚升为国子监的南京学宫，又受到了极大限制。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并多次建议兴学校，要重本行实。仁宗下诏让几位近臣商议，于是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混合奏曰：

伏奉诏书，议夫取士当求其实，则人当尽其材。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设立学舍，保荐送之法。<sup>28</sup>

仁宗据众臣奏章，诏下天下：“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学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凡所科条，可为永式。”（同上）这以后选举人材，“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皆行州郡“学舍保荐”之法，原汴京以东士子皆可入南京学，那么此诏下，来就学的学士皆令回其本土，南京国子监学再没有了生徒来源之优势。

庆历四年的另一政策，也导致了南京国子监学的萎缩。这年四月，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当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余区，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葺讲殿，备乘輿临幸。”仁宗从之。此太学之建，逐渐取代了“四

门学”。后来太学生数量逐渐增多，大量超过国子生，而国子监也不断“太学化”。太学初建时，下湖州取胡瑗讲授之法著为令，并诏胡瑗为学官。“始，瑗教授湖州，科条纖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父兄，诸生亦信爱如其子弟，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嘉佑元年（1056），胡瑗以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管勾太学。“瑗既为学官，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善自修饰，衣服容止，徃徃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为瑗弟子也。于是擢与经筵，治太学犹如故。”<sup>29</sup>汴京太学之建并迅速发展，大量士子向往京师而著籍太学，至使南京国子监学逐渐萧条。

南京国子监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另一大事是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主导下，推行的太学“三舍法”制。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後集》卷二八《士門·學法類·三舍附》：

神宗熙宁四年十月戊辰，中书言：近制增广太学，益置生员。除主判官外，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举。其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一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从所隶官讲授主判官、直讲，月考试优等，举业上中书，学正、学录、学谕于上舍人内逐经选六员，如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及直讲，保明中书考察，取旨除官，具有职事者受官讫，仍旧管勾。候直讲、教授有阙，次第选充。其主判官、直讲、职事生员，并第增给食钱。从之。<sup>30</sup>

当时国学主学者为主判官，主判官之下设国子监五经直讲官十员，每二员共讲一经。参与管理者还有学正、学录、学谕等职员，这些职事员大多从上舍生中选拔，由主判官及直讲官保明上报中书省考察，然后取旨除官。将来直讲、教授有缺，也以次从学正、学录、学谕中递补。到了神宗元丰年间，三舍养士之逐舍升迁之法进一步完善。时御史中丞李定及太学生檀宗益皆有上言。李焘《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二百九十八记载：神宗元丰二年五月，“上批：太学外舍生檀宗益上书《论修整学事》颇有条理，疑其应务之材在所可试，判国子监李定尝保奏，自入学无殿罚，同斋诸生称其素行无阙，可试校书郎，充太学录。所言太学事令李定同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看详后，又命同判监张璪同看详，立法以闻。”<sup>31</sup>到了这年十二月，李定等人经讨论研究，上奏皇上。<sup>32</sup>这种学校“三舍”校士之法，到了徽宗时，甚至取代了科场考试，直至宣和五年（1123），“复罢舍法而一归于科举”。

应天府学升为国子监学后，朝廷还重视了学官的选拔和学官地位的提升。庆历三年（1043）十月十九日，有臣僚上言：“自古取士之术，皆本学校。太平以来，学校兴矣，未尝设官典教，以重其任。今使士角科举一日之长，岂如素养士于天下也？”诏曰：“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府军监应有学处，并须拣选有文行学官讲说，不得因循废罢。”<sup>33</sup>庆历四年，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针对当时的教育系统提出了“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sup>34</sup>。仁宗嘉佑元年十二月，诏天章阁侍讲胡瑗管勾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sup>35</sup>。至神宗即位，知制造宋敏求于熙宁元年（1068）五月上言请州置学。熙宁六年三月，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选京官朝官来选举适用之人，或举荐人材充任。又诏诸路择举人最多的州、军，以五路法（指北方五路（京东、京西、陕西、河东、河北）士子在进士科考中的优选政策，各置教授一员，委国子监询考通经品官，及新及第出身进士可为诸路学官，即具所著词业以闻。神宗时期国子监、太学完全融为一体，元丰三年（1080）正月，国子监直讲改称太学博士，与国子监原建制同，每一经置博士二人。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诏内外学官，非制科进士出身及上舍生入官者并罢。崇宁三年（1104）十一月，徽宗亲临太学，诏国子监司业吴綱、蒋静各进官一等，面赐三品服。博士、正录满三考改合入官，未三考，人循两资。崇宁、大观间，罢废科举增教导之官，建辟雍以待天下士。

徽宗亲自撰《辟雍记》碑文。又整合国子监、太学、辟雍的管理体制，以辟雍司成为太学司成，总国子监及内外学事，凡学之事皆许直接通达皇上。<sup>36</sup>

应天府学升为国子监学后，政府对国子监的经费投入也进一步加大。据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後集》卷二七《士門·學制類》记载，神宗熙宁、元丰的十余年间，国子监经费、学舍、餐饮的增加和建设就有六次。其原因不外三个方面：其一为北宋经真宗、仁宗之治，国家相对安宁，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库颇为充余。其二是神宗历精图治，任用王安石刻意变法，对教育特别重视。其三，北宋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之世，教育由书院、地方州、军兴学，至此国学得到大发展，经费需求也进一步扩大。

神宗时，举士考试颇重经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举士》记载：“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官，谓之《三经新义》。”<sup>37</sup>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记载：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引朱熹本云：“诗赋取士以来，学者雕敝聪明，及其中选施于有政，无所用之，其所从来久，然莫能革也。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罢黜声律，而修明庠序之教，由是人务经术而识义理者多矣。”又引《选举志》第一卷云：“诗赋浮靡，不根道德，施于有政，无所用之，自唐以后莫之能革。上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议者不深惟其意，羣起而非之。上以为凡此皆士不知义，非其所习见。乃罢黜声律，俾王安石训释经旨，颁之天下。”<sup>38</sup>时真州沈季长任南京国子监教授，以经术教育学子，为南京国子学的振兴作出了贡献。沈季长，字道原，王安石妹夫。其学多得于王安石。自少奋励闭门读书，家人有终岁不见其面者。年十七，举进士，荐于乡，辞章典丽可观。居数年，乃专取群经深探而力索之，至忘寝食寒暑，遂又以经术著称，学者颇归之。转运使上其行义，朝廷赐以粟帛，中进士甲科。

王安石《故朝奉郎……沈公墓志铭》云：

季长字道原。……为南京国子监教授。南京学废久矣。国人多不知学，学者多不知经。公取羣经为诸生讲解，诲诱之甚力。方朝廷以经术取士，士之从学于公者通经为最先，故礼部岁所贡士多公弟子。其后亦复稍稍为时显用。岁满改莱州掖县丞，未行天子召见，问劳命，进所著书。因谓公曰：“朝廷方新学校，朕将用卿典教。姑为朕悉心焉。”除国子监直讲。公出入学舍，与诸生论经，归则谢客，未尝请谒权势。……已而除天章阁侍讲兼集贤校理，管勾国子监。<sup>39</sup>

仁宗后期至英宗、神宗间，由于京师太学的繁荣，而南京国子之学相对冷落。至神宗熙宁间已“南京学废久”，以至“国人多不知学，学者多不知经”。沈季长为南国子监教授，以经学诲诱诸生，时朝廷方以经术取士，礼部所取士，南国子监学为多。沈季长也因南国子监授徒之业绩，升为国子监直讲。进而除天章阁侍讲兼集贤校理，来管理整个国子监事务。颁之天下学府的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一书，也是由沈季长、陆佃与王安石广泛讨论而编定的著作。

南京国子监至沈季长有过短暂振复后，直到靖康变后，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在南京即位，原汴京国子监太学全部教官学生，移置南京国子监，经短暂调整，又随驾迁逃江南，南京落入金人之手，应天府书院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南京国子之学也随之消亡。国子监旧址，成为此地金元明初的府州之学。

作者简介：王树林，河南商丘人。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南通大学教授、硕导，广州华商学院语言文学研究院特聘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古文史与文献研究。

####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七（3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13419页.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第6册）.中华

- 书局. 1995. 第 1597 页.
3.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第 7 册). 中华书局. 1995. 第 1896 页.
4. 8. 12. 14. 宋.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二》第 5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第 2785 页、第 2763 页、第 2763 页、第 2763 页.
5.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一(29 册). 同上. 第 10196 页.
6. 宋. 王应麟.《玉海》.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宋.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十八.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9 册). 同上. 第 2637 页; 另见, 王应麟.《玉海》一六七
10. 宋.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南京书院题名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以上皆据宋.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十六.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三(第 12 册). 中华书局. 1977. 第 3863 页.
-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11 册). 仁宗庆历三年十二月. 同上. 第 3512 页.
16. 宋. 彭乘.《墨客挥犀》卷三.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宋. 石介.《徂徕集》附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宋. 石介.《徂徕集》卷十三《上刘工部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宋. 王珪.《华阳集》卷四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10 册). 同上. 第 2761 页.
- 21.《徂徕集》卷二十. 同上 17.
-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第 9 册). 同上. 第 2677 页.
23.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选举三》(第 11 册). 中华书局. 1977. 第 3657 页.
24. 宋.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三四《士门·唐取士之科》.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宋. 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二《学校·唐六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宋.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第 6 册). 同上. 第 3752 页.
-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第 11 册). 同上. 第 3355 页.
-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第 11 册). 同上. 第 3563 页.
29. 以上俱见宋.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六《士门·学制类》.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宋.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士门·学法类·三舍附》. 同上
-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八(第 21 册). 同上. 第 7239 页.
32. 36. 宋.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七《士门·学制类》.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宋.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二》第 5 册. 同上. 第 2763 页.
- 34.《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第 9 册. 同上. 第 5297 页.
- 35.《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六. 同上.
37.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举士》.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第 16 册). 第 5335 页. 第 5336 页.
39. 宋. 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清代朱阳书院相关问题初探

□ 刘万华



## 引言

书院之名起于唐代，原为修书、藏书的机构，后来演变为独具特色的具有教学、学术研究功能的教育组织机构。自唐代兴起，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诏令天下书院改为各级学堂止，先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书院具有知识积累与传播的功能，也承担着知识更新与创造的使命。因为书院具有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一些代表时代精神的儒学思想与知识范式往往依托书院而酝酿、发展和传播，书院成为学术研究和传播的基地。与此同时，书院也通过跟学术研究的结合与互动，在组织方式、办学宗旨、讲习内容等方面发生变化，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品格，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并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实现地域上的拓展。研究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有利于了解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及传播效应。此外，书院在普及文化、提升民众素质、弘扬民族道德、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等方面亦功不可没。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书院文化是商丘地

域文化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前有北宋的应天府书院，培养了如范仲淹、石介、孙复、韩琦等北宋名臣；后有清朝的朱阳书院，“中州自夏峰、嵩阳而外，朱阳学者称盛矣。”<sup>[1]</sup>卷480第13138页；睢州的洛学书院，远宗二程，近师汤斌，推洛学于即坠，绍世运于清末。书院文化因子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商丘古代文化之中。

商丘历史上共计出现过约35所书院，宋代有2所，元代有2所，明代有8所，清代有23所。商丘古代书院教育发轫于五代，兴盛于北宋，鼎盛并普及于清代。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首推北宋的应天府书院，其次则朱阳书院与洛学书院。学术界关注最多的是应天府书院，朱阳书院虽已引起学界关注，发表了《窦克勤与朱阳书院》<sup>[2]</sup>《窦克勤家族与朱阳书院》<sup>[3]</sup>《朱阳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sup>[4]</sup>《清代士人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以窦克勤丁忧时期为例》<sup>[5]</sup>《四库本〈河南通志〉关于柘城紫阳书院的误记问题》<sup>[6]</sup>等相关论文，但诸如书院创办的原因、兴衰过程、性质等相关问题还有待廓清。

## 一、名称与布局

窦克勤“平生以奖进人材为己任，谆谆劝诱，教思无疆”<sup>[7]</sup>附录徐永宣《翰林院检讨征仕郎柘城窦先生行状》，其一生最用心处在教育，而最为人所乐道者即在创办朱阳书院，冉觐祖尝称其：“殫力书院，为经久之模，四方慕书院者竞相馈遗，规恢益广，云构崇宏，旧士重集，新学日至……予谓先生学优而仕，固已身

列侍从籍注馆阁矣，然其心始终一于书院而无他，其游历风尘，屡进屡退，特应迹尔。其志或未竟，而考其造诣所至，谓之笃学深识，成己成物，无愧也。”<sup>[7]</sup>附录再觀祖《窦先生传》那么作为窦克勤一生最为牵挂和用心的朱阳书院，究竟为何命名“朱阳”，四方襄助下而日臻完善的书院布局如何，这是研究朱阳书院首先应考虑。

### 1. 名称由来

康熙二十八年（1689），进士窦克勤在柘城东门门外开始创办朱阳书院，这是柘城历史上第一所书院。窦克勤为何将书院命名为“朱阳”呢？其中有何渊源，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逐一进行分析。

#### （1）文化渊源

关于朱阳书院的命名，窦克勤曾自述曰：“朱阳书院建于朱襄氏故都之阳，故取名焉。”<sup>[8]</sup>卷二这里一者指明了书院坐落的地域，即朱襄氏故都。朱襄氏，是中华人文始祖之一。朱襄氏部落源于东夷，以朱木为图腾，约六千年前定居于朱（今柘城）。曾加入太昊伏羲氏部落联盟，封飞龙氏，造书契以代结绳，是为中华汉字之源头；伏羲氏之后，朱襄氏为部落联盟首领。此时阴阳不调，“恒风振荡，果木不实”<sup>[9]</sup>卷一，于是，朱襄氏命其大臣士达造五弦之瑟，谱来阴之曲，使阴阳二气平衡，天下和谐，开启中华民族礼乐文化的先河。朱阳书院的创建，正是朱襄氏文化深远影响的具体体现。

再者，窦克勤的自述还指明了书院的方位，即朱襄氏故都之阳。“阳”谓何？南方为阳位，中国古代把南视为至尊，宫殿、庙宇都面朝正南，帝王的座位也都是坐北朝南，当上皇帝常称“南面称尊”。书院的位置是在朱襄氏故都的南面，《朱阳书院志》云：“朱襄古墟，在书院北，地势与书院相近。按，柘旧城为朱襄之故墟，周十一里，内有朱襄庙，明嘉靖二十年黄河决，被淤，迁新城而狭之，倚旧城之南基为北趾。书院置今新城东关，即旧城之东南隅也。”<sup>[8]</sup>卷一在朱襄氏故墟之南创建朱阳书院，与书院东十里的朱襄氏陵以及朱堍寺一起，形成了祭

祀朱襄氏的建筑群，体现了以朱襄氏文化为核心来构建书院景观的理念。

中国古代城池的修建，往往遵循“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的典制，从《朱阳书院志》卷一所绘“朱阳形胜图”来看，黄河故道自西北而来，分为两汉，南汉汇入涡河，北河又分为刘家河、清水河、会河诸河道，自西向东南，也汇入涡河，进入亳州境内，最后汇入淮河。柘城新城位于两河之间，朱阳书院便建于城东关外的护堤之内，位于涡河北岸，可见也符合“阳”的典制。

除了南尊北卑之外，在东、西方向上，古人往往以东为首，供奉祖宗排位的太庙，一般建在皇宫的东侧；皇后和妃子们的住处则分为东宫与西宫，以东宫为大为正。书院建在柘城新城的东门外，院内祭祀“五圣”：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七贤”：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许衡、薛瑄，“五儒”：曹端、吕坤、窦如珠、汤斌、耿介，也是以东为尊这一古制的生动体现。

#### （2）命名过程

书院名称的得来并不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讨论，反复斟酌而定下来的。窦克勤与其父窦大任起初拟将书院命名为“朱丘”，即朱丘书院。但一时不知是否合适，便写信征求好友耿介、陈迁鹤等人的意见，来往反复，最终在陈迁鹤的建议下，定名为朱阳书院。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十，居官京师的窦克勤接到父亲窦大任的家书，获悉父亲“始联文会兴学”<sup>[7]</sup>卷六——有兴办书院的设想。但听说家乡遭受水灾，家计空虚，担心父亲办学的设想短期内很难实现。正月二十五日，专程差人回里，送回皇上钦此的锦缎和俸米等物，以解燃眉之急。三月初九，又遣使回乡，欲接父母来京生活。闰三月二十六日，二弟窦振起来京，但父母因事均未进京，可能就是因为兴办学校之事而被拖累。四月初六，窦克勤收到了耿介的来信：“令弟朴修过嵩下，知太先生开庠兴



学，可作异日睢阳书院根基。嵩阳书院某十余年来，樽节于朝夕饗餐，手口拮据，心血几枯，梦寐之间，独此一事扶植吹嘘，不能不厚望于先生。”<sup>[7]</sup>卷六 窦大任因为兴办书院的事，专程派遣次子窦振起赴嵩阳书院，向耿介学习兴办嵩阳书院的经验。耿介在赞赏窦父努力办学的同时，委婉地劝告窦克勤应该承担起办学的重任。初九，窦克勤便给耿介回了信，讲述了父亲淡泊名利，课子孙读书，以及相地兴办书院的情况：“日闭户教儿孙辈读书，甘淡薄愈甚，处故旧邻里愈谨，虽残冬荒春，糊口不给，而与人善之心愈笃。相城东八里许有隙地可作书院，遂谋众联会，为构书院计。勤因思柘邑乃朱襄氏故都，暂拟朱丘书院，未审当否？先生毕世心力用于书院，此段苦衷，自有作其机而神其用者。勤于书院，无时能忘，勿烦先生过嘱也。”<sup>[7]</sup>卷六 信里重点讨论了书院名称的问题，窦克勤认为书院坐落于柘城东关，因柘城乃朱襄氏故都，因而拟作朱丘书院，进而嘱托耿介给予建议。

八月初六，父亲窦大任携家人到京，探望儿子的同时，更重要的应当是与窦克勤商议书院的事情。耿介对于“朱丘”的命名起初是认可的，可能还建议克勤问问其他友人。于是克勤又咨询了陈迁鹤，陈氏对这一命名提出了异议，指出“丘”字触犯了孔子的名讳，建议定名为“朱阳书院”。接到信后，克勤急忙又给耿介去信：“朱丘书院，承先生指示，似可定名。昨陈介石先生谓‘丘’字乃圣人之讳，不如易朱阳书院，不审先生以为何如？”<sup>[7]</sup>卷六 陈迁鹤的书札已经无法见到，但他在《朱阳书院记》中记载此事，其云：“登封耿逸菴先生讲学于嵩山，静菴先生共倡明焉，尊人道康公辟地于柘城东门外为书院，以其地为古朱襄氏之墟也，拟其名曰朱丘。静菴以问于予，予曰：书院当朱襄之阳，以为‘朱阳’何如？逸菴、道康二先生闻而称许，遂额书院从今名。”<sup>[8]</sup>卷四

历经大半年时间，经过多方咨询和讨论，在康熙二十八年秋，书院名称最终定为朱阳书院，书院

建设的第一步算是完成了。

## 2. 建筑布局

朱阳书院的建设，经历近二十年的时间。据《朱阳书院志》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窦大任创建书院基址。次年，基址建设完成。由柘城县增附生员宋灿、郭三捷、叶振奕公举书院建立，邑侯史鉴首先创建先圣殿三楹，以祀孔子。同时，史鉴向上申报了书院的情况：“朱阳书院，在本县东关，窦敏修先生家居读礼，倡始捐造，延致嵩阳高弟，每月集邑子弟讲学其中，登堂问业，亶亶不倦，理学之盛，继美嵩阳书院。”<sup>[8]</sup>卷二 本年，相继建设门楼、存诚斋、主敬斋、厨舍，皆窦大任创建。

康熙三十年（1691），归德府知府薛晋捐建居仁斋和由义斋。康熙三十六年（1697），建讲堂三楹，由河南提刑按察使孟世泰、开封知府管竭忠、陈州知州张喆、太康知县朴怀宝、获嘉知县何远、鹿邑知县冯际时、西平知县刘斯番共同捐资兴建。三十七年，窦大任又建了友善堂三楹与寡过堂三楹。三十八年，河南巡抚李国亮捐建藏书楼三楹。至此，朱阳书院的主体建筑基本完成。四十七年，窦大任创建先儒祠三楹，柘城教谕苏名勋捐建正学祠三楹，河南提督学政汤右曾、守道崔征璧、归德府知府陈尧策、鹿邑知县谢乃果、柘城知县连肖先共建爱莲亭三楹。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窦克勤去世，此后朱阳书院肄业学生共建了朱阳夫子祠。至此，朱阳书院建筑群最终完成。从兴建过程来看，各级官员和当地乡绅对书院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朱阳书院算是一所民办官助性质的书院。

朱阳书院“基址广袤，门垣宏丽”<sup>[8]</sup>卷四胡介祉《朱阳书院记》，整个布局是座北向南，南临东门通衢，西依护城河，整个院落是四进三层的建筑群，前有窦大任题额曰“朱阳书院”门楼，两边是杂役房，对着大门是照壁，照壁之后是先圣殿，其两边分别是先儒祠和正学祠。其后，是三间讲堂。讲堂左右分别是友善堂和寡过堂，讲堂后面是一幢双层藏书楼，两边配以三乐堂和崇道堂。书院东部有尊道斋、进

德斋、居仁斋、存诚斋与厨房，西部建有主敬斋、由义斋、修业斋、弘毅斋及粮房。整个书院布局整齐，规模宏大。

书院周围则建有望鹤台、白塔寺、学箕园、筠峰祠、春泳池，并有廓山、旧屏山、竹来峰矗立左右，外加清水河、涡水河、绿引溪纤徐其间，整个环境幽静典雅，窦克勤甚为满意，纵览全图，赞为“奇境”，他请人绘制了“朱阳形胜图”，并在《朱阳书院记》中细致描绘了朱阳书院周围景致：“予因是尝徘徊书院之侧，而窃有感焉以其势，西临雉堞，桥梁耸峙，清流回绕，自旧城纤徐南来，不使湍激奔腾而别有沼沚，以蓄于亭垣之右，斯固一奇境也。南望横郭如案，峰峦隐秀，傍东西两路，合抱会于郭外，如两翼然。东南一带，郁郁苍苍，柏干参差，竹林茂密，中有别墅，以通其气脉。而近则烟相连，市缠相错次。北而先筠峰祀乡祠，巍踞旧屏山之阳，与此正坎离相向。复左右纬以唐宋古寺及余学箕园，俨然层镇叠幃，拱其项背。噫，势之所极，人文萃焉！”<sup>[8] 卷四</sup>

## 二、创办与盛衰

### 1. 创办的原因

朱阳书院的创办，与其创办人窦克勤的身世经历和柘城的客观情况密切相关，其创办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 (1) 弥教化以振乡风

书院同学校一样，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作用，守土者到任一地，往往首先兴学校以正民风。当时，柘城知县史鉴“莅柘二载，政修化行，月吉读法而外，惟以兴学育才为急”，同时克勤也非常认同“书院之立，与学校相表里，必使学者耳目定心志一，而后可以语至道”<sup>[8] 卷四</sup>窦克勤《朱阳书院创建圣殿记》的理念，于是便创办书院以弥教化。柘城是朱襄氏故都，朱襄氏制书契以代结绳，创造了中华汉字的雏形；造五弦之瑟，谱来阴之曲，使阴阳二气平衡，天下和谐，开启中华礼乐文化之先河。虽然柘城历史久远、文化厚重，但历经战乱摧残与频繁的黄河水害侵袭，

已是“僻陋穷乡，师承乏人”，文风不振。窦克勤发扬前迹，接引后学，“于省亲旋里，辄念乡党后秀，无以化德性而变气质，孜孜讲学”<sup>[8] 卷四</sup>胡范《创建朱阳书院纪略》，期“父言慈，子言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推之而朋友信，推之而为臣忠，而天下定矣”<sup>[8] 卷四</sup>路于茶《朱阳书院志序》，充分体现了窦克勤为圣贤布道之心，成己成人的宽广胸怀。

#### (2) 弥缺憾而补遗漏

可分为两个方面，一者弥补家族缺憾，柘城窦氏是一个教育世家，克勤的祖父窦如珠生当明末动乱之中，讲学而未尽其志；父亲窦大任亦讲学乡里，常思继述先人，谋的讲席之地而不得；另一个方面，则是弥补归德府及柘城书院之缺。冉觐祖在《朱阳书院记》中表述的很具体：“昔称四大书院，而嵩阳、睢阳并在中州，东西数百里间，风教相鼓动，固极盛已。元明以来，两地寂无传人。今值右文之世，书院宏兴。登封耿逸菴先生修复嵩阳书院，视昔有加，而睢阳书院竟成绝响，不可复问。论者以为昔之四大书院，今有其三。而在中州，则二大书院仅有其一。嵩阳即盛，其势孤立，终当让美于前人也。柘城窦静菴先生力辟朱阳书院于邑东门之外，聚生徒讲道其中。而朱阳之名，遂与嵩阳相埒，学者不西赴嵩阳，则东走朱阳，俨然如昔之嵩阳、睢阳并盛时也。可借以补四大书院之缺，而在中州亦足复二大书院之旧。”<sup>[8] 卷四</sup>耿介曾劝窦克勤云：“宋四大书院，吾豫居二，前人已往，后人未来习此业，公此事可因则因，不则何弗创以为因。”<sup>[7] 附录</sup>窦大任《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家男克勤行略》位于归德府城的应天府书院（明末称范文正公书院或文正书院）废而未兴，而柘城向无书院，朱阳书院的创办也就弥补了这几方面的遗憾。

#### (3) 继嵩阳而广洛学

顺治七年（1650），孙奇逢卜居辉县苏门山，辟兼山堂，讲学授徒。又兴复太极（百泉）书院，主讲书院达二十五年之久，学徒门生遍及南北，诸如耿介、汤斌、张沐等河南书院讲学的主要人物，

几乎都与夏峰有密切关系。正如清初睢州学者田兰芳所言：“皇朝云雷之初，孙钟元先生自燕来徙，讲授于邵、姚之故址，一时负笈来学者甚众，苏门淇水间飒飒乎有弦歌之声焉。于是两河文教聿兴，如吾里汤潜菴司空、吾师徐我菴处士、上蔡张仲诚、登封耿介石，或受业门墙，或辨质鹅湖，或景慕私淑，无不实其归而树之风。自是程氏所传之道，复大明于中天焉。”<sup>[8]</sup>卷四《朱阳书院志序》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对洛学在清初的复兴起到了先导作用。康熙十三年（1674），登封知县叶封修复嵩阳书院。康熙十六年（1677），耿介建丽泽堂，开始聚徒讲学。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嵩阳书院重建工作全部结束，规制大备。嵩阳书院完成重建并开门讲学，拉开了洛学复兴的序幕。

窦克勤虽未亲执弟子礼于夏峰，但与其得意弟子耿介、汤斌声气相求，过从甚密，十年之间，曾六过嵩阳，相与探讨天人性命之理与书院发展之策。克勤受到孙奇逢、耿介及汤斌等人的深刻影响，兴办朱阳书院，聚徒讲程朱之学，毅然以兴复洛学为己任。

## 2. 盛衰的过程

朱阳书院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创办、兴盛与衰落四个阶段，从康熙二十八年创办到道光八年重建改名，大致存世130年左右。

（1）萌芽期：康熙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1677—1689）

窦克勤的祖父窦如珠生当明末动乱之中，讲学柘城而未尽其志；父亲窦大任亦讲学乡里，常思谋讲席之地而不得。康熙十六年（1677），耿介于嵩阳书院建丽泽堂，开始聚徒讲学。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克勤赴京会试，与睢州汤斌订交，往复论学，潜庵为述嵩阳书院讲学盛况，克勤心向往之。康熙十九年八月，第一次游嵩阳书院，盘桓月余，与耿介订金石之交。其后，又分别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年正月四次游历嵩阳书院，读书论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

窦克勤赴任泌阳教谕，到任伊始，便修夫子之庙，建五社之学，起童子之会，讲学论文，人心鼓舞，士风丕变，积累成功的办学经验。其父对此大为肯定：“于民房傍学宫者藉栖之，虽陋极，不暇计。每月朔望次日集诸生讲学会文，诲以学问大义，傲朱子白鹿洞规，辑圣贤切要之言，使学者触目惊心，破习见而砥新德，分五社，按东、西、南、北、中而配之以仁、义、礼、智、信，每社择德望可式、学行足法者为社长，付以劝善规过簿，令纠察社众，善过登籍而记，以行劝惩。外起一童子会，聚邑中俊秀十四五岁者，令读五经性理。十岁以下者，令读《孝经》小学。于讲学后三日入先师殿背书习仪，讲说义理，以开导之，人心鼓舞，士风蒸变。”<sup>[7]</sup>

附录窦大任《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家男克勤行略》另外，康熙前期逐渐废除了书院办学的禁令，康熙皇帝曾先后亲自给各地书院赐额赐书，推动了各地书院的建设。到了康熙二十八年，书院的选址和名称基本确定，兴办书院的构想和蓝图已经成型。

（2）创办与发展期：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89—1699）

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89—1699）是书院的发展与完善时期，表现在基础设施和规章制度建设两个方面。

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经过和耿介、陈迁鹤等人的商议，朱阳书院的名称最终确定下来。先前，窦大任已经在柘城新城的东关外，选好书院建筑用地。二十八年底，在窦大任的主持下，破土动工，营建地基。十一月十六日，母李氏卒于京师。十二月二十八日，克勤扶柩归里。二十九年夏，家居读礼之暇，开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窦大任的经营创造下，鸠工庀材，先建门楼一座，次建讲堂三楹，再次斋房六楹，东存诚斋，西主敬斋，又次厨房、粮房、役舍若干区。又得知县史鉴捐建先圣殿三楹，归德府知府薛晋捐建居仁斋、由义斋各三楹。至康熙三十年秋，书院建筑已经初具规模。其后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河南提刑按察使

孟世泰、开封知府管竭忠、陈州知州张喆、太康知县朴怀宝、获嘉知县何远、鹿邑知县冯际时与西平知县刘斯番共同捐资创建了讲堂三楹。康熙三十七年(1698), 窦大任又创建了友善堂和寡过堂各三楹。康熙三十八年(1699), 河南巡抚李国亮创建了书院的最高建筑——两层的藏书楼。至此, 书院的主体建筑、门楼、先圣殿、讲堂和藏书楼全部完工, 书院的斋舍及周围景点如学箕园、念修堂、乐山亭等也相继修建。

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窦克勤也非常注意书院的制度完善。首先, 他参照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以及自撰的《寻乐堂学规》和《泌阳学规》, 制订了为人之道——《朱阳书院条规》。其后, 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八月初四, 制订为学之道——《学要》。十二月初二, 制订学生行为规范——《戒条》。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初三, 制订礼仪规范——《仪注》。至此, 朱阳书院教学的各项规章制度趋于完备。

(3) 兴盛期: 康熙三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699—1708)

康熙三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699—1708)是朱阳书院的兴盛期, 这一阶段的朱阳书院在教学、藏书与刻书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教学上, 窦克勤从翰林院带病家居, 亲自掌管书院, 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书院日常讲会论文上, 聚徒讲书, 课士举业, 彬彬称盛。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二十六日, 由河南巡抚捐建的藏书楼完工。二层建筑的藏书楼是朱阳书院的标志性建筑, 又是河南最高行政长官捐建, 更是藏书与刻书的具体实施场所, 同时又能服务于教学, 因此藏书楼之于朱阳书院显得尤为重要。在这十年间, 朱阳书院不仅收藏了大量书籍, 更重要的是刊刻了大量书籍, 所刻之书一般题署“朱阳书院藏板”或“寻乐堂藏板”, 仅《朱阳书院志》卷五所载“寻乐堂藏本”达三十四种, 计百余卷。这一时期也是窦克勤个人学术的辉煌时期, 他的思想日臻完善, 代表

作如《事亲庸言》即在康熙四十五年完成, 其他代表著作也多在这一时期刊刻面世。

(4) 衰落期: 康熙四十七年至道光八年(1708—1828)

康熙四十七年至道光八年(1708—1828), 是朱阳书院的衰落直至废弃时期。朱阳书院虽是民办官助建造而成, 但实质上仍是一所家族书院。家族书院的发展往往与家族的兴衰密切相关, 而家族的发展又系于族人仕途与学术的成长。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午时, 五十六岁的窦克勤赫然长逝, 作为窦氏家族仕途与学术的绝对代表, 窦克勤的逝世标志着窦氏家族和朱阳书院走向衰落的开始。此后虽也有年迈的窦大任(康熙五十五年, 八十四岁去世)、弟弟窦克让以及子侄辈如窦容恂、窦容邃等主持书院工作, 但影响都远不及窦克勤。加之战乱和自然灾害的破坏, 朱阳书院最终在嘉庆、道光年间废弃, 直到道光八年改建为文起书院。

关于朱阳书院废弃的具体时间, 迄今尚无定论, 《朱阳书院志》《柘城窦氏家乘》《[光绪]柘城县志》《[乾隆]归德府志》均无明确记载。或曰: “道光八年(1828), 邑人重修。有《朱阳书院志》。清末废。”<sup>[10]</sup>第二卷, 第947页或曰: “窦克勤去世后, 他的弟弟及儿孙们先后继续主持朱阳书院, 其教育史前后达百年。”<sup>[11]</sup>第73页或曰: “(朱阳)书院从康熙中叶至乾隆初年, 兴盛60余载, 实乃古代私家办学所少有。”<sup>[12]</sup>第127页以上三种说法均未注明来源, 不知其所依据材料来自何处。据《柘城县志》, 道光八年(1828)知县富成创建文起书院<sup>[13]</sup>卷二, 极可能是因为朱阳书院废弃不兴后, 富成为振兴柘城书院教育而做的有针对性的工作, 正如邓洪波先生在《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将道光八年重建为文起书院看作是朱阳书院的重要转折, 是有道理的, 但认为文起书院及稍后的襄山书院就是朱阳书院, 到清末废止, 则不准确。我们认为道光八年文起书院的创建是柘城书院教育的转折, 标志着朱阳书院废弃。朱阳书院的办学历史约即康熙

二十八年至道光八年（1698—1828），其存世的时间约一百三十年左右。

### 三、学规与讲会

#### 1. 学规

为了教育子弟生童，把他们培育成才，引向圣学之途，窦克勤为朱阳书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包括《条规》《学要》《戒条》与《仪注》四个部分。朱阳书院学规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为范本，参考窦克勤早年教育子弟的《寻乐堂学规》和任泌阳教谕时制订的《泌阳学规》，根据书院的具体情况，条分缕析，更具针对性，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确立办学宗旨

通过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为生童树立远大的志向，为同仁确立明确的目标，以期他们能够立志高远，从而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窦克勤在《条规》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之设，所以待贤者诸君讲习其中，欲与世争荣利乎？抑将考証身心求得于己乎？如求得于己也，理本固有非，假诸他人，事属分内，何待于外索！披览诗书，所称传人，孰非念天地生我之故，重君亲成我之恩，体圣贤教我之实乎？今与诸君讲说，不原天地生我之故，不知立天下之大本，不明君亲成我之恩，不知尽天地之大伦，不举圣贤之实，不肯肩古今之重任，兹故忘其固陋，共订学旨，期与诸君正其趋，坚其守，鼓其力，成其诣，以无负今日来学之意焉。”<sup>[8]</sup>卷三书院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学得广博的知识，抑或是会做华丽的文章，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以圣贤为榜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正如朱熹所云：“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sup>[15]</sup>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学规》

##### （2）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

窦克勤既注意采用理性的分析与规劝，又注重日用伦常规范的建立，以期书院生童提供更多进善达德的帮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立品与力行。

立品就是要培养优良的品质。《条规》的第一条就是“原天地生我之故”，要明白天地生人的原因，天地所生之人，要具备仁义礼智之性，怎样具备这种品质呢？天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礼、尊礼和守礼。鉴于“礼教不明，尊卑失序”，窦克勤又制定了《仪注》十一条，即具体的日用伦常规范，以便于操作，《仪注》如下：

一、书院诸生，每晨早起，入先师殿一揖致敬，朔望日随拜先师毕，入讲堂一揖，诸生东西向各一揖。

一、礼教不明，尊卑失序，其在于今师弟尤甚。今拟书院礼仪，隅坐随行，断不容越。诸生宜明大体，无论在书院及入先生之家，俱循此礼。

一、诸生既系同学，宜以年齿为序。齿序既定，凡登堂讲习，只以长幼分行坐之，先后不必牵缠固让。

一、凡来学者必有介绍，通其姓名、里居以及为人之大槩，入见时止用红贴，全幅书姓名于其上，投之以此当贄，不用仪物。

一、每逢三、六、九日，主人至书院考课，诸生齐集赴讲堂，疑义相质，身心互証，以毕讲习之功。

一、书院有宾客之应酬，有文字之记录，宾客应酬，司应对者专其事，文字记录，司笔札者专其事，每岁随时派四人掌之。

一、凡尊长至书院，司应对者延入讲堂，集诸生齐赴一揖，卑幼则否。

一、凡远宾至书院，司应对者周旋之，司笔札者书明姓名、里居，有道者诸生齐集一揖，寻常则否。

一、学者有事回家，司笔札者登籍记之，书明某人于某日因某事回家，来则书至日。

一、凡官长至书院讲书，诸生于大门外候迎，回则候送，常至则否。<sup>[7]</sup>卷十三

其次，祭拜先贤。

祭拜先贤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目的是树立生童敬畏先贤的肃穆感和仪式感。《仪

注》的第一条就规定：“书院诸生，每晨早起，入先师殿一揖致敬，朔望日随拜先师毕，入讲堂一揖，诸生东西向各一揖。”

第三，制订戒条。

戒条是明确告诉生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即“以贤者期诸生，诸生亦当以贤者自爱”，从而用伦理道德具体指导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窦克勤详细罗列了禁止的项目，“求讲官情，求照私事，求发书函，求荐馆宾。”这些是针对外部人员请求学生的内容，一旦发现上述内容，虽然与学生无关，但要坚决摈斥。此外，还列举了作为学生应该禁止的行为，“讥刺时事，谈人闺门，戏墟滋蔓，诬诈长伪，爱取人物，忌毁人善，藉匿书籍，阴窥私篋。”以上这些内容应当是作为学生自己努力杜绝的行为。

由上述禁令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外界的烦扰而言，窦克勤更看重内心的修习。作为一名向圣学进取的学子，如果自己内心达不到平静的状态，恐怕很难在学术上取得好的成就。对于他者给学生造成的麻烦来说，我们从上述四项禁令观察，大多是与官方，即“公”的内容相关。关于自身内心的修习却内容繁多，包罗万象。这些内容既包括不可议论时事这样维护朝廷统治的内容，也包括禁止谈人闺门这样戒色的内容。窦克勤所立的禁令就是包括对自身色欲、贪欲等恶欲念的斗争。在他的心中，作为人，尤其是作为圣门子弟的读书人，应当努力控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而使自己远离禽兽的行列，这样才能达到向圣学前行的目的。而作为学子，只有从各个方面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修习才能够达到国家用人取士的标准，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 （3）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

书院山长往往是德学兼备的宿儒，读书为学，经验丰富。书院学规大多是山长半生读书经验的总结，言出肺腑，语凝心血，不论正面的引导，还是反面的戒饬，都可视为书院教育实践的理论结晶。窦克勤制订的《学要》：“立志有任无让。共学损高就卑。致功专一不迁。养神从容多暇。进德尝怀

靡及。读书深味自得。涵泳客气消除。充裕道心久贞。”就是他半生学习经验的总结，简洁明了，简介地有时难以琢磨，当然这也符合他的思路，为学最重要的是体悟，这八条方法的总结是他自己的体悟，总结出来，更是要童生门去体悟。

再配以早年教育子弟的《寻乐堂学规》及任泌阳教谕时所定《泌阳学规》，整个书院的课程内容、学习方法、行为规则等一整套内容就十分完善，从而建立起有效的教学和学习体系。

## 2. 讲会

会讲是书院举行的学术活动，相当于当代的学术研讨会，《中国书院辞典》给“会讲”的定义是“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聚会”，“形式不一”，“既有书院讲会中的会讲，亦有书院外进行的会讲”。而辞典给“讲会”的解释是“一种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朱阳书院的讲会则包含两部分内容，一者是讲学，一者是会文。讲学就是主讲人宣讲四书五经中的某段经典，然后官士析疑解惑，互阐学旨，达到融会贯通。会文，则类似于讲学之后给听讲生童布置的心得体会，选择一个日子，进行讲评和交流，并评出高下。

朱阳书院规定每月初二日讲学，十六日会文，三、六、九则考课。其教学情形，窦克勤有记载：“予不揣固陋，时同来学者讲贯于内，仍泌阳教法，讲学会文，以初二、十六日为率。每值讲期，携仲弟振起随大人后三揖，进邑侯、广文诸绅于前，诸生以次序坐。少间，司讲者揖立讲案前，讲书某章，人皆肃然起敬，无惰容。讲毕，揖而退。官士析疑解惑，互阐学旨，于天人性命，盖油油如也。日过中，稍休，具麦食菜羹，器以五，设席以十计。史公亦时具饌礼，学者鼓舞，作兴不辍，以故簞瓢疏水之味，屡尝于古柏阴森之下，而人不之厌也。会文亦然。其余日皆来学者讲习之，常与邑人士少长咸集，盖不同云。”<sup>[8]</sup>卷四《朱阳书院记》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日，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窦克勤便开始了朱阳书院的第一次讲学活动。知县史鉴等官绅及生童七十余人参加了这次讲学活动，

窦克勤讲了《论语·弟子入则孝》，讲完之后，知县史鉴发挥“孝”字之意，讲了他对孝道的理解，克勤赞同史鉴的观点，将其讲论内容记入《朱阳书院讲学纪事》，并云：“书院得闻公孝道之论，深幸与《孝经》之旨相为发明，因纪其事，并附一言于后，以俟人之深求而自得者，岂徒纪一时之盛迹云尔哉。”<sup>[7]</sup>卷七 启迪学生去体悟和实践。

### 结语

窦克勤不乐仕进，醉心学术，将其一生都献给了他心爱的教育与学术事业。在他的五十六年生涯中，读书和病痛成了日常生活主题，有时整日整月地受到病痛的折磨。从其《寻乐堂日记》中，可统计出他经历的病痛主要有“脊骨病”、“目病”、“足痛”、“指肿痛”、“心神不宁”、“膝痛”、“病痔”、“气不接”、“病痢”、“风寒”、“腹痛”等，长期的病痛并未消磨他的意志，反而忍痛苦读，不仅中进士晋翰林，而且创办朱阳书院，汲引后学，著述等身。这种精神，满满的是正能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窦克勤嫉恶如仇，他的身上闪耀着知识分子的坚守和品格。为修建朱阳书院，窦克勤四处筹措经费，他向有名望、地位的人发出邀约，有时亲自登门拜访，但对于捐助修建书院财富也并非来者不拒。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三日，窦克勤收到的一笔来自归德府知府的钱款二十四金，数目虽然不大，但他却坚决推辞不受。至于原因，他表述得很明确，此人“借助军需之名苟征里民七千金，众苦之，绅士求予恳令宥免。令开免两月余……至是令复征，声言抚军谕太守为此举，势不能去。作威逼法，更益三千之数。予足病卧榻，令使人以利诱之。病愈，令出郡侯所捐书院银二十四金来视，实令金也，予辞之。”<sup>[7]</sup>卷十三 知县假借知府的名头来捐修书院，实为一场贿赂的闹剧。而对于前任知县史鉴，因其操守清白，造福一方，故窦克勤每每提及总以“父母”相称，也表达了他对于固守道德的人士有一种嘉许和赞扬。对于此时的县令，窦克勤却丝毫不留一点情面，被拒绝之后的第二天，县令又来送钱，照样被窦克勤坚决推辞。这样的行为，把他固守传统道德底线

的形象很清晰的刻画了出来。

在窦大任、窦克勤兄弟及子姪的共同努力下，朱阳书院影响日大，来学者日众，与百泉书院、嵩阳书院并称中州三大理学教育中心。在百余年的办学过程中，朱阳书院为归德府及周边地区培养了大批贤士，在整个河南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以窦克勤为代表的柘城窦氏家族和他们心力所注的朱阳书院，在清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文学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深入挖掘。

作者简介：刘万华，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等. 清史稿 [M], 中华书局, 1977 年.
- [2] 王树林. 窦克勤与朱阳书院 [J]. 商丘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7 (03): 49-50.
- [3] 郑颖贞. 窦克勤家族与朱阳书院 [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 26 (04): 16-20.
- [4] 程嫩生. 朱阳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 [J]. 大学教育科学, 2010 (05): 74-77.
- [5] 张博. 清代士人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以窦克勤丁忧时期为例 [J]. 青海民族研究, 2015, 26 (02): 153-156.
- [6] 张劲松. 四库本《河南通志》关于柘城紫阳书院的误记问题 [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2 (10): 59-61.
- [7] [清] 窦克勤. 寻乐堂日记 [M]. 清光绪十年大兴黄振河重刊本.
- [8] [清] 窦克勤. 朱阳书院志 [M]. 清刻本.
- [9] [元] 陈桎. 通鉴续编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邓洪波.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M]. 中西书局, 2011 年.
- [11] 张云祥. 柘城县教育志 [M].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 [12] 李光生. 古代河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 [M].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 年.
- [13] [清] 元淮等纂, 余嘉穀等修. [光绪] 柘城县志 [M]. 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 [14] 朱汉民. 中国书院文化简史. 中华书局, 2010 年.
- [15] [宋] 朱熹. 晦庵先生文集. 宋庆元嘉定间浙江刻本.

## ● 人文往事 ●

## “回头十八年过”

## —— 师院琐记

□ 常丽洁



从进入商丘师范学院工作到现在，已然十八年了，真如词里所说：此身虽在堪惊。这样漫长的时光，似乎是可以回头顾盼的好理由了，于是，在照例的几个夜半惊梦的间隙，慢慢梳理出一些尚值得一记的往事来。

我是在2005年夏天，硕士毕业在京飘荡一年后，不满于励志书编辑的工作，而决计返乡教书的。当然，逢人问起因由，一般都是开玩笑的口吻，用黄永玉给沈从文墓碑的题刻作答：“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那时新区启用不几年，西边尚以现学生宿舍、音乐楼、教工家属楼、体育馆一线为界，更西也更低洼的湖山佳处还是某部队的司机训练大队，尚未腾售给学校。

负责接收我的人文学院的前身文学院之更前身的中文系，当时的办公室设在现应天楼的三楼，试

讲则是在现智圆楼一楼的某个小教室。讲了什么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但本科既不是学中文，又没有任何授课经验，且年少气盛，各种不屑成规，表现之糟糕可想而知。及今回想，也觉冷汗涔涔，不免感念前辈同事之善意包容。讲毕，当时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左怀建老师在走廊跟我聊了几句，赞我硕士期间还发了几篇小文章，我大惶悚，因早已读到过左老师研究施济美、东方朔的文章，无论趣味还是行文都能自成一家，是非常值得敬重的，于是诚心诚意谦虚说“比您还差太远”。此话一出，左老师笑了，解释说他意思是我和一起来求职的几个年轻人比，还算是发文稍多的。我大尴尬，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托大，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很难完全避免，但因这一次的教训，多少还是收敛了一些。而左怀建老师的谦谦君子之风，也奠定了我对学校最初的好感。可惜的是，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左老师，等我秋季开始上课时，他已经调往浙江工业大学工作了。

入职后，学校安排的住处可以二选一，一是新区的新公寓楼，二室一厅或是三室一厅几个人合住的那种，再就是老区的化学实验楼南的一栋二层破旧小楼，一人一间，走廊的水池和两头的卫生间公用。我选了后者。

这个楼相比别的楼年数久了些，条件也比较简陋，似乎也不值得怎样装饰，只把旧床单夹上几个



夹子，挂在窗户上沿的铁丝上，凑成一个窗帘，再略备办些被褥盘盂，就住下了。那时心境，或不外乎前程未卜的虚悬感，当然不会想到以后会在师院一待十八年，直至今日。

同住的都是新入职的年轻人，有体育老师说她的课是带学生户外做操，惹我羡慕不置。我被大家称赞的则是一个又厚又大的瓷碗，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对面的当代商城买的，价格不菲，我拿来吃面条，众人皆曰奢侈。后来虽然数次搬家，这个碗倒一直好好留着，十八年来连釉色也未损伤分毫。

住不几个月，这个楼就拆了，学校给点租金，我自己又贴补点，在五家属院租了个两居室住，没什么家具，于是一个房间摆张床，另一个房间摆个桌椅，每日空空荡荡走来走去，也很有意思。我住的那个单元一楼是中文系一位马姓教师的家，据说马老师多病，很少上课，也从不去系里，所以我无缘谋面。那个冬天，我下楼时，总见他妻子戴一副眼镜、穿得厚厚的、坐在楼梯下摆弄煤块，身上和镜片上不免沾些煤灰，那时还没有集中供暖，病人的冬天想必更难过。这个场景不知怎么一直难忘，每想起辄多怅惘。

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就搬到老区的青年教师公寓了，最西边单元的三楼西户，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三十二个平方，这个数字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年拟了一副蹩脚的春联：“卅二平蜗居，能酒能棋能春色；廿七载浮生，友直友谅友多闻。”当然没贴出来，因为门楣窄仄，实在贴不下这样的长联。说到春联，次年返京读博，开始两地奔走，又拟一联云：“辗转燕宋，无奈生活在别处；悠游教读，且喜传薪有斯人。”平仄不工之外，意思也是托大，我何曾真正悠游，又哪里有薪可传呢？

那年我妹也毕业回商，开始跟我同住，卧室里满满当当放了两张小床、一桌一柜，客厅更小得可怜，于是一个大书箱索性没打开，往中间一放，铺层桌布当饭桌用了，坐的只有两个马扎，有客就挪小书箱来坐，条件简陋如此，居然也先后请过几个人来吃火锅。年轻人的寒素清简就是这样坦然无愧怍、甚至于堂皇的。

因为在楼的最西侧，夏日西晒，如同蒸笼。好处自然也有，阳台正对操场，视野旷阔。那时还未铺设塑胶跑道，操场中心更是荒草没胫，暮色四合时，从高处看去，有久远的蛮荒感。

第一年上大学语文课，授课对象是化学系和计算机系大二的学生，地点是现在的老区进门西侧的二号教学楼。讲了些什么自然也全不记得了，只记得让学生写过几次作文，一次是让写人，多数学生交上来的都是写自己父母祖父母，不外乎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忍辱负重之类，我有点忍不住，尤其反感“己年近半百”之类的表述，课上大大发挥了一下，大意是现在人寿逾七十，年近半百者尚在壮年，外出打工也是前半生难得的可以到广大世界去看一看的机会，且每个人的生活总是苦乐掺半，所有人都把自己父祖塑造成苦哈哈的形象，似乎有违真实且大可不必，人进了大学，写作文是不是可以试着写点自己真正要表达的东西，不要那么模式化？不知是不是这番话有了点效果，后来的作文就能看到几篇出彩的了。一个计算机系的男生，写很长一篇文章分析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尤其对“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几句有精彩的发挥，我毫不吝惜地在课上褒扬，这个学生后来写给我一封信，说自己的作文从来没被老师夸奖过，都嫌他瞎扯没正形，我的赞赏让他意外。还有一个化学系的山西籍女生，作文里说，来到学校很久，才发现商丘的蝉鸣声跟山西的不一样，倘不是品种有异，就说明动物也有方言。看完不禁莞尔。这个女生静气寡言，后来考研去了福建。她们班直到现在还有两人跟我保持联系，一个毕业后回老家汤阴工作，一个读研读博留在了南京。这就是我最早的学生了。

那时同事们似比现在亲近些，逢年过节，系里都会聚餐，最初两年喜欢去民主路上的三秋宾馆，热热闹闹坐上好几桌，领导们举着酒杯挨桌敬酒。元旦且有联欢会，同事间颇有几个好嗓子：刘广辉老师音色清亮，唱《外婆的澎湖湾》本色当行；杨春风老师唱黄梅戏《女驸马》，“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我也曾赴过琼林宴 我也曾

打马御街前”，字字入耳；张松林老师模仿二战时期希特勒讲话，声情并茂，笑翻全场。平日遇有婚娶添丁一类喜事，当事人都会买一大袋瓜子花生糖果送去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周琼老师就热络地张罗大家吃，有时就边开会边嗑瓜子，据年长的同事说，再早几年，开完会还会拉开桌子打扑克，我生也晚，不及见此盛况，对现在的镇日忙于课题论文的年轻人来说，怕更像白头宫女说玄宗了。

初入职那年还与副主任彭国栋老师以及外语系的曹庆艳老师一道，往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开一个文学伦理学的会议，路上听彭老师讲了不少系里的往事，其中提及传奇人物宋立民老师，说某晚几人一起喝酒大醉，宋老师抱着路边旗杆不撒手，吟诗云：“你不醉，我不醉，马路边上谁来睡？你不醉，我不醉，五星红旗谁保卫？”此事简直可以写入世说新语。可与媲美者是十多年后，我见吴秀仁老师开了新车，问几时买的，吴老师答：“有一天下雨，我站在门口看一会儿，忽然不想走路了，就去买了个车。”——较之雪夜访戴一类故事，似也不遑多让。

初入职时，还听系主任王增文老师说起，文学理论教研室在我之前有位年轻女教师，硕士毕业后没有返校任教，而是在新乡某网吧给家里哥哥发了封邮件说要出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账户里还有学校给的三万块钱安家费，一分没动。此事也引起我无数次的遐想。还是那句话，世间从来不少传奇故事与风骨人物，端在人如何描摹、如何讲述而已。

新区西边大片土地从部队购得后，学校就开始大兴土木，挖山填湖、盖楼修路，渐有如今雏形。某年有感于季羨林坚持往朗润园湖中扔莲子终于换来满湖红莲，又心仪叶圣陶“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句，遂搜集扁平如扣子状的紫藤花种子百余粒，在新区老区的边边角角悉数播撒，希望有万一之可能，异日得见紫藤花开。当然，我紫藤花的梦终究没有实现，而十八年，就这样过去了。

作者简介：常丽洁，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 师 专 小 忆

□ 吉茂飞



看到昔日同窗司永海院长写了一首校园春景：腊梅将尽香犹在，玉兰盛开正当炽；辛丑放眼春意绚，奋蹄何须挥鞭时。又想起我的母校——商师。

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现在回忆起我读书时的师院时光，依然无限留恋。那段读书岁月中，最美的记忆就是学校的大食堂了。最难忘怀的是食堂的馅儿饼，里面填满了粉条和条条缕缕的肉丝，吃起来，冒着浓郁的香味，那种美味

自离开校园再也没有吃过。

其实，那时的餐厅条件非常简陋，是学校的一个“多功能厅”，餐厅只是它其中的一项功能。没有桌椅，没有什么餐具，大家放学后自带餐具，吃饭的时候大家分工合作，我当时就是和室友李伟民一块儿吃饭，有时他盛汤我买馍，有时我买饼他打菜，就餐时或席地而蹲，或者把饭菜放在窗台上，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是一天繁忙的学习生活中难得的闲暇时光。

其他人也有三五成群儿一块儿吃饭的，嘻嘻哈哈，开着粗糙的玩笑，男女一对儿共餐的都是静悄悄的在角落里吃饭。因为我们学校的伙食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隔壁师范学校的许多学生也经常来我们学校蹭饭。

这个多功能厅，晚上的时候就变成了学生们交际舞的大舞厅，一到晚上，和着音乐，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流光溢彩，就一个白炽灯泡。男生扯着男生跳，女生扯着女生跳，我们的一个60岁的老教授看不下去了：“男生就不能拉着女生跳吗？”这个教我们的老教授姓什么忘了，倒记得老家是我们柘城的。我看着也很别扭，如果在欧美国家，这些同性组合恐怕要被看做是同性恋了。

星期天的晚上就是学校放电影的场所。主要播放经典大片，《魂断蓝桥》和《罗马假日》曾激荡了多少同学的青春岁月，当然，有时也放映一些今天所谓的“抗日神剧”。每个周末，都会吸引周边不少外校学生前来观看。那时候的大学生们没有手机看，看电影就成了大家一起消磨周末时光的重要方式。

师专当时是商丘的最高学府，那时高校管理相对宽松，不像现在的大学管理这么严格，不是电子扫码就是门岗盘问。那时其他学校的学生，像中师，电大，技校的学生都可以到我们的校园来玩儿。隔壁电大有个原高中郭姓同学就经常来我们学校打乒乓球，当时我的乒乓球都是她教会的，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我们宿舍共有八个人，寝室很简陋，不足20平米。分上下床铺，我在上铺，我们的室友来自全地区七个县区。还有一位是驻马店平舆的王同学。这位同仁在高中就谈了一个朋友，有时他会分享一些谈恋爱的花絮，对于其他几个不谙世事的同学来说，实在是新鲜的经验。石同学好像也谈了女朋友，他比较成熟老道，隐藏较深。现在想来，谈恋爱甚至失恋，都是人生中难得的体验和历练，无论结果如何，当事者都会在交往中成长，成熟了很多。

我们那时的男女宿舍都是没有浴池的，入夏之后天气暖和，每到晚上睡前，同学多在盥洗间简单冲洗，旁边还有学生在洗衣服，刷牙，洗脚，里面充满着洗衣粉、荷尔蒙和汗臭混合的味道。男生寝室楼和女神寝室楼相对而建，周末的晚上，寝室楼上有歌声响起，对面女寝室的女神们，也会时而应和几声，空气瞬间热闹起来。

宿舍九点半统一熄灯，熄灯后，宿管人员便会在楼道间大声喊话，“都睡觉了，不准喧哗”。手电筒的光影乱晃，有时候会透过门窗照进寝室，随后，各个宿舍渐渐就没有声响了。每个周末，学校不安排功课，我们宿舍的学生通常会到操场打两个小时篮球。我比较喜欢看书，偶尔会去学校图书馆去看一些杂志，当时看的比较多的杂志是《大学生》。那时的学生比较单纯，生活也相对简单，学习、侃大山、打球儿成了大学校园的主题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学生的体魄都很结实。

那时候最喜欢上的课就是体育课了。有人说，体育老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此言差矣。教我们的体育老师姓张，智商情商都很高，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而且他当时都已经涉入股票行业了，据说他还赚了很多钱，买了几套房子。比起中小学的体育课，我们掌握了很多动作和要领。像前空翻后空翻、俯卧撑、引体向上等等。我是学校的足球队员，那时候张老师在同学面前说一句“吉茂飞同学踢球很勇敢”，这句话让我受用一个多月。最让我自豪的一件事，是我大一的时候，期末体育达标，我

的立定跳远成绩是二点五三米，这个数字不但在我们班是第一，而且我以后也没有超越过这个数字。

大学时光一去不复返，青春何处不风流。大学就是一种经历。就如同一些人选择了军队的历练，都是一种人生的选择。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他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忘却之后剩下的东西。斯言不谬，毕业二十多年，我平时的勤勉和向上的心态，以及身为人师所取得的成绩，都要归功于生命中那段美好读书岁月的积淀。

作者简介：吉茂飞，商丘师范学院政教系1997届毕业生，现任职于柘城县教师进修学校。商丘市骨干教师，注册心理咨询师。喜欢读书，发表随笔杂文一百余篇。

## ※ 往日鳞爪

□ 李路晨



立夏已过，又是一年毕业季，转眼毕业离开师院已是十载，时隔多年，依然记得多年前杨博士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史课的场景。那时，时间也如今天

这般不急不缓。

那时杨博士四十出头，如今算来杨博士五十有余了，十余年悄无声息地流逝了，好像并没有多久，时间就这样在漫不经心中只剩下蓦然回首，终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去的时光里和往事不期而遇，怀念着从前。时隔多年再提笔写点关于杨博士其人其事，所有的当年读书时的日子带着泛黄的记忆从遥远的烟尘中走来。

杨博士上课必是西装着身，领带皮鞋是他日常着装标配，正如古代读书人穿长衫一般，很是正式，发型是他们那代人年轻时非常流行的中分头，清瘦的面庞，印象中脸型略长，总会让人联想到俞敏洪那张脸，老俞曾戏称自己的脸为“驴脸”，作为杨博士的学生，出于对师长的尊重，不敢称之为“驴脸”，一时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可描述的词语，后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地道又通俗的河南方言：一蹦子跑不到头。这样的形容是否贴切、生动、形象，各位需自己前去找杨博士确认。

杨博士是一个不泥于常规之人，我们读书那时候学校还有期中考试，杨博士“自恃”声誉才华极高，对于期中考试这么严肃的事情，他总善于创新，书面考试这种形式，显然他是不愿采取的，于是想出让大家背诵古文这个自以为很有创新、很高明又不流俗的主意，要求背诵古文名篇，谁背的文章越长，给的分数越高，有实在不会背又怕分数不达标的，急中生智把启蒙诗歌《静夜思》脱口而出，诧异继而又哭笑不得的痛苦在杨博士的脸上蔓延开来，摇着头引用鲁迅《风波》中九斤老太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至于这位同学的分数不得而知，亦不曾有人去询问个究竟。这种别具一格的考试形式至今仍思之念之。

杨博士不修边幅的外形，落拓不羁的个性，在我们学校几乎尽人皆知，很少有人直接提起他的名字，一说“杨博士”三个字，大家都会想到他（虽然学校教师中不乏其他杨姓博士）。“博士”这个

称谓不仅可以显示一个人头脑之聪明，还可以显示学历之高和知识之渊博。他乐得大家称他杨博士，也很是关注自己的知名度。每当有人喊他杨博士，他总表现出来平静的寻常，却又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记得开学前几天上课前总要问一个与课堂无关却事关他名气的问题：认不认识杨博士？当他听到肯定回答之后，哈哈大笑而后你会听到带着浓重福建口音的话语：孺子可教也。当看到有人茫然状或默然不作声，他好像受了很大耻辱似的：杨博士都不认识还来上什么课？“人不知而不愠”孔老夫子的谆谆教导，教授古代文学的杨博士早已抛诸脑外了。这种真性情颇有魏晋名士风度，如果在魏晋名士中再添加一个成员，想来杨博士是当之无愧的，或许受到专业素养的熏陶，尤其钟爱魏晋文学的影响，魏晋风度早已是植根于其生命中，融入到他的血液里。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杨博士的真性情与洒脱。多年不见不知杨博士是不是还一如当年那般洒脱，有真性情，这也是最让人念念不忘的。

杨博士推崇魏晋名士，有时也颇以魏晋风度自许。他之所以崇尚晋人，或者晋人之所以受他的赏识，很大程度源自于那一时期的名士风流，率性洒脱，在《任诞》章节中体现最为明显。喝酒吃药是魏晋风度核心内容的一部分，关于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精彩的论述。“人无癖，不可交”，魏晋士人之嗜酒与药，正如杨博士之嗜书，杨博士嗜书成癖，深以为颇得名士风度。

阮籍和陶渊明或许是常被后人追忆的魏晋文人，但并非一味饮酒吃药养生，也并不是只有采菊东篱下，他们于洒脱中有所执着，阮籍算不上真正的隐士，读他的《咏怀》“壮士何慷慨”以及“少年学击刺”等诸诗文，就会理解《晋书阮籍传》所言诚不欺我等：“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心怀“本有济世志”。哪怕是有“隐逸诗人之宗”之称、历来以淡泊超然率真著称的陶渊明又何尝不怀

有大济苍生之志，其二十九岁步入官场开始时宦时隐，似有不甘，正如后人评价他“实有志天下者”。杨博士也时常成为大家的热点话题。毕业多年之后仍有不少学生追忆杨博士的往事日常，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轶事多，最让大家折服的是在他洒脱的外表下别有追求：工作之勤恳，治学之严谨，对学生不遗余力的帮助，鼓励后进，实为文学事业延揽人才。我却荒废光阴，终一事无成，内心满是愧疚。杨博士著作颇丰，竟也不曾拜读一二，愧疚之感又增加几分。

蓦地想起一件趣事，把这轶事讲出来，聊以减少我的愧疚之感。当年校园里有一道风景不可不提：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男孩”带领十多个“男生”在校园的路上穿梭。在文学院有个光荣的传统：女生人数向来占据绝对优势。犹记得当年汉语言文学三班六十一名学生，男生仅十四人，更有趣的是隔壁对外汉语班四十一人，只有班长是男生，毫无意外的成了团宠。每每文学史课结束后，总会看到组团楼通往宿舍的林荫道上一队排成一字形的纯爷们儿，必是稳居C位的杨博士带领着，在“鲜花丛中”丝毫不顾忌别人眼光“指点江山”。彼时自媒体尚不盛行，昨日如果在今天重现，必将火爆全网。可惜当时不以为意又不曾留得照片，真是莫大憾事。

时常想象这样的场景：平平常常的每一天，听风吹，看云起，等雨落，踏夕阳，在每一个晨晨昏昏，杨博士以及致力于文学的学人依旧从容地在山河岁月中走过，在山重水复的流年里钻研于钟爱的文学事业；也能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坚守严谨的治学态度，一路走下去，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作者简介：李路晨，河南项城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届毕业生，现于项城市正泰博文高中任教，曾多次被评为县市级优秀班主任。喜欢买书、藏书、看书，热爱运动。

## ● 文学沙龙 ●

# 水城威尼斯的魅力

□ 孙君恒



意大利水城、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威尼斯，万众青睐，我也未能脱俗，为之倾倒。2017年和2019年两次来到了闻名遐迩的威尼斯，感受深刻，特记之与看官们分享。



威尼斯一瞥（本文照片均为作者拍摄）

### 一、折磨人的地方

威尼斯水牢，在圣马可广场附近，是过去衙门的监狱。此监狱与众不同，建设在偏僻的水中，非常狭小，让犯人矗立水中（海水中），不要一般的蹲监狱，并且将毒打过的犯人伤口长时间在盐水中浸泡，受尽折磨，目不忍睹。西方人惩罚犯罪也是非常残忍，中国现在留存的青岛市的德国监狱、大连市日俄监狱（均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如磐石，机关算尽，刑具可怕，可以对比，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圣马可广场

贡多拉是小划船，是威尼斯老城的水上交通工具，是当地独到的风情。其速度慢，在水网交错的狭小街区穿梭，恍如隔世。你若办急事，赶飞机，

旅游跟团掉队，这里肯定不行；你若性急，保准不适应。因为这里是十分典型的慢生活。古城内有很多小广场，广场上常常设有古井、纪念碑、塑像，人们坐在长椅上阅读、休息，澄净的日光伴随着，仿佛时空凝固在一片宁静之中。偶尔有老人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散步，孩子们围绕着母亲和推车嬉戏，不紧不慢，悠哉游哉，充满爱意。



贡多拉船

在老城旅游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步行，在弯弯曲曲的、类似迷宫的地方寻觅，我两次寻访都迷路了，百度地图、谷歌地图似乎无效。跟导游，不迷路，多快好省，才是上策；时间特别充裕，随心所欲，优哉游哉，则是最佳。这里磨炼人的耐心，远离高速节奏，是另类的生活状态和情调。



威尼斯一角

“威尼斯商人”的精明，在莎士比亚笔下一针见血，栩栩如生，我也有所体会。2017年我单枪匹马到达这里，没有提前预订宾馆，找了很长时间才

在圣马可广场附近找到了一个家庭旅馆，记得单人房间 70 欧元，我与经理磋商半天，希望他能够给予优厚，他答应了优惠 10 欧元，但是顺便取消了我的免费早餐，并且把我安排到距离 300 米远的地方——旅馆的另一单元房内，这样下来，我的优惠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我也由此体验到了商人的斤斤计较、层层盘剥。我在罗马火车站附近一家宾馆寄存两天行李（因为要去希腊雅典参加国际会议），想不到宾馆收了我 16 美元寄存费，真后悔为了省事而遭遇无端的浪费（行李箱也没有什么东西），到威尼斯更是领教了商人的精明。



老城狭窄的水道

## 二、浪漫之都

水，意味着阴柔、月亮、灵动飘逸气质。威尼斯这个水城，被水层层环绕，有河流的淡水，也有安德瑞安提科海水，混合流动包围。威尼斯的电影节红毯，引无数英雄而折腰；威尼斯的浪漫情调、声色犬马，溢于言表。蜿蜒曲折的水巷小径，幽静浪漫，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小桥栏杆边，水巷阶梯上，伴着波光粼粼的水色，古建转角，半遮半掩，是男女抒发情怀、诉说衷肠、互表恋情的绝佳地。几百年来，这里隐藏了多少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浪漫时光，不胜枚举。

这里，最光明、公众化的地方是圣马可广场，乃威尼斯第一名胜、第一地标。此地，多个西洋乐队终日演奏，歌手云集，音乐发烧友、世界各地游客可以大饱眼福（耳福），国际上各种各样的肤色人种在此流连忘返，吃喝玩乐，乐不思蜀。1797 年

拿破仑进占威尼斯后，赞叹圣马可广场是“欧洲最美的客厅”和“世界上最美的广场”，并下令把广场边的行政官邸大楼改成了他自己的行宫，还建造了连接两栋大楼的翼楼作为他的舞厅，命名为“拿破仑翼大楼”，足见威尼斯似美人，叱咤风云的英雄为之着迷，英雄和美人在此高度融合，相得益彰。



威尼斯小巷

曲径通幽的酒吧、咖啡厅，光线暧昧，纸醉金迷，漂亮妩媚的酒吧女郎穿梭其间，光怪陆离，一阵阵香水味扑鼻而来。咖啡馆、餐厅、酒吧、画廊、小作坊，比比皆是。女人迷恋于首饰、服装、绚丽的面罩、小摆饰，男人留步于各种手工作坊、艺术文具、皮革制品、旅游纪念品，各得其所，乐此不疲……路经那造型精致、香味扑鼻的巧克力店，难以抗拒它的诱惑，随手购上一包过过瘾，边尝边游，逍遥自在，乐在其中。路边的古老建筑窗台上，有佳丽探头观看你（你也琢磨她），互为风景。这里与别具一格的美女偶遇概率很大，可以大饱眼（艳）福。



海边码头

历史街区、广场和码头周边有不少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沿街是陈列艺术品的画廊（我2019年看到中国台湾的画家在此展出作品），后面是艺术家的工作室，有铜版画、木版画、石版画、油画、雕塑等，形式多样，顾客可以与店主尽情讨价还价，了解其创作过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文化国际化在此妙不可言。



街头卖画

导游说，一个美国男游客在威尼斯的小小酒吧，也许喝高了，也许被美女吸引，旅游团队找不到他，等此游客醒来，旅行团已经到巴黎了。他是否在酒吧昏迷不醒，他是否自愿作乐，其具体情况，至今神秘秘，没有外泄。他的机票因为旅行掉队而作废，导游也爱莫能助，不过他还是挺满意在威尼斯期间难得一见的浪漫故事，说不定有一次红颜知己。



房顶上看威尼斯

“浪一浪”看来是古今中外不少人们都为之青睐的事情或者幻想，威尼斯的小街小巷，灯红酒绿，曲径通幽，令人感到有无限遐思……不过，我奉劝各位看官，来威尼斯旅游时不能被此地美女、美景、



美酒等所迷惑、中毒，不然掉队甚至人财两空，后悔晚矣。



游人如织

### 三、百年小店

威尼斯的小店特别多，家庭作坊遍及小巷，数不胜数。100多座岛屿上，都能见到皮具(皮包、皮鞋、皮带)、头饰、礼服、手包、胸花、精致手套乃至香水，商品琳琅满目，表达出设计者的独特创意。威尼斯市场，极为繁荣，购销两旺，让人感受到魅力无穷。小作坊的产品，极具个性，精工细作，家族传承，为世人称道。我在此买了地地道道的西服、皮鞋，体验到了质量堪称一流，信誉可以信赖，名不虚传。



旅游纪念品小摊

小店创新、越来越大，是赢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威尼斯安东尼娅女士是威尼斯面具与服饰资深设计师，我们参观了她30多年前白手起家的公司，看到设计、制作、营销团队已超过300名，有八个

国家的设计师加盟她的团队。尽管产业壮大了，但她在创作上依然亲力亲为，力图站在行业前沿，与团队的设计师们不停地改进方案，精益求精，让产品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件配饰都不断地“推陈出新”，的确是别具一格，独具匠心。她特别强调设计时不仅考虑市场需求，更要融入新的艺术灵感，让自己的艺术追求变成有创意的产品，很是独到。以威尼斯城市为代表的手工业，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萌芽、文艺复兴时期，异军突起，来到威尼斯体验小作坊、小店铺，当年的情况可见一斑。



和外国游客

威尼斯的传统风格极为突出，并且拥有新内涵、新形式，简直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与时俱进。在安东尼娅等从业者看来，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应看重国际化、时代化元素。设计中融入的国际化元素越多，产品在市场上的吸引力就越大，国际市场份额将迎来全球顾客。安东尼娅的设计，赫赫有名，是各种庆典活动上的“常客”，尤其是面向国际游客的特色婚庆，成为一道具有世界时尚“范儿”的名牌产品。恪守诚信，传统技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融合，滋养了威尼斯的城市气质、百年老店（甚至千年老店）、手工雕刻打磨，应运而生，经久不衰，成为响当当的名牌。

当今的威尼斯商人个体户（家庭作坊）、联合群体中，很多人把艺术创新作为优于商业目的的首选动力，世世代代，孜孜以求，打造出了自己特色和品牌，宛若“农家特色菜”，有自己的独特配方

和口碑优势。他们努力让自己的每一件作品具备鲜明个性，在材质、色彩、图案、工序等方面精益求精。秉承“宏观坚持、微观更新”理念、坚持“单件加工、不可复制”做法，以及不急功近利等，让他们的产品名扬天下。我看到各地游客（尤其是中国大陆游客），在此疯狂购物，选择世界名牌包包尤多，以至于归国在机场上向中国海关缴纳不菲的关税。



威尼斯名胜荟萃于明信片

威尼斯一直保持着千年水城风貌，在追求现代化的今天，与众不同（慢生活、浪漫情怀、精工小打小闹、享誉天下等），仍彰显出传统经典的独特魅力。每天几百万纷至沓来的国际游客，就是威尼斯城市魅力的鲜活注脚。快来看看威尼斯吧，绝对会不虚此行。

作者简介：孙君恒，河南邓州人，北大博士、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兼国学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伦理与文化，喜欢脚步丈量城乡名胜古迹，游走了30个国家。在《光明日报》、《文汇报》、韩国和中国港台等发表百篇论文。2020年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伦理学），被授予“最美墨子文化传承守望者”称号，被聘为中国名村尧治河村“荣誉村长”。

※

## 世界杯圆心与审美社会学半径（二）

□ 宋立民

37、2022年12月15日黎明，法国2比0击败摩洛哥，进入世界杯决赛，观战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盛赞球队“让我无比自豪”。他表示，法国人们需要简单而纯粹的快乐，而足球可以提供这种



快乐。他还说，德尚带法国队三次进决赛已经赢了两次，若这次赢得世界杯他当然会继续留任。

12月4日，3:1战胜波兰后，他已经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法国队成功挺进八强。

所以，加缪这样的“全才”出现在法国绝不奇怪。

38、法国击败摩洛哥，利物浦后卫科纳特首发出战并发挥稳健——90分钟平均抢断+拦截的数据

为6.9次，在本届赛事所有至少3场首发的球员中是最多的。孤注一掷的摩洛哥人顽强地在法国的禁区制造了多次麻烦，法国后卫线也多次化险为夷，其中就有科纳特的功劳。

球迷评论：“看了几次利物浦的球，心说这后卫太强了，不比范戴克差啊，怎么不显山不漏水的。这届世界杯把实力展现出来了。”

是的，利物浦的风格就攻守平衡。而他们对于足球的理解也非同一般地“哲学”。曾经的主帅香克利的伟大名言：“足球不是一个生死问题，足球高于生死。”

所以，禁区不仅是守门员的“领地”与“命门”，也是整个球队的生命。

39、法国著名体育历史学家热拉尔·埃内评论足球说：“自从被创造之日起，它就成为地球上最重要的节日。这项创造让时间凝固，将五大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无论白昼还是黑夜，让他们在同一时刻做着同一件事。出于对这只永不停歇的滚动着的皮球的激情，人们共同刻画着未来，不论是奇迹之日，还是悲剧般的明天。”

所以，如果把世界杯简单地总结为“球迷熬夜”或者“彩民买码”，那就过于单纯了。

40、“到岸请君回头望，蓬莱宫在水中央。”

当我们慨叹梅西封王、终成正果之际，可曾想到过梅西曾经有过“挥手从兹去”的当初？

大家说：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艰辛，好在有“定海神针”梅西在场。

的确，梅西机敏无比的过人、手术刀般的传球与子弹般呼啸的射门，永远闪耀全场，完全可以担得起“球王”之称号。

窃以为，更可贵的是：年轻的潘帕斯雄鹰们已

经可以“辅佐”梅西乃至可以“单飞”，摆脱持续多年的“梅西依赖症”。

忆往昔，阿根廷始终受困于“梅西依赖症”，弄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16年6月27日——庆祝美洲杯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美洲杯决赛拉开战幕。阿根廷和智利120分钟战成了0:0，最终智利4:2点杀阿根廷获得冠军。

阿根廷国内舆论纷纷将矛头对阵梅西。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梅西决定退出国家队，阿根廷球迷愈发火上浇油，攻击梅西是“懦夫”。真叫左也不行右也不行。

既然已经是“懦夫”，那就彻底撂挑子——“索性让给丑恶去开垦”。梅西去意已决，说什么有用吗？

然而，几经周折，梅西还是留了下来。

为什么？据说与一位15岁的少年“迷弟”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封信有关。

这封信的标题是《我们要如何说服你》。尽管此桥断真实性有待考查，但是，至今，五洲四海的媒体异口同声地认为有直接关系。且看这封散文诗一般的“挽留函”——

我们要如何说服你

如果你的离开对我们是灾难性的，我们怎么能说服你呢？

我们要怎么说服你呢？

我们从来没有你肩上的1%的压力——你早上醒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你知道有4000多万人希望你做完美的事情，而且这已经被可笑地强加给你，他们可以要求你怎样做。

我们要如何说服你呢？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你是一个人，一个拥有无可比拟的天赋的人，地球上最好的球员，但毕竟你只

是一个人。

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你并不应该对输球给我们带来的愤怒负责，这往往与我们自己的沮丧有关，与我们自身的挫折感有关。

让我们照照镜子，问问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否只有对这个不认识的人的要求的1%？

我们要如何说服你呢？

在你的假期，你本可以躺在沙滩上，但你在哪里跑步，试图代表我们的颜色，而有些人只是看着你是否跑步或唱国歌。

做你想做的事吧，莱昂内尔，但请你考虑一下留下来，留下是为了获得踢球的乐趣，这正是这些人从你身上夺走的东西。在一个充满荒谬压力的世界里，他们夺走了一个球员最崇高的东西，那就是踢球的乐趣。

小时候你肯定梦想着代表你的国家踢球并获得乐趣。看到你身穿蓝白球衣踢球是世界上最大的骄傲。你要踢得开心，因为当你踢得开心时，你不知道你让我们有多开心。

谢谢你，原谅我们。

——恩佐·费尔南德斯

不错，是恩佐·费尔南德斯！就是身披24号球衣，于2022年11月27日凌晨3点与梅西一起出现在卡塔尔鲁塞尔体育场的帅哥。

就是12月19日凌晨2时许，与梅西一起夺得金杯并第一个走上领奖台，接过“FIFA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奖”的21岁的帅哥。

写这封信六年之后，这位文采斐然的迷弟小诗人，成为了梅西的队友。

11月27日打墨西哥队，梅西“贴地斩”破局，费尔南德斯进球锁定——2比0。对，就是写信的与收信的二位。

12月14日凌晨3点，几乎窒息的半决赛——

阿根廷遭遇前世界亚军“魔笛”克罗地亚。又是费尔南德斯传出过顶球，队友阿尔瓦雷斯急速突入禁区造点，梅西射门命中，1:0！（西班牙《阿斯报》表示，这是一个奇怪的点球，原本可以避免。阿根廷人认为这是一个点球，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认为可判可不判，克罗地亚人当然认为不是点球——这是另一种“接受/不接受”美学。）

3比0获胜两小时之后，小诗人更新个人社媒：

“挺进决赛，这是多么美好的梦想，成为这支阿根廷团队的一员是感到无比骄傲和幸福，阿根廷加油！”

紧接着，梅西在网上晒出了全家福，唱出了道别的骊歌：“我很自豪能够在决赛中完成我的世界杯之旅。我正在经历的一切是令人兴奋的。当然，周日将是我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距离下一次世界杯还有很多年，我认为我无法继续参加。所以我希望能以最好的方式结束比赛。”

是的，梅西可以放心地离开绿茵场。

小迷弟，已经证明自己有可能就是下一个梅西。

41、赢了克罗地亚，总统马克龙兴高采烈进了球员更衣室。遗憾与伟大齐飞的一幕是：队员们跳上桌子，载歌载舞。是的，他们似乎忘记马克龙先生是自己的总统，或者说，此刻，总统先生也就是一位可以一起唱歌跳舞的“发烧友”。所以也没有谁人喊一声：“总统来了！请肃静！”。

无独有偶，阿根廷总统同样“遭遇拒绝”。

当地时间12月20日2时许，阿根廷航空公司AR1915航班平稳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

消防车从飞机的两侧喷出水柱，这是“水门”——民航业的最高礼仪。

舱门打开，梅西手捧大力神杯率先出舱，主教练斯卡洛尼和其他队员紧随其后走下舷梯。

此前，阿根廷政府已经宣布，为庆祝球队夺冠，20日全国放假一天。

上午，百万球迷参与了持续了约5个小时巡游活动。

由于车队行进缓慢，难以按计划抵达市中心。为安全考虑，阿根廷足协决定球队改乘直升机继续巡游——足协主席塔皮亚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这一决定之际，还代表球队向球迷们表示歉意。毕竟，诸多球迷失去了近距离接触他们的英雄的机会。

阿根廷总统申请会见国足。

不过，足球队慎重地拒绝与总统会面，理由是希望阿根廷的足球更加纯粹一些。

呜呼！既然足球已经成为“宗教”——则“球王”梅西就可以说是阿根廷的“足球教皇”。从“足球王国”的角度思考，总统的确是要“屈尊”的。

足球的圆周不长于70厘米、不短于68厘米，由此估计其直径不过在21.96-22.04厘米之间。但是，在虔诚地信仰它的时间与地点，其地位是胜过联合国秘书长的。

42、半决赛，阿根廷打克罗地亚，从备战，到赛场看台，到球员更衣室，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小巷，凡是有阿根廷人的地方，就有《兄弟们，我们激情重燃》的歌声，歌词大意是——

我出生在阿根廷，迭戈和莱昂内尔的土地  
来自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无法向你解释  
因为你不会明白  
决赛输了，我为他们哭了多少年  
但一切都结束了，为什么在马拉卡纳  
再次赢得与巴西队的决赛  
兄弟们，我们激情重燃  
成为世界冠军，夺下第三座世界杯

迭戈，会从天堂看到我们

他们会为为莱昂内尔加油

此前梅西接受《奥莱报》采访时表示，他最喜欢的一首阿根廷队歌就是这首。

笔者在视频上听了这首歌，没有一个字听懂，却照样泪流满面。

43、12月10日夜11日晨，摩洛哥击败强大的葡萄牙，成世界杯首次进入四强的非洲球队，赛后全队场边跪谢球迷！17号球员布法尔拉着母亲载歌载舞——火线接手球队的教练雷格拉吉专程把球员的父母们接来了卡塔尔，他说：“没有父母们的祝福，我们不可能成功。”回到更衣室，球员仍然在高声歌唱——尽管我们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歌。紧接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开始了游行与歌唱，整个非洲充满了欢呼。

是的，随着阿根廷与，摩洛哥的崛起，世界杯前四名变成欧洲杯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请看笔者6年前的球评——

又是四载歌声起，完败球迷不离席。此去蓬山无乡音，几多眼泪洗绿衣。

2016年6月18日，欧洲杯，爱尔兰0比3负于强队比利时。爱尔兰球迷像四年前负于西班牙之际一样，流着热泪，唱起了悲伤而悲壮的民歌《阿森莱原野》：“这里我们曾见小鸟自由飞驰/我们的爱也迎风展翅/我们曾怀抱梦想纵情歌唱/如今孤独弥漫我的阿森莱田野……”波尔多球场只有这歌声，全世界荧屏前只有这歌声，四年前，在大雨中，众多球迷听到过这歌声。

整个欧洲都知道这首歌记载的故事：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一名来自高威郡Athenry镇名叫Michael的男子，为饥饿的家人偷了几只玉米，被抓获后即将发配到地球另一端的澳大利亚。Michael的妻子Mary，在港口目送押解丈夫的船远

去，从此天各一方，再不能见面。

声无哀乐。这支歌是爱尔兰足球队助威歌曲，也是苏超球队凯尔特人队的队歌。像善良的妻子Mary一样，球迷没有责怪本不该责怪的球队，而是用歌声演绎悲怆里的热爱。爱球队，爱祖国，爱足球。球迷知道：因为失败更需要理解。

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出线之际，《歌唱祖国》的旋律振奋着大江南北：“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那时候，在球场上起身歌唱的球迷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与祖国的命运与责任出奇地一致。

呜呼！“世界杯的律吕与音乐元素构成”！——这是跨文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44、2022年11月22日凌晨4时42分，“每逢大赛总有扭转局势的能力”的威尔士超级球星贝尔，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造点，并亲自主罚命中！把比分扳成1:1平。看台上响起威尔士语歌曲《我们仍在坚守》——威尔士队上一次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还是久远的1958年，“圈内”唱一次这样的歌，居然等待了64年。

笔者突然感觉到：东西南北种种球场的看台上都是合唱团——五湖四海荧屏前的人群都是合唱团，而且无需配器、无需指挥，全是天籁，全是和声。

足球可以是地理老师、自然老师、“博物”老师，但它首先是音乐老师。

45、谁也想不到，此番世界杯第一个进球是越位球——肉眼难以分辨的越位球。

揭幕战第2分39秒，利用定位球机会，厄瓜多尔队在禁区内的乱战中，由瓦伦西亚率先破门。不过，经VAR（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埃斯特拉达在接球时处在越位位置，主裁判最终取消了这粒进球。

看了视频才明白，埃斯特拉达的越位仅仅就是一个膝盖——裁判即便与球员在一条直线上也很难看得到。

很多球迷在网络上开始吐槽，甚至质疑是不是东道主这边收卖了裁判。

无奈科学就是科学——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由特制摄像机、球内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系统三部分组成。每座球场顶部都会设置12台特制摄像机，追踪场上的足球和每名球员，以每秒50次的频率发送数据，精确定位球员位置——厄瓜多尔就是越位在先。判罚一点毛病都没有。

还有更科学的：本届世界杯指定用球内置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发送数据，用于更准确地判断传球点。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由人工智能系统分析，只需几秒钟就能对越位情况作出判断，并自动向视频助理裁判发出警报。

这种高科技当然完全必要，进球与否的误判将会大大减少，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将不复重演，裁判的公正性更有权威。

但是，“科盲”的笔者开始有了似乎多余的担心：时时刻刻都在等待机器发送数据，比赛岂不成了一节一节的“炸带鱼”？以往行云流水、水银泻地、三角短传、撞墙式二过一……会不会因为等待那个“每秒500次”而变得磕磕绊绊类似哮喘？记得NBA球员多次抱怨裁判的罚球判罚，认为消解了比赛的完整性，“成了裁判的个人表演！”

如何把“高科技”与“手工制作”的“足球人文传统”统一起来？应该是一个新的课题。

46、然而，必须承认，高科技距离公正裁判更近，也更科学。

2002年韩日世界杯，16进8淘汰赛，韩国队遇到群星璀璨的意大利队，后者球星云集，主力中锋维耶里等正值巅峰期，两队差距甚大。韩国安贞

焕恶意肘击，李天秀恶意踩踏，而主裁判莫雷诺均视而不见，且在多年后承认当时存在这些行为。更无语的是，意大利托马西和维耶里进球被吹无效，甚至还判定托蒂假摔直接红牌，最后韩国凭借安贞焕的头球2比1把意大利“绝杀”淘汰。比赛后莫雷诺被国际足联告知不能继续参加本届世界杯执法工作，多年后甚至因藏毒被抓坐牢时，意大利全国一起点赞，这次世界杯后意甲各球队甚至把韩国队员拉黑。

至今仍然可以搜到：世界杯历史上六个严重的黑哨，韩国独占三个。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日本2比3惜败比利时，在14秒内被逆转绝杀。而这14秒的惨痛回忆引发了日本足坛一年的反思和研究——他们是一秒一秒地回放，分析，这也是高科技的贡献。

47、“倚杖独看飞鸟去，开窗忽拥大江来”。

在纯粹的“力与美”的撞击下，我们只剩下惊叹、欢呼、流泪和遗憾，我们会完全忘记性别与年龄。

在胜利或者失败之后，领队、教练与队员泣不成声——音乐、舞蹈与泪水一起交织成一幕幕无法重拍一个镜头的立体电影。那时候你感到整个的世界和每一个孩子无不与你有关，你清醒地体会到人类的生命活力。只有决战氛围凝成的心理背景，能够让你的灵魂在一瞬间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当足球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出现的时候，当上帝选中了足球作为“第一运动”、以最自然最坦诚最潇洒的艺术露面的时候，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门类只有退避三舍了。

只有在彼时彼刻，我们发现：体育真的不该与别的任何因素有关，那是纯粹的生命宣泄、自由挥洒，连胜负都可以忽略不计。

48、某散文家脱口而出：

“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如同集合了精彩片段的人生，勇敢、怯懦、挫折、得意等等情感都被发挥到了极致。射门时如入无人之境的勇猛，盘球时立刻群雄却又功亏一篑的沮丧，裁判不公产生的微微屈满身，记忆却时运不佳的英雄，迟暮的感慨无处不似人生，短短90分钟变成人生活剧，难怪看台上的人们忘情喧闹。”（原野《脱口而出》）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荣誉感心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中老年心理，输了想“报仇雪耻”、赢了想“江山永保”的行为主义心理与潜意识；“一不留神”夺得了冠军、成为百万富翁的“事后侥幸”，无不在足球赛场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活灵活现。

49、“胜利属于你，失败属于你，忘却胜利失败生命属于你。”

人的魅力，大半在于充满智慧、充满狂热的生命活力。因此，足球作为流动的雕塑，无声的音乐，闪烁着光影的心理画面，无疑是最具文化意味的表演。足球文化或许可以作为人类对于历史和未来的重要贡献。

C罗哭着走进更衣室的同时，得胜的摩洛哥球员把教练抛向空中。

所有不完满的泪水，养育着那条叫做“完满”的锦鲤。

真正能超越时间、空间、民族和肤色的，恐怕还是热气逼人的生命意识。似乎此番大赛身体接触愈厉害，而裁判的“放纵”与延长加时又有力地“助演”着所有“血拼”。

然而，倒下的都在悲歌中再度站起：内马尔流着眼泪下场，梅西坐在草坪上半分钟起不来，还有落寞的凯恩、范戴克……仅凭足球对于人自身的“反抗绝望”，也应该给这项运动发一枚“灵魂金牌”。

50、一位球迷老弟告诉我，他的成长就是杯

赛的历史：我幼小的足球记忆里，停留着一次次世界杯的经历，也沉淀了一次次情感的升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我还是一个纯粹黑白的世界。米拉大叔的世界杯，我已开始被老师追着骂不学好，说此生与名校无缘。罗马里奥的世界杯，我不小心弄坏了电教室的门锁，战战兢兢。齐达内的世界杯，大家谁都不说话，因为等待着高考后的分离。大小罗的世界杯，我热切等待着孩子的降生。万人迷的世界杯，我已可以品尝到德国原装的黑啤酒。还有一届世界杯，我们记住了一个名字叫做马特拉齐。小飞侠的世界杯，他的迷离眼神今天依旧还在迷离……

“情歌还是老的好”，酒也是，足球也是。越是“陈旧”的世界杯，那足球的文化其味道也是越醇厚。

51、在鸟鸣婉转、黎明又来的时候，在杯赛即将收场的时候，在豪门出局、球星告别的地方，我起身歌颂球迷。

球迷的职业有皇室、总理或内阁大臣，但更多的，是会计、教师、工匠、小职员、街边档主……

与球星相比，她们/他们的身价是掏钱买票的负数，无关美刀欧元英镑。

念兹在兹，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她们/他们用四进位的思维，拷贝着黄色、橙色、红色、白色、蓝色、绿色……的期望，享受着四肢伸展为旗帜的疯狂。

往往，火焰瞬间就是寒冰；绝望中，也突然会飘来希望。

往往，不同色素的泪水，伴着陶醉抑或委屈流淌。

草坪与圆形的黑白世界，从传说变为现实、从娱乐成长为嗜好，成长为依恋、习惯乃至与灵魂同步的时光。

生命总是这样的轮回：提前一个又一个四年，她们/他们积攒着歌声、泪水、情感、假期、川资与主队的戎装。

其实，她们/他们极有可能买不到一张昂贵的黄牛票而侧身热血沸腾的自带沙发的广场。

当然，这似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挥洒水银泻地的能量。

熬夜并非她们/他们的专利或基本功，因为在攻防的网织就的夜幕里，折叠着浸透肺腑的审美的饥渴；“背谱”不是她们/他们炫耀的资本，因为那些个姓名、岁月、国籍、画面、镜头……早已融进自己的脉管，向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可能遗忘。

历史将永远记得，多少权贵向看台上的平民致敬，多少巨星深深鞠躬或长跪不起，多少支国歌的旋律一次又一次溢满穹苍。

无论新朋还是旧雨，理智还是癫狂，无论因兴奋而彻夜不眠还是因初尝而倦如梦乡；球迷，何止是时尚的乐章，那是时代的乐章，世世代代的乐章。

在一群又一群落幕道别的沉重背影里，“生命”的巨树冉冉生长，一并枝繁叶茂的，还有一种伟大，叫做悲壮。

过滤着赌与输，咀嚼着力与美，裁判着阴谋与爱情、血性与善良；足球已然是一种活法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一种信仰；球迷给了自己纵情的理由、充电的学费、忏悔的教堂……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宋立民，湛江科技学院教授，原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 红 榔 子

□ 郭婉婷

秋颂儿手里常年拿着两个梆子，那梆子一看就有年头了，表面黑黢黢的，松木的颜色一点看不见，也没人刷洗刷洗，凑近了看，没准能见跳蚤在上面蹦来蹦去。唯一点吸睛的是，梆子头系着飘飘的红丝带，太阳热烈的时候，秋颂儿挥着黑梆子往上扬，头上穿孔的红丝带颜色艳艳的，在太阳前面晃晃的闪眼睛，过路的人都忍不住看了去，也不知是看傻子还是看丝带，反正没人看那旧梆子。但秋颂儿宝贵的很，他说，这梆子是祖宗传下来的，大家不稀罕那是不识货，他得找个识货的人。



但什么人才是识货的人，连秋颂儿都不咋明白，他就记着自己老母临死握住他的手，叫他好好守着梆子，没种了就给个识货的人，秋颂儿五十了，他找不到自己的种，就只能找着识货的人。他就是个响彻全村的傻子，腿脚又有点跛，一个人孤零零的，邻也居不咋搭理他，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上哪找个识货的？

过了几十个日子，有戏班子过来，那搭台子唱戏的穆桂英，戏腔浑厚酣畅，气势磅礴。秋颂儿蹭着村里人的光，蹲地上听着。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

那穆桂英行步披云肩压大褂，七星金冠背扎旗，眉目做派尽显英姿，秋颂儿在底下痴痴看。

秋颂儿想，自己可算是见着识货的了。他屁颠屁颠去戏班子，后台还没进去就被撵出来了。可不是，这一身脏兮兮的跛子，任谁也不能让见了角去。

秋颂儿最后没见着面，只能作罢，数了数自己余下日子，背包收拾干粮开始送梆子。他一路往南，听说南边的人水灵，南边的景好看。

他拿个碗，蹲在路边，他想着，谁第一个给他东西他就把梆子给谁，可是左等右等，太阳都沉下去了，也没人看他，更没人往碗里投个钢镚。他脚麻了，挪挪屁股的空，抬眼见一小女孩，头发乱蓬蓬的，手拿馍馍给他掰了一块。

咋是个女娃娃，秋颂儿想，他往怀里摸索着，把梆子上红丝带取下，给那小女孩乱糟糟头发绑上，边绑边念叨：“你要是男娃，我就把我传家宝给你，但你是女娃，以后也没个种，跟我差不多的货，我咋能让我传家宝不传家嗦！”

扎完头发，他拿馍馍开始吃，吃完就赶路。他还得往南边走。边跪边吃边讨饭，摸索了大半年梆子也没送出去。他不愁，自己还有活头。

那一天他看见烟雨蒙蒙的，拍了拍自己的跛脚，知道南边到了。

南边的景就跟个水墨画一样，浓墨的，留白的，清清爽朗，不给匀称，也化不开，人、山、水都在那一摊子的墨渍和到好处的留白里。遮遮掩掩不给

人看，但那蒙蒙的，步履匆匆的脚步和裙摆，又酿出一点子暖意来。

秋颂儿不赏景，但他觉得自己的宝贝梆子跟这南边衬得很，一样的漂亮不张扬。他卯足了劲头要找个识货的。这劲最先还是在要饭上。

他碗里有钢镚，但这次他眼光要高点，他要找个男娃，还得是水灵的女娃，不是随便给个钢镚那种。

秋颂儿地上盘腿坐着，怀里揣着梆子，他以为自己藏的很好，但路过的，只要稍稍一低头，就能看见那半截没埋到衣服的梆子，但人们寻思着，这估摸是老乞丐的打狗棍。

这可不是打狗棍，这是秋颂儿最金贵的东西，谁要说它一句不好，他就扬起梆子，跛脚一歪一歪地冲上去打人，但往往人没打到，自己先摔了一大跤。还得在被人取笑两句：“走都走不稳，拿个打狗棒吓唬谁呢？”

秋颂儿只当这人不识货。

他左等右等，天黑了，南边的灯火亮起来了。

先是湖边，再是街上，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的亮堂起来。湖边的盏灯心里一小团火焰，灯火载载悠悠驶到湖中央，打个圈跟莲花灯挨在一起。岸上人指着笑着，摆摊的也挂上了大灯笼。火柴擦出的小火苗在深夜燃烧，沾了花灯的光晃起来了。

秋颂儿也瞎凑热闹，他小心走到人群里，看看周围人嫌不嫌弃他，要是余光看见有人皱着眉头、嘴撇着看他，他就立马缩到一边去，不能招人嫌，这也是老母临终说的话。

然而就是一下的推搡，他塞衣服的宝贝梆子啵的一声掉了，他又老又聋没注意，一夜过去，摸着怀里空了，跟糟雷劈似的，他一下子坐起来了，那张枯槁的脸配上惊恐表情，跟丧尸似的。

他赶紧去大街找梆子，扫地的人忒勤快，昨晚那么多摊摊，卖臭豆腐、羊肉串的，地上竟一根梆子都没有了，包括那梆子。他就杵在湖边，怔怔的，丢了魂似的，想起昨晚的花灯，又气又痛，他想着，

再见了眼花缭乱的东子，一定要狠狠踩上一脚，免得误了事！

他眼睛无神，巴巴瞧着湖的远方，突然，隐约看到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漂着，于是眯着眼睛往前走了一走。

这，这，这是他的梆子？

秋颂儿顾不住了，一下子淌湖里面，他小时候掉过水，会点水性，临了抱着梆子在水里扑腾，一路人跳下去给他救了。

他抱着梆子吐水，跟小鱼咕噜咕噜吐泡泡似的，早晨湖水凉着咧，他闭眼睛打着颤也不忘宝贝梆子，救他的人有点疑惑，想着这老头抱着根打狗棒做啥？

不想了，梆子泡发了，表面的污垢被水冲干净，露出里面腐朽的松木，除了结实，没啥别的看头，秋颂儿心里苦，他想着自己是找不到那识货的人了！他伤心的成宿成宿睡不着，梆子还是那个梆子，秋颂儿不是那个秋颂儿了。苦啊，嘴里塞满了黄连似的，跟死了老母一样式，他漫无目的在南边的烟雨里出现、再消失。他是作画人溅出来的墨点，是夜市灯火里无人注意的臭豆腐签，这南边北边，有没有他都一样，有没有梆子也都一样。

秋颂儿颓了，直到有个闪着扑灵扑灵大眼睛的男娃出现，他一眼就相中这个漂亮的小家伙，跛脚一歪一歪追着人跑。

小家伙胆子还是大，他抬头看秋颂儿的梆子，撅起小嘴，说：“太脏了！”

秋颂儿赶忙用自己破衣服擦擦，献宝似的捧着梆子给小家伙：“擦擦不脏了就。”

小家伙不情不愿接过来，秋颂儿一颗心落了实地，他突然觉得一身轻松，忙活了这些日子，终于给送出去了。他跛脚往后走，走了一会路没忍住往后看，小家伙和梆子都不见了。

秋颂儿又有些空落落的，他摸着怀里，缺个梆子，以往他讨饭要拿怀里揣着，打狗手里拿着，睡觉前也要反复摸摸，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于是他往后赶，想着追上小家伙见椰子最后一面，他倒是见到椰子了，那一根松木制的棍子孤零零地在寒风里躺着，好像在等着有人捡它似的。

他好不容易护着藏着，就这么轻而易举被别人丢掉了，秋颂儿不慌也不沮丧，他倒是很高兴走到椰子面前，重新藏在怀里。显而易见，这世上没什么识货的人。

秋颂儿不送椰子了，椰子是他自己的，是老母留给他的，无论是南边北边，天上地下，没人比他有资格拥有这个椰子，也没人会比他更爱惜它了。

在南边最后一晚上，秋颂儿站湖边，啥都看，

啥都想，最后要找个地睡觉了，月亮还亮堂堂的。

他扭头的时候，有一阵小风吹了吹，湖心漾着瘦瘦的月牙儿。

秋颂儿消失了，他好像回了北边，又好像死在了南边，还有人说，他自己挖个坑把椰子和自己埋起来了。

不过这南边北边的奇闻异事多了去了，谁管呢？

作者简介：郭婉婷，商丘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2021级学生。

※

## 山鬼不识字

——以后，情书寄给山鬼，心事寄予西风。

□ 张隽琪



1. 传说，醉卧山有一鬼，名叫山鬼。有一风，名叫子西风。

子西风可读心，山鬼能识爱。

2. 醉卧山下有一对夫妻，他们相敬如宾、如胶似漆，很快生了一个男娃，名叫宋举觞。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人如其名。

他们终日以狩猎、砍柴为生，从未离开过醉卧山。

3. 转眼间，男娃已成少年，亦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可爱。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

没过多久，这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袭白衣胜似雪，双目流光若寒星。

这是一位不知姓名和来头的小少爷。

小少爷什么行囊也没有，只腰间别一把小刃和一支褪色的箫。

他喜欢在半夜时分坐在宋举觞屋顶上，有时仰天望月，有时垂眸吹箫，心事重重。

宋举觞以前从没听过箫，初听是在睡眼朦胧时分，那时他刚刚洗漱罢，褪衣灭烛欲就寝，便听到从房顶传来的箫声。

幽幽绵绵，轻柔，涓细，似香炉中飘来的袅袅婷婷的烟，仿佛一片风就能将它们剪断。再听，又好似倾国倾城的舞姬在身侧翩翩起舞，直勾少年魂魄。

4. 少年被这悠扬飘渺的箫声吸引，情不自禁的点灯穿衣下榻查看。

抬眼只见一位身形颀长的公子坐在他屋檐上，一手轻握箫尾，一手搭在膝边，一袭凉风，满头杏花。

“这位公子可有什么心事？”宋举觞在房前抬眼问道。

公子挑眉，食指悠悠一转，拇指轻轻一抵，短箫就不见了，不知又从哪里抽出折扇，在空中潇洒一甩，随着一阵轻风，背手站在了宋举觞的身前。

“少侠好身手。”宋举觞握拳佩服。

少侠没接话，白皙狭长的手指握着扇柄转了几转，人就不见了。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宋举觞床头，宋举觞翻了个身打算继续赖床，却被母亲喊醒了。

刚走到公厨，就看到了一袭熟悉的白衣。

是昨夜在自己屋顶吹箫的少侠。

6. “这位是？”宋举觞抬手打了个哈欠，又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道。

“这位是你义母的儿子。”

宋举觞：“义母？我哪来的义母？”

宋举觞长这么大从没未见过除父母以外的人，断然不知道自己还有个义母。

还生出来个这么芝兰玉树的少年！

“这……说来话长啊。”

7. “你叫什么啊？”宋举觞问少年。

“我游走于各山之间，神出鬼没，他们都叫我山鬼。”

宋举觞：“哦——”

“你呢？”山鬼问少年。

“我？我叫宋举觞，不过我不喜欢这名字，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子西风。”

“子西风？”

宋举觞：“嗯，我看你会跳房还会消失，怎么做到的？”

少年笑了笑，开口解释：“一点点小功夫罢了，我只是个撮合姻缘的小鬼而已。”

“撮合姻缘？”

听起来不错！

8. 宋举觞父母的婚事就是山鬼的母亲撮合而成的，因为小两口对对方都特别满意，很感激她，也就让宋举觞认了她当义母，只是前些日子她因为操劳过度去世了。

山鬼母亲是红娘，山鬼从母亲那里学来了很多知识，关于世人写给心悦者的情书，他能用另一种方式收到，只是他不知那是不是真心。

这些天山鬼很迷茫，因为他把一个坏男孩和一个好女孩撮合到了一起，写情书的是坏男孩，山鬼识不得人心，只知男孩给女生写了无数封情书，哪知两人在一起后，男生变心了，山鬼不知如何消愁，只能来这里吹箫。

早上遇到宋举觞父母，他们把他留下来，说以后让宋举觞陪着他去，两人年龄差不多，心有灵犀。

9. “我？我不行！”宋举觞连连摆手拒绝。

【什么都说不行，你干什么行。不行也得去。】

宋举觞在他心里听到一个女声，是他妈妈的声音。

【嘻，我的傻儿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不行，我得让他出去闯闯。】

宋举觞又在心里听到一个男声，是他爸爸的声音。

怎么回事？他会读心？

宋举觞：“你们是不是都想让我去？”

“对！”两位老人异口同声。

“你呢？”宋举觞问一旁的少年。

许久，只见少年点了点头，却没听到其他声音。

10. 宋举觞发现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能读人心，但必须有山鬼在他身旁，而且他读不出山鬼的心。

他怀疑鬼没心。

但山鬼只知道他会读心，不会读他的心，至于他在不在这个必要条件他不知道。

两人一起撮合了好几对鸳鸯、夫妇，有的七老八十，想找个陪自己结束下一小段路程的良人，有的三四十岁，因为作工没时间靠自己定终身，只能潦潦草草，有的二十多岁，想要在自己的私塾、大学中放肆的热烈爱一次。

两位少年大多游走在私塾和大学间，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年纪段的人心思细、杂念多。

11. 山鬼一直认为子西风读人心这件事很羞耻，但这件事不是子西风自己能控制的，所以非必要他不会让子西风在场。

除非少年死心塌地的要和某个人好，子西风才会去窥探心悦者的想法。

仅仅是一位少年对另一位少年的想法，绝不贪多。

两人靠这份工作养活了自己，京城里有心事、有念想的人都找他们。

事情大多都能办成。

12. 大约过了数百年，两人突然消失了。

大家都在京城中贴寻“风鬼”启事，说是找到他们的赏银百两，而对山鬼和子西风则，要多少都给。

说来也怪，以前都是两人敲着别人家的大门去请求给结姻缘，现在是别人拿着万贯去寻求他们。

但风和鬼怎得是几两或几千两银就能找来的，他们来无影去无踪，想做什么谁都阻挡不了。

13. 但其实他俩就呆在醉卧山，这会儿估计正在屋檐上喝酒畅谈呢。

他们卸任的原因倒不是因为赚够银两了，只是事事不顺心如意。

有些事情做了也只是大费周章、多此一举，得到的结果：

不如不干！

以两人真就没再干过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两句话不知是哪句话绊倒了他们，是这三百六十行不包括他们干的这一行，还是他们干的这一行真出不了状元呢。

14. 世间事事不如意，唯独情最令人头痛，世间事事不顺心，唯独爱最令人难琢磨。

两个人的事情，中间缠了谁都是错，月老和红娘只能牵线，但凡悄悄扯了谁的线、剪了谁的缘，风一吹，全散了。

情和爱不是一纸情书，一念之想就能决定的，有时人之所念大多是杂念，心之所想大多是空想。用一念之想去决定终身大事，不过荒唐。用一纸情事去安排两人相爱，真是乖谬。

山鬼只得到了母亲结婚缘时所说的一些技巧话，却没得到母亲那双看透万物的慧眼。

资历不高，干哪一行都不会成功。

只是世人不这么想，他们有钱有势，却得不到自己心悦的人，奇耻大辱！

于是他们想到了山鬼和子西风，强扭的瓜再不是甜也是瓜。

只是能做到强扭瓜的人已不在了。

15. 又过了数百年，整座京城便没有了他们的风声。

再说起两人也只是玩笑一场。

山鬼：醉卧山中一只不中用的野鬼。

子西风：醉卧山上一阵寒酸的西北风。

16. 再有消息时是一位书生提起的。

书生个子不高，满腹经纶。

他对两人的职业很是感兴趣，一位只听所言便知心之所想，一位只看情书便懂情为谁牵。

妙哉妙哉。

这种招人喜欢又赚钱快的活他甚是喜欢。

于是书生决定去醉卧山探寻答案。

待找到两人时，书生白皙的脸蛋累的噗红，他躲在大树后面，听着两人谈笑风生。

17. 醉卧山藏的很严实，一般人找寻不到，这也是为什么京城中求爱之人愿意花千两银子求人指点的原因。

但书生不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钱路皆在脑子里。

“子西啊，你说这世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山鬼还是老模样，一手持扇，一手搭膝，故作思考。

“你我是真，其他皆假。”

“哦，我觉得不对。”

“哦？那你说，何物为真？何物为假？”

“信则真，不信则假。”

子西风哈哈大笑，抢走了山鬼的折扇，悠悠然道，“那你信什么？又不信什么？”

“除了你我，谁都不信。”

“这不还是你我为真，其余皆假吗？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一阵阵清脆悦耳的笑声穿过树林传到书生的耳朵里，微风一阵，书生又听到两人说了些什么。

他听到子西风能读得人心，心头不禁一颤，能读人心，那也就知道这里有人在偷听，更知道他来这的目的。

他这是在给自己下逐客令呢！

书生擦了擦汗，拎着包狼狈的逃跑了。

18. 书生离开了京城。

自此大家对山鬼和子西风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是高尚的红娘和月老。

再提起他们时，也只是一句暗示的俗语了。

“以后，情书寄给山鬼，心事寄子西风。”

【可惜山鬼不识字，大西风不懂你，像极了我，根本不爱你。】

19. “传说，醉卧山有一鬼，名叫山鬼。有一风，名叫子西风。

子西风可读心，山鬼能识爱……”

小和尚牵着老和尚的手，歪着脑袋听他讲故事。

人生一世，草生一春。

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完！

作者有话：

这算是一篇古代神话故事吧，没什么真理、科学可言。

风呀、鬼呀想活多久都是可以的。

“山鬼”摘自屈原的《楚辞·九歌》里的《山鬼》。

“子西风”摘自马之纯的《披香殿》。

主题是烟雨和灯火。

我不喜欢平述直叙的通过描写山川水流来突出烟雨和灯火这个主体。

灯火人家、烟雨入江南，在我看来，烟雨和灯火似乎和江湖少侠紧密相连。

什么奇闻怪事啦，和烟雨人间灯火最贴近了。这篇奇闻我把两位少年放在了爱情的故事里。

对于爱情，我觉得它也符合烟雨和灯火，因为爱情可以似灯般明亮，如火般轰烈。亦可以像烟般朦胧，如雨般细腻绵密。

（对于江湖，我还想讲两句）在一个月黑风光的夜晚，若没有润如酥的小雨，那就躺在屋顶高谈阔论，若有雨水相伴，坐在院子里的凉亭下喝酒聊天也不失为一种趣事。

烟，是少侠对江湖中事剪不断的愁烟。

雨，是少年对人间事事念不完的细雨。

灯，是百姓对江湖勇士谢不完的明灯。

火，是天神对人间万物燃烧的仲夏夜之梦。

作者简介：张隽琪，商丘师范学院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22级学生。

# 忆江南

□ 张晨晨

真想再游一回江南。

我生长北方，骨子里流淌着北方人的豪情爽快。可是那年初次遇见江南的烟雨，丝丝细雨如麻，淋湿衣衫，淋入心中，是陌生的细腻柔情，是我所向往的宁静之地。



时光如白驹过隙。江南有雨，不及长安，长安有风，不达江南。每个地方都是有别样的景，不同的蕴意，你要发现它的美，是时光的沉淀。久晴不知夏已去，一雨方觉秋已深。感受自然，发现生活中的江南烟雨。浮生若梦，且行且珍惜，过客匆匆，人生天地间，见景抒情，好似“江南烟雨自多情，西风冷雨瘦相思。”

墨玉一般的江南，烟雨是白描似的点缀，若隐若现的小镇在烟雨中那么祥和。你会瞥见油纸伞的多愁善感，望见船桨荡漾着旧时的记忆，路过人来人往的人间城，烟雨让烟火气更加浓烈。在这江南的光景中，有人等烟雨，有人怪雨急，有人在等伞，有人等雨停。在烟雨中会邂逅，会错过，会驻足。

或许江南烟雨可以抚慰一下，让自己静下来，沏一壶茶，坐在窗那边，看烟雨中的景，再抵一口茶。是焚香的清幽，是墨水在白纸书写的惬意。

可怜我写不出天街小雨润如酥那般精美的诗句，只能感叹来淋一场江南的雨吧！一场烟雨，一次邂逅与心爱的人一起撑着油纸伞沿着石子路一步一步欣赏着水乡古镇独有的魅力，领悟一番文人雅士的浪漫，随处可闻的清香，抬头便见的壁瓦，听一听江南的风，品一品江南的绿茶，是那说不尽的滋味。行走湖边无需涉水而行，踏在溅起水花的青石板上自然能得到一份独属自己的美好。一处相逢，一念风月，将唯美留在心间。

江南也是红色的一江南的元宵，岁月清新淡雅。红色的灯笼，闪烁着欢乐的光景。人们用诗词描绘这景，用一幅画卷把这浪漫缓缓展现出来。把灯笼拴在岸边，烛光萦绕着湖面。游人纷纷，比火热的烛光更灿烂。锣鼓声声，如流淌千年的钱塘。河滨的村舍里，有流转的红烛火，自往来的江舟，绘着晚风的蓝色圆环。今夜，一片明亮的灯火，一曲欢快的歌声，传递着温暖情意。夜空泛起繁星，竹林和樱花陪伴着这使人欢乐的时刻。江南，那一片灿烂的元宵烟火。

盛野蔓延，我俯身穿过经幡，见山的纹路蓦然显露，远方那未消融的雪也已经揉进山衣的青绿色中。我私心想在此驻足，但风说山山相叠，这里不过也是沿途。

这时我转头看向远方，迷雾中无数错落交叠的身影无一驻足，无一在眼前风景与曲折路途中停下脚步。原来，旷野里的跋涉者，只要广阔，不要归途。可自由总杳无音信，四周的桎梏也试图将我困在荒途，我身无行装，那些名为远方的路，我只想再回到江南，那是我最陌生的故乡。

风忽停，雨既静，灯又灭，我和江南的故事还未终结。

作者简介：张晨晨，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英语专业21级学生。

# 一个少年的故事

□ 倪雪莹

烟雨如梦，几曾何时少年鲜衣怒马，凭着一腔的热血远离家乡一人去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是夜，取一壶清酒，那人坐在城墙上眺望着家乡的方向，眼下是灯火通明的商铺和每户因做饭而升起的袅袅炊烟，远处则是连天的战火，战火弥漫到野外的各处，那人却眼中毫无感情波动，下了城楼走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万家灯火通明，无尽的高楼，繁华的街道，喧闹的人声，无不诉说着城内的安宁祥和，抬头望，点点星光好似每个人的梦想，虽然渺小不起眼，但是汇聚在一起却好似有着无穷的力量，可以点亮每一个晚归的游子，男人的梦想虽简单却也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年少时的他不听家人的劝阻一心想要成为举世闻名的将军，他放弃了祖上留下的丰厚家产，背着家人偷偷的远离家乡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奔波努力，但是从小过着富足的日子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并不知道远离家乡对年少的他意味着是什么，当身上所剩无几的钱财时候他也曾悔过自己的坚持

是否是正确的，或许他真的应该听从家中的安排，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接收着家族留下的企业，过着平淡无波的生活，至于什么见鬼的梦想，就当是黄粱一梦，醒来继续进行着枯燥、无聊、重复且乏味的日子，但是就当这个少年的梦想即将要被现实磨灭的时候，转折出现了……

这个胡子拉碴的大叔可以说是延续了少年梦想的烛火，在他的帮助下，少年快速成长，学会了武术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但是因为之前在外漂泊无所定居的生活过于艰苦，这让少年有些心生畏惧，一日，他向大叔提起自己之前的身世与自己现在还没有实现的愿望，大叔苦笑一声，少年这才了解到，多年前的这里有着漫天的战争，大叔年幼的孩子死在了战火中，而年长的孩子却为了家乡的安宁披上铠甲为国而战，大叔看着眼前的少年，怀念与悲伤涌上心头，对着少年说“哪有永久的安稳日子，不过是有一群人默默的背负这一切罢了，他们有些人刚刚成年，有些人才组成了家庭，但是为了这个大家，他们愿意把自己化为利刃来守卫自己想要守护的一切”灯光下，大叔的表情严肃，似乎悲伤也有所淡化，坚定的看着少年，让他继续坚持着属于自己的梦想。

终于一天，少年成为了将军，大叔也因时光的流逝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爷爷，当一切都是这么顺利且平静的时候，战争措不及防的打响，因派兵的失误导致大敌攻进了城门，大叔就这么倒在少年的怀中，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奋战，城门守住了，经济逐渐的恢复了，百姓也开始了像以往一样的平静生活，但是少年失去了维护他梦想的大叔。

城中的夜晚下着微凉的细雨，城中的烟雨多么像当时在战场上的厮杀，城中的血雾就像如今的烟雨一般，将军手中提着仍未喝完的清酒，微举向天空，在万家灯火的照耀下，他抿了一口酒说：“不必担心，如今，有我。”

作者简介：倪雪莹，商丘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22级学生。



## 『 再 遇 石 头 』

□ 郭梦奇



有些事情不能想，不可说。挂念着的事物没了，那就是没了。可有重量的东西，但凡有些许事物掠过心头，就又沉甸甸压着你我。

老家的老房子的门口有个大石头。

它不过是谁家盖房多出来的水泥和鹅卵石搅和搅和凝固成的方方正正的大块头。不知何年何月谁将它放在村子的马路旁，它立在黄土之上，就这样过着年岁。时间一长，这样一块儿石头倒也成了一个标识。

村里的小孩、大人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都喜欢这石头。

小学时候，这石头在我们眼中就是“大宝贝”。那时的石头还跟我们一般高。

放学路上，三两成群，买了辣条。玩伴中没有人敢回家，我们就一起蹲在石头旁边吃买来的垃圾食品。有时候一起坐在石头上，有时候直接坐在土上靠着石头，石头给我们的安全感是其他事物无法相比的。

石头就是我们的花果山。

我们站在石头上称霸，说着要逆天改命的豪言

壮语。但是石头从未回应我们。它默默地，它总是默默地。

再大了些，围在石头旁偷偷吃垃圾食品的不再是我们，但还是幼时我们。

石头比我们矮了。双臂撑在石头上，略微使劲，轻松一跳就能稳稳坐到石头上。

双腿就在石头前晃啊晃，把时间晃走。

看见不远处的玩伴靠近或是望见父母下班回家，我们就绝情地离开石头，绝不多看一眼。石头在我们心中的威严已经大大减少，它再也不是我们称王的宝地，它不过是块石头罢了。

直到一场特大暴雨到来。狂风大作，雨水倾泻而下。这场暴雨使我家的一面墙倒塌，可石头却安然无恙，它只是在土地里镶嵌得更深了些。

那时年少，哪里知道人们多年来在石头上献出的情感的重量是无法估量的。只觉得石头强过一堵砖墙，是了不起的存在，是万家灯火的守护神，心中的崇拜不言而喻。

我们便从屋顶上拖下来一块不大不小的石棉瓦，把它盖在石头上，希望这片石棉瓦能守护石头让其平平安安。可没几天，石棉瓦就没了踪影，我们扭头也就忘了这件事情。但好在石头平安无事地长大着。

后来我们又长大，石头长得缓慢，它只长到跟我们大腿一般高。

我们终于像以前向往的那样，可以轻松靠着石头，但失望地发现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一样。

石头毫无预兆地消失。没人知道它去了那里，也没人关心它的将来。

村子里搞建设，让我们这个城中村能够融入城市街道。路边不再是裸露的土地，铺上了彩色水泥地砖。家家户户都建起了如小别墅一般的自建房，村民们大多也跑出去务工。

石头在泥土地上的痕迹彻底消失，它在人们心中也彻底消失了，大概无人记得。

可我们当真能忘吗？

石头它早就不仅仅是石头了。它是朋友，是亲人，是万家灯火，是陪伴着我们的一切。

石头的消失如烟雨，轻飘飘，但总蒙住心头。

孩子再也没有石头可以玩耍，往日玩伴擦肩而过再也不打招呼，大人不再聚在石头旁唠家常，新来的务工人员也不会再在石头那里一起吃盒饭。

似乎一切都在向前走，大家奔向自己的远方，可万家灯火里有些东西随着石头消失。

外出求学，我也不再待在家乡。连我都渐渐忘

记石头。

某天，和新交的朋友相约出去游玩。朋友发来信息“在写着‘保护环境’的石头那里等我”。

一瞬间，往日重现。我才意识到：石头何曾离去，它不过走得快了些，它一定在远方等着我们到来。

作者简介：郭梦奇，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1级学生。现任光明学社新媒体部部长。

## 诗 歌 三 首

□ 商长江



### 1、空想

三月不念旧恶  
像一片潮润而咸腥的海  
淡蓝的天空渐渐在阳光和鸟鸣里大起来  
像一只巨大鸟巢

始终在凡俗世界里完美孵化着你那  
洁白的梦幻

此刻  
那迷离的微风偶尔夹着浓密果香  
在岸边轻轻掀动着你如许的哀愁  
而那布满白银大而空洞的词句那粗暴温暖的样子  
有些像你略微斜视的大眼

轻起来吧  
那逐渐超越现实的部分  
刚被一片铺满白银的流水冲刷净尽  
仅剩一些空想的枝叉  
偶尔在远方摇曳一个人的风景

那微弱的风声有时比月光更朦胧  
而蒴果般的未来  
似早已被谁独自用那炽热文字孵化出来

如一条布满饕餮花纹的热带鱼  
那纺锤形的身躯上  
始终布满澄明今夜那冷漠的星光  
有些神秘的你那饱满红唇  
逐渐粘满了岁月的甜汁  
那富有白银质感的词句  
禁不住

一个世纪那青铜光芒  
似已在一座城市中心完美融化  
或开始在一只母豹子体内开始收缩  
像一片温柔河水  
或某种神性暗示

## 2、其实

其实天始终是蓝的  
洁白的鸟群能够证明  
一只偶尔落在枝头的乌鸦是黑的  
那洁白的梨花能够证明  
而要走向壮丽明天  
需要一个如果实般甜蜜和汁水充盈的  
理由  
似已被某种强烈欲望和无聊放尽了血  
澄明的时间在一个人的风景里变得有些  
萎靡  
而那金灿灿的把手四周  
仅剩下许多四处奔跑着的植物那浓密的倒影  
此刻  
那尚未做完的梦像一个个空洞枪口  
里面装满众多悬念和关于未来的构想  
而现实一直躲在某个神秘历史的缩影里  
那布满豹纹和星相的神秘图像在女巫那淡蓝魔  
镜里

变得更加模糊

此刻  
洁白祥云在淡蓝海面徐徐升起了空洞的帆  
像枪林弹雨过后那迎接黎明和胜利的旗帜  
而那梦幻的舷窗始终被澄明的光打开着  
里面布满了许多张望的眼神和神奇的预言  
那金灿灿阳光在岸边  
逐渐褪尽了谁温柔残梦里的淡蓝色调  
慢慢让置身期间的你体温骤然上升三度

漫长黑夜逐渐空空如许多翻飞的蝴蝶  
迅速把一个人的风景火种点燃后  
那汹涌夜潮像神秘女巫一样  
逐渐将分散在四周的浓郁草药  
卷卷即将腐朽的诗意和满天繁星  
从一只母豹子眼睛里唤醒

那黄金的叶子落光之前  
那棵始终在风声和鸟鸣里沉默寡言的核桃树  
一直在为刚放学的孩子遮蔽风雨  
所有春天的秘密被澄明时间藏进那青铜的文字  
魔镜般略微倾斜着的荷塘始终撑不住的柠檬月色  
在幽静岸边慢慢倒塌下来  
那千朵荷花在水边慢慢打开或温柔绽放  
或开始以某种神秘巫术的形式退隐江湖  
那淡淡荷香像迅速褪去凡俗面纱的婉约情人  
慢慢在空旷钟声里完全包裹住了黑夜的焰心  
那许多来去自如的鱼群  
仍在星星四周继续着演习神秘占星术  
那凹凸不平部分始终像锯齿一样  
微微安抚着清波微漾的人间世界

仿佛刚刚现身江湖的剑客  
那若隐若现着的微风  
逐渐在空旷钟声里  
将一个淡蓝梦那边缘部分砍削停当

或更加诗意盎然

### 3、放飞梦想

放飞梦想

像放飞一只洁白的鸽子  
或许多追梦的蓝色蝴蝶  
而梦想之外是那一片海  
现实生活和亭台楼阁

微醺的大地上

阳光灿烂

风向偏左

淡蓝天空夜夜绽放玫瑰

在满天星光里辉映缪斯竖琴

那萧瑟音符和美妙辞章

开始在一只废弃多日的马槽里

凋落

此刻

盛夏那有些谐谑的叙事曲里

有一只鸟面对这越来越陌生化的喧嚣世界  
开始不知向何处飞

作者简介：商长江，男，1969年生。山东省宁阳县人。历史学者，泰安市作协会员、宁阳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宁阳文学》责任编辑，诗歌选稿编辑。喜爱文学、数学、音乐。2008年开始练习写作，2009年起至今在《山东文学》《夹金山》等二百四十余种文学纸媒发表诗文一千四百余首（篇）。作品入选多种文学和诗歌选本。常用笔名：月之故香、麦容、柳梦含嫣、春梦如烟。

## ●学术动态●

### 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振宏教授莅临人文学院讲学

3月28日晚，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振宏先生应邀在人文学院汉梁楼国学堂做题为《周秦汉社会转型的若干问题》的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教授主持，历史系教师及历史学专业20、21级全体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文海教授应邀到我院讲学

3月30日下午，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国史研究协会副会长陈文海教授应邀在人文学院汉梁楼国学堂做题为《“另类”文人及其“另类”表达——瓦拉与〈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主持，商丘师范学院副校长郭文佳、历史系教师及历史学专业学生等百余位师生参与本次讲座。整场讲座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在场师生享受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继周堂读《庄子》随笔之四

## 解衣盘礴是说道

□ 庄桂森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李聃，在那时，可是真的不得了，知名度大了去了。远在鲁国的拥趸，那个愿“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个习惯



“不耻下问”、那个谦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子。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自爱非常自爱的孔仲尼先生，他不怕旅途降低生活质量不怕旅途丢掉老命、他不畏万人野兽、不惧山高路远。风餐露宿，从曲阜赶到都城洛邑即今天的洛阳，真心实意地请李老师给上一课，讲讲周礼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孔仲尼从李老师那学到了周礼、学会了周礼，学会了“敬天法祖”的场面布置和仪程。因为学会了，立场很坚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且坚信“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抱负为了信念为了理想为了梦想为了追求，他严格要求自己 and 徒儿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胜于蓝地将克己复礼奉为治世秘方视作定国神器！老子李聃使孔仲尼先生激动得一塌糊涂、佩服到五体投地，以至于回到曲阜后还在激动里、还在惊诧中，以至于连续多天不说话，一直在过去时中。李老师那举止、那风度、那肚子里的学问、那教学艺术，使“诲人不倦”的孔仲尼先生、使“调过时差”的孔仲尼先生对学生说，这个老子啊，那是真的不得了实在了不得，他他他是人中龙！

“周守藏室之史”什么职务，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馆长。虽说权力不大、油水不多，可兰台首长，有权看馆藏善本孤本、可以阅读机密绝密档案。老子利用职务之便，尽情地翻看了周王室所藏的夏商周典籍。读书明理！天，看明白了；地，看明白了；人，看明白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也看明白了。读书知礼！“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学问大但低调，不张扬、不卖弄、不兜售，既不以“教授”生徒的名义聚众宣德传道，也不写成论文形成成果博取声名。老子就是老子，那看法那思想那观点，不给你讲你肯定不懂，给你讲你肯定也不懂。没办法跟别人讲，懒的对他人说！

自周平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姬旦所制的那个礼呀，崩了！那个乐呀，坏了！齐国的小白、晋国的重耳、秦国的任好一个比一个不安分，一个接着一

个搞事情。还有，南蛮子非旅，安分三年后，“一鸣惊人”，也挥师北上，将大军驻扎京畿腹地洛水岸边，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啥，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见了周王特使王孙满，他，他，他竟然要问问鼎的大小，要干什么？借用孔子的话，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至于有的诸侯国内，那真是乱，那是真乱。君不君，“鹤有乘轩者”；臣不臣，“弑君者三十六”，甚至有人因食指而动喝不上老鳖汤就起杀心杀掉国王；至于父不父子不子的，哎哟哟，没法说不忍视！老子喜欢清静，闹哄哄的乱糟糟的，老子烦了、老子怕你们行不、老子不陪你们玩了，“见周之衰，乃遂去”，骑上青牛快地走，一路向西。西出函谷关时，不知道守关的长官尹喜是请老子吃了“地锅炖”、还是“擗串”了？是捧上了真金白银、还是送上了土特产？是长跪不起哭出了一把鼻涕两行泪苦苦相求、还是将他老人家的学问可能失传失传可惜说清楚了？总之，老子感动了老子明白了老子愿意了，将自己平生所学所思所想毫无保留地写了下来，洋洋洒洒五千余言啊！分成上下篇，留给了关令尹喜。老子这五千言使他成为道家学派的祖师爷！老子这五千言为他以后的多少粉丝多少学人布置了作业！老子这五千言使他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大神太上老君！老子这五千言让无数善男信女晨钟暮鼓中无数遍地诵读！老子这五千言又使多少人做起了在诵读中羽化成仙的美梦！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如果真是这样，关令尹喜真的了不起，真的是一个有功德的人。恳请也好哭求也罢，正是他的努力，在老子过关时，使老子“把根留住”了。

学者们统计，道在《道德经》中先后出现了七十二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啊，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向乌云滚滚雷电交加暴雨倾盆的转换就是喝碗开水功夫的天啊！变幻莫测的天啊！谁也不能违背其意志的天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啊！人在做天在看的天啊！谁能左右？道呀，天法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说不出来的就是道，什么呀？玄，真这的是

很玄！搞不懂，悟，需要什么脑袋？要到猴年马月？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庄子休先生，博览群书、多学科涉猎，“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最后把专业方向放在道家，研究的对象锁定为老子。庄子休先生，他老人家聪明，他老人家读懂了《道德经》而且颇有收获。道可道，什么是道？让杀牛的告诉你，让耍猴的告诉你，让卖猪的告诉你，既不高深也不玄，凡夫俗子都可以弄懂，把老子的道说明白了。道在哪里？那让我告诉你，“目击道存”你眼看到哪那道就在哪，道在万物里，具体点，道在瓦砾中道在屎尿里。玄吗？不玄。妙吗？妙极了！怎么做才能合乎道，让那个杀牛的阿丁告诉你，“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明白了吧？

庄子休先生讲的真好！他老人家讲的“庖丁解牛”、“朝三暮四”、“每况愈下”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道在万物里，万物都有道，人与人发生关系发展关系要讲道，人立于天地之间要明道、人与阿狗阿猫相处也要合乎道。

庄子休先生在《庄子·田子方》讲到，“昔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僮僮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赢（同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这个宋元君，真是的，干什么呀？不着调。是心血来潮，还是想检查美协的工作？或许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之便搞几张画装点办公室，丰富收藏。一个通知下去，宋国体制内体制外想红包的、想提拔的、想借此提高知名度的、想与主要领导拉上关系的，都屁颠屁颠赶来了。先行大礼，然后恭恭敬敬地等着，作深呼吸调整情绪，揣摩揣摩领导好恶想法，舔笔调墨检测整理“作案工具”，作好充分准备，一定要在领导面前尽力地表现表现、充分地显摆显摆。还有一半的人进不到屋里去只好在外面候着，猴急猴急的。“有一史”神情自若悠闲自得，蹒跚蹒跚的，来晚了。接受了旨意也不恭候站立，也不在外边等着，走了，回到馆舍里去了。这，是什么人？这人是什么情况？这人怎么回事？派人去看看。只

见他袒胸露背，叉开腿坐在那正全神贯注作画。宋元君说：“哎呀，好啊！这才是真正的画家。”

庄子休先生这段子讲的实在好！好在“有一史”来晚了，悠闲自得的晚，晚了一点疚意没有，一点愧色不挂，够自信的；好在“有一史”来晚了，不恭恭敬敬地站着，不老实地等着，回到馆舍里去，胆，够肥的；好在“有一史”回到馆舍里去袒胸露背，叉开腿而坐正全神贯注作画，还真把领导的安排当成事了；好在宋元君有德有量、识才爱才，对“有一史”点赞称许，这才是真正的画家！

如果我只想到这些，庄子休先生他老人家肯定笑我们浅薄，他老人家的段子都说道、他老人家讲的段子都有道、他老人家的段子都是道。

让我猜猜，他老人家老讲这段子说什么道？我猜，他老人家一来让我们明白，学有学道，世上百工，三百六十行，无论学什么，粗通其道不行，半瓶子不中。学什么东西都要学会学通学精，学会了学通了学精了就会自信满满，“惶惶然不趋，受揖不立”；学会了学通了学精了就会赢得尊重，学会了学通了学精了才能高质量地完成领导的安排，“可矣，是真画者也。”

他老人家二来让我们知道，处世有道，人分三六九等身分士农工商，不管在哪一行什么身份什么职业，领导很重要。他贤德有度量，你是人才就会得到赏识、才干就有用武之地。否则，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

他老人家三来告诫手拿权柄的人，是人才都有点小傲气、是人才都有点小毛病、是人才都不拘小节。作领导的，度量要大心胸要宽，要允许能接受人才无关大局的小任性。

庄子休先生他老人家也让画画记住，画有画道，画画不是表演，画画要在寂静的环境中、无人干扰的状态下。人来人往闹哄哄的是画不好的。想来，如我的爱好，写字，也是如此也必需如此！

庄子休先生讲的这个段子被浓缩成解衣盘礴，理解为神闲意定，不拘形迹。后来也有人认为是行为随便，不受拘束。在他老人家驾鹤西遊两千年后，

清代有个画画的恽寿平认为：“作画须有解衣盘礴，旁若无人，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籍。”清代有个施润章也说：“俗俭讼简，宾客罕至，吏散则闭门，解衣盘礴移日，山水之意未尝不落落焉在予胸中也。”恽寿平是个名画家，那画画地好得不要不要的，应该说出了个中滋味。施润章吗，只知道他还是个儿童时就在其叔父教养之下发愤读书，孜孜不倦；年龄稍大点，可以作诗写赋了，而且写得相当好。后来，被朝廷特别看重，召试博学鸿词，做了翰林院侍讲，被重用纂修《明史》，还侍候皇帝老儿读书。他学问不懒，又是一个知名作家，“四方名士负籍问业无虚日”，可能偶尔抹上几笔，借以遣兴消闲去烦解劳，画的怎么样，俺也没见过、俺也没处查、俺也没法问、俺也不敢说。但，的确没有人说他是画家，门外之谈，调皮、矫情！

翻检中国美术史，说画画应脱掉衣服、任性涂抹的还有吴昌硕，他说“解衣盘礴吾画松。”其他，好象没有什么人说，我画画要脱去衣服甩开膀子，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

万物有道，画画亦有道。入门要过槛，入道不容易，比如说，你爹妈给你多少可用于画画的基因、细胞？你为画画熬去了多少灯油？你画画洒下了多少汗水？

画画时在官家的厅堂上，领导在现场看着、小姐案边伺候着，你脱衣服袒胸露背？不尊重领导兼耍流氓！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取暖设备不给力，你脱衣服袒胸露背？冻得你鼻涕乱淌，影响形象兼赚恶心！施润章，饱读诗书儒家弟子，翰林院侍讲、皇帝老儿的侍读，“四方名士负籍问业无虚日”的公知，多尊贵多体面的人儿，怎么敢“解衣盘礴”？怎么可能“解衣盘礴”？说自己“解衣盘礴”，假话，卖弄，不靠谱。

看来，“解衣盘礴”的画画不是什么地方什么人什么时间都可以做到的。

作者简介：庄桂森，商丘师范学院原学报主编。

## ● 学术论坛 ●

## 《论语》尧形象述论

□ 李可亭



## 一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给尧的定位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sup>[1]</sup>。

在《论语》中，“尧”出现了四次。分别是：

1. 《雍也》(6.30)：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2. 《泰伯》(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3. 《宪问》(14.42)：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4. 《尧曰》(20.1)：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



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在这四段话中，尧的形象分别是：1. 仁人、圣人；2. 君；3. 君子；4. 上古帝王。体现了孔子对尧的评价和推崇。

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 107 次，多定位在“道德”层面，也有指“贵族”的。孔子对“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有时候，“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进来，



《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是关于君子。

“君子”是孔子理想化的人格。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以“仁”释“义”，以“仁”释“勇”。“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以，孔子论君子，自然离不开“仁”。而仁人、圣人、君、君子、古圣先王，这些头衔，在《论语》中，作为尧的形象，有时是独立的，有时又是互相联系的。

## 二

孔子非常向往尧舜时期的礼制社会，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能够实现如同原始社会那样无阶级、无剥削的人人平等、贫富均、和而安的大同社会。尧舜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部落联盟首领。从总体上来看，孔子对尧的评价是很高的，他把尧看作君王的完美代表和后世君王效法的楷模。

在《泰伯》篇中，孔子称赞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皇侃《论语义疏》引王弼说：“圣人有则天之德，所以称‘唯尧则之’者，唯尧于时全则天之道也。”<sup>[2]</sup>在这里，孔子认为尧是古代圣贤（“君”）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只有尧的为君可以效法天。尧效法天，功德崇高而广远。朱熹说：“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sup>[3]</sup>这是孔子对尧功德方面的评价。

在歌颂尧的历史贡献上，《尧曰》开篇，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他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面对继位者，尧先是嗟叹了一下，然后说：“你啊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正确罢。假若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的终止了。”《尧曰》这一章内容复杂，下面又说到舜、商汤、周武王。商汤灭

夏，周武灭商，都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事，所以不可不谨慎。“天之历数在尔躬”，你就不能懈怠，否则“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最后一节中的“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总明“为君”之法。这与《泰伯》篇“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是一致的。“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所以，朱熹《集注》说：“尧之德不可名，其可见者此尔。”<sup>[4]</sup>

在孔子的心理世界，尧不仅是“古圣先王”，更是“圣人”“君子”“仁人”。孔子认为，“圣人”“君子”都需要用“仁”来支撑。

在《泰伯》篇中，孔子区分了“仁”和“圣”两个概念。“圣”是比“仁”更高的称呼，“仁”是推己及人，是一种道德行为，而“圣”则是在“仁”的基础上完成的功德。所以，人们认为“圣”是成德之名。“仁”是有心即可以实践，而“圣”则需要才能、力量。“圣”不是想成就能成的，而“仁”则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境界，关键在为与不为。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则分两个层次予以回答。一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不正是“仁人”，简直就是“圣人”，连尧舜都发愁难做到。在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提问的同时，把做人的最高境界提到了尧舜这里，一方面说这是难的，连尧舜都发愁难做到；另一方面，仿佛又说，也只有尧舜才能做到。二是“仁人”的行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由己及人，这是行仁的方法。

同样，《宪问》篇中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用三个“修己”来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层层递进，说明了自成为君子的途径。当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连尧舜都发愁难做到。君子以修己为第一要义，而修己之要在一个“敬”字。“敬”就是不懈怠、不怠慢，使自己的言行举

止皆符合于“礼”的规范。“修己”除了独善其身之外，最重要的功效是“安人”“安百姓”。在“安人”方面，自己能持身以敬，必定恭以待人，使周围的人获得安乐、和顺；功效之大者可以“安百姓”，德泽于天下。

尧不仅德行好，而且制定了辉煌的典章制度，垂范后世。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尧在历史上的贡献主要还在于将当时的很多部落连成一个整体并建立了国家的雏形。同时也改变了当时各部落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这两件事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 三

《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依次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里的“尧”，其形象是我国古代部落联盟时代的氏族首领。说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意思说尧品德高尚。紧接着，说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sup>[5]</sup>认为尧在制作历法方面具有开创意义。

《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与《尚书·尧典》有相通之处，说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参考了《尚书》的材料。《尚书·尧典》说：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sup>[6]</sup>

但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认为：“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托古改制。”<sup>[7]</sup>此说得到胡适、郭沫若、钱玄同等人的赞同。“古史辨”派的特色就是怀疑古史，认为中国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越放越大，

起初并非那么丰满、详实。从研究方法上看，“古史辨”派的做法不可厚非，但认为尧、舜、禹等古代历史人物都是传说人物的定论，今天看来则不足取。

不仅《论语》中孔子对尧表达了十分尊崇的态度，以后的儒家学派也沿着孔子的思路使尧的形象更加丰满。

如孟子对尧等古代人物及其文化精神多有阐扬。孟子认为，尧有忧天下之情怀：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sup>[8]</sup>

又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说：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sup>[9]</sup>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他“性善说”的表现。是否能达到尧的境界，关键在于行善，在于自身的所作所为。

同时，孟子还大赞尧舜的为政之道，一是行仁政。《孟子·离娄上》说：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sup>[10]</sup>又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事民治民，贼其民者也。”<sup>[11]</sup>二是尊贤、亲贤。《孟子·万章下》：（万章）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孟子）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廩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者贤者也。”<sup>[12]</sup>又，《孟子·尽心上》：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缙、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sup>[13]</sup>

孟子之后的儒家，如荀子，在《荀子》中32篇中，有《修身》《荣辱》《非相》《王制》《富国》《议兵》《天论》《正论》《性恶》《成相》《赋》《大略》《尧问》等篇中论及了尧，可见尧在荀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不惟儒家，道家如庄子，在《庄子》的在《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胠篋》《天地》《天道》《天运》《缮性》《秋水》《至乐》《山木》《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外物》《让王》《盗跖》《天下》篇中有尧的相关论述。庄子认为，尧清静无为，内心守静，归于朴，不被外物所累，精神达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逍遥自由。庄子把尧作为道家的代表，是庄子本身的写照。

《墨子》一书中，尧出现在《三辩》《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节用中》《节葬下》《天志中》《天志下》《明鬼》等九篇中。墨子塑造了一个维护万民之利的尧的形象。墨家说尧，代表了下层民众的声音，尧这一形象从高高在上的圣王下降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脱离了原本华丽的圣光，披上朴实的墨衣，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草根”君主。

#### 四

《论语》提到或者品评过的人物很多，尧是其中之一。

在对尧舜禹三人的论述上，孔子的态度是有差别的。尽管孔子把尧的看待高于舜，但在很大程度上对舜的评价是与尧等量齐观的。如《泰伯篇》孔子评价舜禹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高度赞美了舜禹的为君之道。在《雍

也篇》中孔子借尧舜提出了“仁”和“圣”两个不同道德概念的区别，认为如果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就可以超越“仁”而达到“圣”的境界了。孔子与子路谈到怎样做才称得上是“君子”时，提出君子的最高要求是“修己以安百姓”，认为这是尧舜那样的圣君也难做到的啊。虽然这两处孔子是以尧舜不能达到这些标准提及尧舜的，但也看得出来，孔子是把尧舜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上的。

孔子对于禹的评价，则又较舜低了一个层次。《泰伯篇》：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sup>[14]</sup>

“间”指罅隙，“无间”表示无可指责。大禹把自己的饮食不当回事，可是却特别敬重鬼神；把自己的穿着不当回事，可是祭祀时的服饰却很华美；自己住的房子很简陋，可是却在疏通水沟渠道上用尽力量。孔子首先赞颂禹的功德无可挑剔，同时说明祭祀在我国古代是很重要的，因为祭祀是国家政治中很重要的一环，对神的虔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其次赞颂禹的治水功绩，不顾自己的宫室简陋，把精力都用在了治洪水上，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于大禹的这些功绩，孔子只说“无间然矣”，认为他的为君无可挑剔，与“大哉尧之为君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相比，“禹，吾无间然矣”，其中的细微差别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作者简介：李可亭，河南宁陵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论语译注·论语词典》，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5页。
- [2]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34页。
- [3]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上），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634-635 页。

[4]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上），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636 页。

[5] [汉]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5-16 页。

[6] 姜建设注说：“国学新读本”《尚书》，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5—126 页。

[7] 王煦华：《古史辨伪与现代史学——顾颉刚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 页。

[8] 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国学新读本”《孟子》，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1 页。

[9] 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国学新读本”《孟子》，河南

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7 页。

[10] 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国学新读本”《孟子》，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5 页。

[11] 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国学新读本”《孟子》，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6 页。

[12] 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国学新读本”《孟子》，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3 页。

[13] 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国学新读本”《孟子》，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8—239 页。

[14] 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83 页。

## ●学术动态●

### 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应邀为人文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4月12日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郑开教授应邀为人文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郑教授以“从桃花源回溯无何有之乡”为题，按照“寻找桃花源——无何有之乡——至德之世、建德之国——小国寡民——精神的高处——从无何有之乡到人间世”的逻辑线索，对庄子著作中超越性精神性空间的内涵、特点等进行了深入揭示和诠释。报告由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教授主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学院近300名师生聆听了郑开教授的精彩演讲。

### 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孙君恒教授应邀 为人文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4月16日下午，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孙君恒教授应邀为人文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报告在应天国学堂进行，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孙教授以“走近孔子”为题，从孔子的生平事迹、基本思想、历史地位、历史贡献以及儒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等方面，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清晰勾画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基本轮廓，讲座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获益良多。

# 程晋芳治《诗》路向探析

## ——以《毛郑异同考》为例

□ 陈功文



程晋芳(1718—1784),清代著名学者。其论学,“综核百家,出入贯串汉、宋诸儒说,一以程朱为职志,著《正学论》七篇,反复于体用、博约之际”<sup>[1]</sup>。程晋芳于诸经皆有研究,经学著述颇丰,所著有《周易知旨篇》三十卷、《尚书今文释义》四十卷、《尚书古文解略》六卷、《毛郑异同考》十卷、《读诗疏笺钞》不分卷、《春秋左传翼疏》三十二卷、《礼记集释》二十卷、《诸经答问》十二卷等,其中惟《毛郑异同考》、《读诗疏笺钞》、《春秋左传翼疏》保存了下来,余皆散佚。程晋芳的《诗》学著作流《传》至今有两部,其中《读诗疏笺钞》现存为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关于此书,学界一直认为是程晋

芳的著作。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对上图所藏的《读诗疏笺钞》稿本进行了鉴定,发现此稿本之作者存疑。2009年沈津先生撰文指出该稿本的作者非程晋芳,而是另外一位不知名的人。<sup>[2]</sup>另外,该稿本仅是部分抄录《毛诗注疏》之内容,无相关研究内容,学术价值不大,故不具论。另外一本《毛郑异同考》为抄本,该抄本在内容方面主要是按照《诗经》原文顺序,有针对性地摘抄《诗经》正文,并依次抄录与正文相关的毛《传》、郑《笺》,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正义》等。抄录之后,程晋芳常常附录宋元以来学者《诗经》学研究内容,并时下己见,进行按断。这些按语是抄本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充分体现了程晋芳的《诗》学观点与治《诗》路向,值得深入探究。

### 一、评议毛、郑

程晋芳研治《诗经》,不仅发现“《笺》之与《传》异者,且四五百条”,同时又认为毛、郑之后:“诸家之说,虽皆不得其全,然一斑时见,后人奉若珠珍,而曲直之分往往淆而莫定,譬之两造既备,师听两辞,惟事模棱,莫分曲直,遂欲以两是存之,讵足以了灏案乎?”且后世学者,“去取毛、郑之

间，亦间有合者；而自出新意，有复出毛、郑之外，足以胜之者”，故程晋芳认为：“士人或泥古以疑今，或是今而弃古，皆未可为平心善学者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程晋芳取毛《传》、郑《笺》，“条其同异，杂取诸家辨正，复断以己意”<sup>[3]</sup>。显然，评议毛、郑，是《毛郑异同考》一书的重要内容。

### 1. 比较毛、郑之异同优劣

程晋芳比较毛、郑之异同得失，主要遵循“毛、郑同而是者不录，其同而未确者，亦取而辨之”<sup>[4]</sup>之原则。正因为如此，程晋芳在按语中常常指明“此《笺》胜《传》”，或“此《传》胜《笺》”，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多数情况下，程晋芳能针对毛、郑之异进行发明，进而比较二者之优劣。如《葛覃》“害澣害否”，《传》：“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笺》：“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澣乎？何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传》认为公服、私服有别，故指出“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笺》以为公私皆澣，故而不从《传》义，别立新解。针对二家之别，晋芳下案语指出毛《传》为优，其云：“郑好举典，六服岂可澣耶？观下《传》可知矣，只是近体之衣耳。毛义为长。”其实，在程晋芳之前，清儒陈启源也有类似之看法：“‘害澣害否’，毛以为问词，郑以为无所偏否，皆当澣之。窃谓毛说胜也。上以污、澣对言，此以澣、否对言，意各有当，如郑说则太复矣。”<sup>[5]</sup>显然，陈启源的观点对程晋芳是有影响的。

程晋芳不仅考辨毛、郑之异，对于毛、郑义相同，而宋以降诸家《诗》说或有新解时，程晋芳也予以考辨。如《天保》“俾尔戩谷”，毛《传》：“戩，福。谷，禄。”郑《笺》：“使女所福禄之人。”此处毛、郑义相同，但因后世有新解，故晋芳下按语曰：

《传》、《笺》此条同，而朱子以《说文》引《诗》“实始戩商”，训“戩”为“灭”，灭有“尽”义，故曰“尽善”。其义亦自可存。但上文既曰“单厚”，下文又曰“罄无不宜”，此又云“尽善”，何尽义之多也？“福禄”之说且可存之，以备参考。若何

玄子谓“戩”当作“晋”，“进也”，则愈武断矣。

程晋芳曾在书前《凡例》中称：“是书之作，非特辨毛、郑得失，兼欲学者博观宋以降书，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载之，而陈长发《稽古编》所采尤备。”<sup>[6]</sup>故《毛郑异同考》书中常载宋以降诸家说《诗》之观点。观此处之按语，知程晋芳在分辨毛、郑之异同时，确实能杂取宋以降诸家《诗》说，并断以己见。

程晋芳在指出《传》、《笺》之是非优劣时常能旁及他说，并指出他说与《传》、《笺》之关系。如《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传》：“凶荒则杀礼，犹有以将之。野有死麕，群田之获而分其肉。白茅，取洁清也。”《笺》：“乱世之民贫，而强暴之男多行无礼，故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为礼而来。”此处《传》、《笺》有别，晋芳认为《传》是《笺》非，其案语曰：“毛公训《诗》多浑辞而无所失。《笺》以为贞女之情，欲使人以白茅裹麕为礼而来，非也。”然后引苏辙《诗集传》曰：“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犹以白茅包之而后行。今有女于此思以春适人，亦必得吉士，以礼道之而后行。”晋芳认为苏氏此解“足以广《传》而正《笺》矣”。

在考辨《传》、《笺》之异同优劣时，对《正义》缩合《传》、《笺》之处，程晋芳常予以梳理，辨其得失。如《采薇》“象弭鱼服”，《传》：“鱼服，鱼皮也。”《笺》：“服，矢服也。”《正义》：“鱼服，以鱼皮为矢服，故云‘鱼服，鱼皮’。”晋芳按语曰：“‘象弭’言弓，‘鱼服’言矢，于义当然。《传》第云‘鱼皮’，《笺》足之，《正义》回合二家，最得。”晋芳从诗义出发，认为《正义》“以鱼皮为矢服”之解，正好是回合毛、郑，故而认为《正义》之解“最得”。

对于《正义》故意牵合毛、郑二家，晋芳也常常予以批驳，如《荡》“女媺然于中国”，《传》：“媺然，犹彭亨也。”《笺》：“媺然，自矜气健之貌。”《正义》：“媺然是人之形状，故言‘自

矜庄气健之貌’，与《传》‘彭亨’一也。”此处，《传》、《笺》义别，《正义》故意捏合为一，引得晋芳颇多不满，其云：“《传》以‘皤然’为形，《笺》以为气，自不同。孔疏合而一之，非也。”晋芳认为《传》解以形，《笺》释以气，《正义》却合形、气为一，显然是强为牵合，故而断其为非。接着，晋芳又进一步阐释云：“《易》‘大有’《释文》引干宝注：‘彭亨，骄满兒。’疏联形、气为一，当或本此，而不引之，何也？大抵‘皤然’训‘气健’乃是正义，当与后‘咆哮’字义同。”程晋芳不仅指出《正义》之疏忽，还补充了“皤然”之正解，弥补了《正义》之缺陷。程晋芳比较毛郑之异同，得到了学界之认可，江瀚称“其考毛郑异同颇多允当”[7]，所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2. 辨毛、郑之得失

毛《传》、郑《笺》是“诗经汉学”的权威之作，宋代之前治《诗》者多遵之，很少有突破。入宋，因受疑经改经思潮的影响，欧阳修首先对毛《传》、郑《笺》进行了全面考察与评议，指出了毛、郑之得失，对此后的《诗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生活于清代前期的程晋芳也是如此，他在比较毛、郑之异同优劣时，也辨其得失。由于程晋芳在考辨毛、郑得失时，对于毛《传》、郑《笺》的态度是一样的，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妨以毛《传》为例进行说明。毛《传》由于其崇尚平实，释辞精当，在《诗经》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拥有较高的权威。又由于它是现存最早的《诗经》注本，因存《诗经》古义而备受学界关注。程晋芳对于毛《传》的态度，一方面多次提及其语言之简质可从：

《葛覃》“葛之覃兮”之案语：“毛《传》简质可从，盖此直是赋耳。”

《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之案语：“大抵《传》义简质可从。”

《大东》“有掾天毕，载施之行”之案语：“宋人多用毛说，盖以其简质也。”

《渐渐之石》“渐渐之石，维其高矣”之案语：

“《传》简质，义已尽。”

《瞻印》“维其优矣”之案语：“此毛义简质可从。”

简质，即简约、质朴之义。程晋芳认为毛《传》简质，其实就是肯定其约而旨明的训释原则。史应勇认为：“程晋芳以为毛《传》简质可从，不必演其引申义，此为经典诠释学之大问题。清代以来的经典诠释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试图回归经之本义，但经之本义在哪里？清人大都以毛义为从。毛义只是汉初人的一家之说，但清人或以为，就历代解《诗》者而言，毛义为最古，故从之。这种思维逻辑，可谓简质也！程晋芳之说颇有代表意义。”<sup>[8]</sup>此说是也。此外，晋芳还多次提及毛义“简明”、“简浑”等，均与“简质”义相近。如：

《樛木》“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之按语：“《传》义简明。”

《楚茨》“先祖是皇”之按语：“此及《信南山》、《泮水》《笺》皆作‘睢’，《泮水》训‘睢’作‘往’，与此及《信南山》小异，然皆不及《传》之简明，故宋以降多从《传》。”

《信南山》“维禹甸之”之按语：“此二义亦可并存，而毛义简明，不可以郑之典雅而轩郑轻毛也。”

《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之按语：“毛义简浑，而《笺》亦可通。”

另一方面，程晋芳治学反对士子“泥古以疑今”、“是今而弃古”，认为士子这样做“皆未可为平心善学者也”<sup>[9]</sup>，故其对待“诗经汉学”权威之毛《传》，也能持其平，在充分肯定毛《传》之得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如《葛覃》“薄污我私”，毛《传》训“污”为“烦”，晋芳按语曰：“《传》义未备，得《笺》与《释文》乃益明。”程晋芳在指出毛《传》之不足的同时，也指出了需借助郑《笺》与《经典释文》之解，“污”义方才显明。

有时，程晋芳则直接指出毛《传》为误、毛《传》不可从。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毛《传》：“有子若是，何谓不善乎？”晋芳按语曰：“《传》解误，当以《笺》为正。”再如同篇“不屑髡也”，毛《传》：“屑，洁也。”晋芳按语曰：“‘屑’与‘洁’义本别，《传》未可从。”可见，程晋芳对于“诗经汉学”的权威——毛《传》，并非盲目信从，而是是则从之，非则议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解经原则。

### 3. 指明后人对毛《传》、郑《笺》的接受情况

如《伐檀》“不素飧兮”，《传》：“熟食曰飧。”《笺》：“飧读如‘鱼飧’之‘飧’。”《传》、《笺》释“飧”义本不同，那么，后人对二者的接受情况是怎样的呢？晋芳曰：“《说文》、《字林》皆以‘飧’为‘水浇饭’，与‘熟食’意近。康成特以饗飧礼大，故读为‘鱼飧’之‘飧’。夫‘鱼飧’之为义小矣，‘水浇饭’亦非大礼也，则宜从《传》为是。宋以降亦咸用毛义。”针对毛《传》、郑《笺》之异，程晋芳不仅指出此处宜从《传》义为是，还指出“宋以降亦咸用毛义”，即指明了宋以降学者对毛《传》、郑《笺》的接受情况。

通常情况下，程晋芳在案语时能明确指出何人从《传》，何人从《笺》，如《干旄》“素丝祝之”，《传》：“祝，织也。”《笺》：“祝当作‘属’。属，着也。”晋芳案语曰：“‘祝’训为‘织’，他本未见其义，毛由上文‘纡组’而来，故为织也。郑喜破字，训‘属’则易解。刘熙《释名》：‘祝，属也。’想本于郑。颖滨、朱子、华谷皆从郑，吕氏从毛。”另外，晋芳还指出后人弃《传》、弃《笺》情况，如《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晋芳按语曰：“郑《笺》此条久为宋元以来讲家所弃，本不甚明妥，亦无庸深辨。毛说似长。朱子云：‘虽居幽隐，亦常有临之者；虽无厌射，亦常有所守焉。’第详观毛义，似训‘不’为‘丕’，古字‘丕’作‘不’言。丕颖之地若临之，无倦之时若保之耳。朱注亦觉微拗。”

其次，晋芳还常指明后人对其他学者《诗经》学观点的接受情况。除毛《传》、郑《笺》之外，

后人对《诗经》多有解读，形成了各种《诗》学观点。晋芳在比较毛《传》、郑《笺》之异时，常征引这些不同的观点以完善毛《传》、郑《笺》之不足，并指出后世学者对这些观点的接受情况。如《氓》“靡室劳矣”，《笺》：“靡，无也。无居室之劳，言不以妇事见困苦。”晋芳案语曰：“此句毛无《传》，《笺》义未允。苏氏云‘不以室家之劳为劳’，固胜郑义，南宋以来多遵用之。”针对毛无《传》，《笺》义未允的状况，晋芳认为苏辙“不以室家之劳为劳”的观点“固胜郑义”，并指出南宋以来对苏辙观点的接受情况。

程晋芳在梳理后人对毛《传》、郑《笺》的接受情况时，并非简单地指出后人的从、弃情况，而是常常予以评判，断其是非，如前文引苏辙之观点，晋芳以“固胜郑义”断之，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晋芳梳理后人对《诗经》学的接受情况，有明显的学术史倾向，对《诗经》学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 二、尊朱与揭朱之失

在《诗经》发展史上，朱熹《诗》学体系影响也很大。“朱熹《诗》学体系的形成，标志着‘诗经宋学’由萌芽、成长发展到趋于成熟的阶段”。<sup>[10]</sup>“诗经宋学”主要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朱熹在《诗经》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确立了不同于汉唐的解经体系与解经方法，宣告了“诗经宋学”的诞生，其《诗集传》也成为“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基本上是一统天下，且影响一直持续至清代。清初，随着考据之风的兴起，“诗经清学”崛起，“诗经宋学”开始式微，但朱熹《诗》学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学界治《诗》以朱为宗者不乏其人。

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前期，随着《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诗义折中》两部官书的出现，“预示着学术转型的重要信号”<sup>[11]</sup>。特别是“《钦定诗义折中》规定的‘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和‘根据毛郑订正其讹’的方针，却成为乾嘉时期《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sup>[12]</sup>。在乾嘉考据学风兴盛的大背景下，《诗经》学研究由尊崇朱学而转向尊崇毛、



郑。程晋芳《毛郑异同考》就出现于由“诗经宋学”向“诗经清学”转型时期。程晋芳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但他的《诗》学观点与四库馆臣重汉学轻宋学的主流观点不合。司马朝军曾拿程晋芳的《诗》学观与《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比较，认为“程晋芳的《诗》学观与《总目》相反”<sup>[13]</sup>。由此可见，程晋芳研究《诗经》仍然尊崇朱学。这与他一贯学宗程朱的思想相一致，他在《正学论》中曾明确说明：“由汉及唐，孔孟之真《传》不显，而学行合一，默与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贤出而圣学大明，修齐治平之理较然为一，……自是以降，守程朱正脉者，四百年中且数百人，其尤著者数十人，其立身行事，皆所谓俯仰无愧者。”<sup>[14]</sup>又云：“守程朱之正脉，自治于衾影幽暗之中，博学于文，约之于礼，措诸事而正，施之行而利，余深有望于世之为学者焉。”<sup>[15]</sup>可见，程晋芳治学极为推崇朱学，其治《诗》也是如此。在《毛郑异同考》中，程晋芳就大量引用朱熹《诗集传》的观点。程晋芳在抄录每条内容之后所附之按语中，常常征引宋元明清以来的诸家《诗》学观点。他曾在抄本前所附的《凡例》中说：“是书之作，非特辨毛、郑得失，兼欲学者博观宋以降书，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载之，而陈长发《稽古编》所采尤备。”但据笔者统计，在实际征引中，按语中引用诸家之说最多的不是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而是朱熹的《诗集传》。其中，征引《诗集传》凡79次，超过了征引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73次。这颇能说明程晋芳对朱熹《诗集传》之重视。

程晋芳在引用朱熹《诗集传》内容时，对朱熹合理的训解常常予以肯定。如《大叔于田》篇，晋芳释“两骖如手”时按语曰：“（《传》、《笺》）二义微异，而皆可通。宋人多从郑解，朱子曰：‘两服并首在前，而两骖在旁，稍次其后，如人之两手也。’于郑义尤有发明。”显然，晋芳认为朱熹之解发明郑义，是可取的。再如《何人斯》篇，晋芳释“云何其吁”时按语曰：“孔述《传》意，似与

《笺》异，然皆未安也。朱子引《易》及《字林》、《三都赋》‘盱’为‘张目’之义云：‘何不一起来见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此最得之。”不难看出程晋芳对朱子训解的肯定。此外，程晋芳的按语中常常提及朱子之说“最明晰”、“尤明确”、“胜旧说”、“诸家解说未有能胜之者”等，显然都是对朱熹《诗经》学的推崇。

当然，身处学术转型时期的程晋芳，对朱熹的推崇也并非没有动摇。表现在《毛郑异同考》中，程晋芳在引用《诗集传》内容时，也能揭其之失，表达出不同的见解。如在《南山有台》篇中，晋芳释“遐不作”之“遐”时按语曰：“朱子训‘遐’为‘何’，未敢信为然也。”再如《小宛》篇之“而月斯征”，晋芳释此句按语曰：“朱子曰：‘我既日斯迈，则汝亦月斯征矣。’训‘而’为‘尔’，详上下文，恐亦未安。”再如《菀柳》篇“上帝甚蹈”，朱子云：“蹈，当作神。”晋芳认为此解“则是远矣”。再如《卢令》“其人美且鬢”，《传》：“鬢，好貌。”《笺》：“鬢读当为权。权，勇壮也。”晋芳按语曰：“传本《说文》，不应有误。但《说文》云：‘髮好也。’而毛公无‘髮’字，遂觉不明，或传写失之耳。此义似无可易。正义曲为笺说，不能胜也。朱子训‘鬢’为‘须髮好’，于《说文》之义别增‘须’字。宋贤如此等似未可从。”当然，由以上所引之例不难看出，程晋芳在揭朱之失时，用词显得比较委婉。

有时，程晋芳还通过将朱熹之解与他人进行比较，指出朱熹之解不若他人。如《北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传》：“狐赤乌黑，莫能别也。”《笺》：“赤则狐也，黑则乌也，犹今君臣相承，为恶如一。”晋芳按语云：“笺较胜传。朱子谓狐与乌‘皆不详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似又胜郑。郝氏敬曰：‘耳闻目击，莫非凶类。’则更胜朱矣。”再如《破斧》“四国是遘”，《传》：“遘，固也。”《笺》：“遘，斂也。”晋芳按语云：“朱子云：‘遘，斂而用之也。’

兼用毛、郑义，终不及曹纯老直训‘遘’为‘聚’为简截也。”

程晋芳对朱熹《诗集传》的态度，说明了他对《诗经》学研究方面，并不一味地迷信、盲从权威，虽然其治学“守程朱之正脉”，但却能唯是是从，体现出严谨的治经风尚。

### 三、兼采汉宋

程晋芳为学“笃守程朱”，虽“综览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未始不以程朱为职志也”<sup>[16]</sup>。前文所提及的程晋芳推崇朱学，实际上也是其崇尚宋学的表现。在《毛郑异同考》中，程晋芳在比较毛《传》、郑《笺》之异同时，常常征引前人《诗经》学观点。据统计，程晋芳在解《诗》时，大量征引了宋元明清以来的宋学家的《诗》学观点，主要包括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苏辙《诗集传》、严粲《诗缉》、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王安石《诗经新义》、曹粹中《放斋诗说》、毛居正《诗经正误》、程颐《诗解》、张载《诗说》、王应麟《诗地理考》、范处义《逸齐诗补传》、李樵《毛诗李黄集解》、吕大临《诗说》、刘敞《诗经小传》、刘彝《诗经中义》、季本《诗说解颐》、杨慎《升庵经说》之《诗经说》、黄一正《诗经埤传》、郝敬《诗经原解》、张彩《诗原》、徐光启《毛诗六帖》、朱道行《诗经集思通》、唐汝谔《毛诗微言》、曹氏《毛氏诗札》、李光地《诗所》、朱鹤龄《诗经通义》、秦松龄《毛诗日笺》、陆奎勋《陆堂诗学》等。其中，程晋芳对于朱熹《诗集传》、苏辙《诗集传》、严粲《诗缉》、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等书都是大量征引的。从程晋芳所引宋学家的《诗》学观点及次数来看，《毛郑异同考》确实是崇尚宋学的。

此外，程晋芳在说《诗》时，常常对宋人治《诗》之观点加以肯定，此也可以看作是他崇尚宋学之表现。如：

《关雎》“优哉游哉”之按语：“毛、郑皆训‘悠’为‘思’，无可易，而训诂未有以‘悠’为

“思”者，荆公曰：“悠者，思之长也。”义乃完足，宋人讲解俱有可取，大率类此。”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之按语：“朱子曰：“采采，非一采也。”汉唐诸解有待宋始明者，此类是也。”

《七月》“朋酒斯飧”之按语：“‘朋酒斯飧’，毛《传》以为党正饮酒之礼，郑《笺》以为国君大饮燕之礼，说既截然不同。朱子本张子之言，以为‘民飧其君’，至今多用其说。陈长发力辨其非，欲从古训，不知朱子《语录》言之已详。执成周太平之礼，解幽国质朴之风，未见其得也。自以宋义为归，未敢高言汉学。”

《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之按语：“朱子曰：‘言东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劳甚矣。’义似浅直而最确切。宋贤说经岂可尽废耶？”

程晋芳崇尚宋学，认为宋儒说经不可尽废，但他也意识到了宋儒治《诗》存在不足之处，指出：“宋贤之说经也，一则苦于澜翻，一则好为臆断。”正因为如此，他在《毛郑异同考》中，常常指出宋儒治经之弊，如：

《采芣》“于以采芣”之按语：“宋贤好虚义。”

《芄兰》“容兮遂兮”之按语：“盖宋学尚虚耳。”

《板》“无然宪宪”之按语：“宋贤释经虽好武断，然‘轩轩’即‘欣欣’之意，此说似可存参。”

程晋芳意识到：“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sup>[17]</sup>他不满足于汉、宋学者互弃的做法，认为真正的有志之士应该做到：“必不为俗拘，不泥古，不遗今，博学而反求诸约，养心而不弊于欲，卓然为儒大宗，岂必专守一家，蒙齷齪小夫之诮哉？”<sup>[18]</sup>因此，程晋芳治学主张汉宋兼采，强调不偏废汉宋，不专守一家。他认为：“今之学者，类稍知读注疏，不尽从事宋学矣。然即一经之中，注、疏之异同得失，亦未易辨也。即如小毛公之于《诗》，得六世之《传》于子夏，其言简质而深密，诚有如李清臣、叶梦得所称者。康成出而申毛，以难三家，遂使三家坐废。然《笺》

之与《传》异者，且四五百条。宋贤谓康成以《礼》释经，与毛乖迕，然岂无郑得而毛失者乎？……且宋贤之说经也，一则苦于澜翻，一则好为臆断。然去取毛、郑之间，亦间有合者；而自出新意，有复出毛、郑之外，足以胜之者。士人或泥古以疑今，或是今而弃古，皆未可为平心善学者也。”<sup>[19]</sup>不难看出，晋芳治毛《诗》，意识到汉宋诸儒各有优长，故而在解《诗》时能做到兼采汉宋。

《毛郑异同考》兼采汉学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程晋芳在书中运用到了乾嘉汉学之考据、训诂的方法。如卷二《墙有茨》“中葍之言”，《传》：“中葍，内葍也。”《笺》：“‘内葍’之言，谓宫中所葍成顽与夫人淫昏之语。”《经典释文》：“葍，本又作‘遘’。”程晋芳按语云：

按：遘者，邂逅之意。此“葍”字与“遘”不同，古字多借用，故或作遘也。《说文》：“葍，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汉·梁王共传》：“听闻中葍之言。”应劭曰：“中葍，材遘在堂之中也。”师古曰：“构，谓舍之交积材木也。”吕《记》独取应说，近之。朱《传》取颜说，当以其本《说文》也。则与“堂构”义近，非“构合”之“构”。《传》云“内葍”义，或在此。而《笺》以“宫中构成”解之，则以“葍”为“构”，失《诗》之旨矣。《玉篇》“葍”作“霽”，云“夜也”，引《诗》“中葍之言”，中夜之言也，义本《韩诗》。夫“葍”既从宀，则为“霽”字之形，仍从材木之训，可也。齐、鲁、韩三家说《诗》多杜撰，《玉篇》不用《说文》而据《韩诗》，疏矣。

由此按语不难看出程晋芳在解经过程中也善于使用汉学家。程晋芳治经虽崇尚宋学，但他及官京师时，曾“与笥河师、戴君东原游，乃治经，究心训诂”<sup>[20]</sup>。正因为如此，清儒江藩在撰《汉学师承记》时，将程晋芳列入汉学家系列，可见江藩认为程晋芳治经宗汉学。由此不难看出，程晋芳治《诗》，不仅在理论上兼采汉宋之意识，在实际操作中，也是重宋学而不完全废弃汉学。

其二，程晋芳在书中大量征引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内容，也反映了他治《诗》兼采汉学。程晋芳撰《毛郑异同考》，于“陈长发《稽古编》所采尤备”，在引用次数方面仅次于朱熹《诗集传》。关于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四库馆臣认为此书“诠释经旨，一准毛《传》，而郑《笺》佐之，……于汉学可谓专门。……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sup>[21]</sup>。《毛郑异同考》引用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常常是大段征引该书内容，或独立成文，或将其置于所录《正义》文后。程晋芳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兼欲学者博观宋以降书”，其主要目的应该还是在阐明其治《诗》兼采汉学的主张。

程晋芳治《诗》，能够正确对待汉学、宋学之得失。面对乾隆朝汉学日渐兴起之势，他反对汉学家的党同伐异，故在《击鼓》篇“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之按语中说：“解经生勿以汉学骄人，而谓宋贤无可依傍也。”这实际上体现了其治经兼采汉宋、实事求是的治经精神。

### 结 语

程晋芳生活于由“诗经宋学”向“诗经清学”转型时期，故其治《诗》也带有学术转型时期的相关特点。虽然程晋芳的学术思想与宋学相近，但其在治《诗》实际中却能贯穿汉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故其既能平心评议毛、郑之得失，也能较为公正地评议宋元明清《诗》学观。这与之前的宋明学者一味地尊朱有别，与乾嘉汉学大兴后的《诗经》学者尊奉毛、郑也不相一致。程晋芳治《诗》，在比较毛、郑之异的同时，无论是评议毛、郑之得失，还是尊朱与揭朱之失，兼采汉宋之学，均能反映出其在解经过程中并没有一味地盲从一家。即使是毛《传》、郑《笺》、朱熹《诗集传》这样权威的《诗经》学著作，程晋芳也能持论公允，择善而从。这也充分显示了程晋芳治《诗》态度的谨慎与严谨。

四库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曾云：“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

经义明矣。”<sup>[22]</sup>显然，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是治经之手段，明经义才是治经之目的。程晋芳致力于考辨毛、郑之异同得失，不盲从权威，阐幽发微，言简意赅，目的就是为了试图探明《诗经》之古义。程晋芳比较毛《传》、郑《笺》之异同，并对此展开梳理与研究，对清代乾嘉年间《毛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乾嘉朴学的兴盛，马瑞辰、胡承珙、陈奂相继研治《毛诗》，分别毛《传》、郑《笺》，迎来了《毛诗》研究新高峰。

作者简介：陈功文，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参考文献：

- [1] 金天翮：《程晋芳传》，《皖志列传稿》（卷三）第216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
- [2] 沈津：《从鉴定〈读诗疏笺钞〉而想到的》，《书海扬舲录》第179-18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3][9][19][清]程晋芳：《毛郑异同考序》，魏世民点校，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第717、717、71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
- [4] 参见程晋芳《毛郑异同考》抄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第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所引《毛郑异同考》材料解出自此书，文中不一一列出。
- [5][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5册）第34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6] 程晋芳：《毛郑异同考凡例》，《毛郑异同考》，《续修四库全书》（第63册）第3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7]《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3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 [8] 史应勇：《〈毛诗〉郑王比义发微》第2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
- [10][11][12] 洪湛侯：《诗经学史》第362、477、4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 [13] 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第5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4][清]程晋芳：《正学论一》，魏世民点校，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第689页，[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
- [15][17][18][清]程晋芳：《正学论四》，魏世民点校，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第693、694、695页，[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
- [16][清]翁方刚：《皇清诰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加四级戴园程君墓志铭（并序）》，载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第845页。
- [20] 漆永祥笺释，江藩：《汉学师承记笺释》第6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21][2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3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 ●学术动态●

### 洛阳鸣鹤博物馆馆长赵林安先生莅临我院讲学

2023年5月26日下午，洛阳市鸣鹤博物馆馆长、洛阳师范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首批历史学科基地主持人赵林安先生，应邀在人文学院汉梁楼125报告厅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何尊里中国》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教授主持，历史学专业百余位学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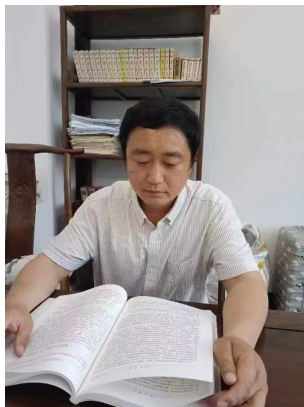
赵林安先生的讲座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丘历史文化传说引入，从国宝级西周重器“何尊”谈起，讲述了商族及周族起源、晚商的统治，周人励精图治及周灭商，周公旦制礼作乐等周灭商的主要过程。通过精彩的讲述，使同学们对国宝级西周重器“何尊”以及周灭商的主要过程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 祥瑞与改制：汉武帝太始二年更黄金 诏书探微

□ 张建文 解远文



张建文



解远文

西汉太始二年（前95）三月，汉武帝颁布著名的更黄金诏书：“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裹蹏以协瑞焉。”<sup>[1]</sup>历代学者关于这一诏书的理解，多从协瑞和改制两方面进行申述。应劭指出：“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裹蹏以协嘉祉也。古有骏马名腰褭，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sup>[2]</sup>颜师古在应劭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裹蹏，是则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时吉字金挺之类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耳。今人往往于

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sup>[3]</sup>二位先贤所论甚是，对理解此诏书大有助益。海昏侯墓黄金出土后，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它们是汉武帝太始二年诏书所改麟趾金、裹蹏金。刘慧中等认为其是具有匈奴文化色彩的祭祀品，乃神化君权、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韦正认为其是汉武帝升仙的象征物，带着原始思维和巫术的色彩；饶建伟认为其体现了儒家的“君权神授”思想，其中的马蹄状裹蹏金体现了汉武帝驱逐匈奴、创造盛世的事功，具有神意和皇权交织在一起的宗教祭祀功能；赵培认为裹蹏金是与汉初德水相合的协瑞之物；徐宁宁认为其是汉帝国强盛的标志和汉代文明的时代符号。这些研究丰富了太始二年诏书所改麟趾金、裹蹏金的文化内涵，但也有未尽之处，未将汉武帝更名改制麟趾金、裹蹏金的这一事件放入汉武帝时代乃至西汉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未深挖这一事件的历史文化渊源，未辨明祥瑞和黄金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解析祥瑞背后所蕴含的特殊历史意义，故不能揭示汉武帝这一举措的特殊目的。是此，笔者拟从历史文本阐释的视角为该诏书建构历史文本叙述，以求教方家。

### 一、“符应合于天地”与“获白麟以馈宗庙”

所谓“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即汉武帝在元狩元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麋然”<sup>[4]</sup>。“郊雍”即在雍进行“郊祀”，是汉代皇帝祭祀“上帝”所举行的一种仪式活动。汉武帝在举行此活动过程中狩猎到一只“麋”一样的“角兽”。《说文解字》载：“麋者，麋属也。麋者，麋属也。韦昭曰：‘楚人谓麋为麋。盖麋似麋而無角’。”<sup>[5]</sup>所以这只角兽被“有司”认为是“上帝”对汉武帝虔诚祭祀供奉牺牲的酬答，乃是“麟”，是为史书所载“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sup>[6]</sup>。汉武帝深以为意，因此将之进献“五时，时加一牛以燎”，并认为这头“麟”是与天地相合的“符”，所以他“赐诸侯白金”，向天下“风符应合于天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p>[7]</sup>如济北王知道后便猜度出汉武帝要封禅，因此“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sup>[8]</sup>另，常山王的王国因为他“有罪”而被废除，变成汉廷直属的郡，进而形成“五岳皆在天子之郡”的局面，为汉武帝后来进行封禅铺平了地理上的条件。<sup>[9]</sup>

关于“风符应合于天地”之“符”，“臣瓚”注《汉书》指出其为“符瑞”。<sup>[10]</sup>至论！“符瑞”指“帝王受命的征兆”，表明这次的“符”是被汉武帝认作为“上帝”赐予汉朝的“符命”。《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时。获白麟，作《白麟之歌》”<sup>[11]</sup>。其内容为“朝陇首，览西垠，雷电，获白麟。爰五止，显黄德，图匈奴，熏鬻殛。辟流离，抑不详，宾百僚，山河殄。掩回轅，鬣长驰，腾雨师，洒路陂。流星陨，感惟风，籥归云，抚怀心”。其中“获白麟。爰五止，显黄德”，颜师古注《汉书》指出“爰，曰也，发语辞也。止，足也。史称白麟足有五蹠。”<sup>[12]</sup>即白麟的脚有5个脚趾，彰显出汉朝的德运是“黄德”，也就是“土德”。因此，白麟是上帝赐予汉朝的“符命”。

“符命”，即“受命之符”，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获得天命认可的标志，代表这一政权的法统，

为年轻的汉武帝所最关心。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有感于“王道大坏”，“五百年之间”不能归正，大为困惑，便向董仲舒发出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sup>[13]</sup>其目的就是要寻求方法使汉政权获得“符命”，进而实现社会大治，接续三代以来的法统，为汉政权的统治披上“天命”这一传统上的合法性理论依据。

明鉴于此，董仲舒“案《春秋》”以对，首先从灾异的角度指出一个国家在败亡失去天命之前，天会“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如果还“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命就会被收回。<sup>[14]</sup>其次，董仲舒结合周朝历史论证出王朝败亡“非道亡也”，天下的“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谬失其统也”。<sup>[15]</sup>最后，董仲舒指出“受命之符”乃“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只有天下之人像认可归属父母一样认可归属新政权，才会“天瑞应诚而至”，其成功方法从三代获得受命之符的经验来看，都是“积善累德之效也”。<sup>[16]</sup>汉立国至今七十余年，“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所以当下的时务在于“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sup>[17]</sup>

基此，汉武帝继续向董仲舒深入发问。董仲舒继续案《春秋》以对，并提出两条建议。其一，汉朝要用贤人治理天下。其途径首先是选贤。“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这样才能“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sup>[18]</sup>其次是要进贤，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sup>[19]</sup>其二，汉朝要用尊儒来实现大一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sup>[20]</sup>汉武帝览策后接受并实施了董仲舒的建议，史称“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sup>[21]</sup>或正是缘此，董仲舒对元狩元年的获麟事件也极为认同，说“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也”<sup>[22]</sup>。

综上，汉武帝将“获白麟”作为汉朝的“符命”，并“风符应合于天地”。济北王的主动献地代表了在现实社会层面上的认同，董仲舒的认可又代表了学术或可进一步说是“道”（意识形态）这一层面上的背书，两者共同作用证明了麒麟作为汉朝的“符命”是被天所认可的，代表着那个时代国家建立政权法统的叙述逻辑。

## 二、“以征不服”与“渥洼水出天马”

“渥洼水出天马”的具体史实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笔下，但颇简略，不过数语勾勒。《史记·乐书》载：“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sup>[23]</sup>。其后，班固在《汉书》内的两次记载为此事加上了时间，但却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此事于元鼎四年（前113），“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sup>[24]</sup>；《汉书·礼乐志》在《天马》歌后载此事为“元狩三年（前120），马生渥洼水中作”<sup>[25]</sup>。李正宇从汉武帝诏书时间、历史地理学及相关记载等多方面推定此事发生于元鼎三年（前114）秋季前后。<sup>[26]</sup>可从，当不出事实太远。

关于“马生渥洼水中”一事的具体细节，李裴注云：“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教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鞞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sup>[27]</sup>学界对此多不持疑，认为其合于情理，应为事实。赵培据此指出，暴利长“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恰好与汉初德水呼应，这就是汉武帝将此事作为祥瑞的

主因。<sup>[28]</sup>不过，“马生于水中”的事件在汉武帝时期最早发生在元狩二年（前121），即“夏，马生余吾水中”<sup>[29]</sup>。故而，若只是因为彼时汉德水而将“马生渥洼水中”作为祥瑞，那汉武帝为何不将更早的“马生余吾水中”作为祥瑞呢？所以，汉武帝将“马生渥洼水中”一事作为祥瑞当有其它更深刻的缘由。

汉武帝非常重视“马生渥洼水中”这一祥瑞，先是为之写诗，后又为之作乐并打算“协于宗庙”。这引起信奉黄老学说的直谏之臣汲黯的不理解和反对：“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汉武帝被批评后虽未听从公孙弘“黯诽谤圣制，当族”的建议惩处汲黯，但也“默然不说”，<sup>[30]</sup>最后却是仍将这些歌乐协于宗庙，使之成为汉廷国家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他执政时期制礼作乐的重要功绩。

审视汉武帝为渥洼水中所出马作的诗，《史记·乐书》载诗名为《太一之歌》，内容为“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蹀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sup>[31]</sup>。《汉书·礼乐志》则载诗名为《天马歌》，内容为“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倏傥，精权奇，籥浮云，晻上驰。体容与，泄万里，今安匹，龙为友”<sup>[32]</sup>。比较二诗可知，一方面，两首诗所载为同一事件，所描述内容的文字也较为一致。故李正宇认为“《史记》早于《汉书》一百多年，所载应是原词，《汉书》所载，当是后来的改本，原篇名《太一之歌》，也改成了《天马》”。甚是。《汉书·佞幸传》载“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sup>[33]</sup>，故此笔者认为，二首诗内容上的变化很可能与司马相如等一批围绕在汉武帝身边的御用文人进行润色有关系。另一方面，二诗的不同点也突出，最大的区别是关于天马的来源问题。虽然二诗都将此马与天神太一关联，但《太一之歌》内表述的是“太一贡”马给汉武帝；《天马歌》则变

成了“太一况”马，即太一赐马给汉武帝，这反映出了天神“太一”地位的变化和汉廷国家祭祀的调整改变。根据史书记载和相关研究，汉代将天神太一作为国家祭祀对象是从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在长安东南郊立太一坛开始，此后形象日益丰满、受重视程度逐渐提高，至元鼎五年（前115）被汉武帝于甘泉宫立泰畤，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祭祀对象，从此享受皇帝亲祭。<sup>[34]</sup>是年，汉武帝在祭祀太一后下诏称“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望见泰一，修天文禘”<sup>[35]</sup>，进一步把“渥洼水出马”和建功立业联系起来。

众所周知，马乃军国重器，在汉武帝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匈奴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那个时代讨伐匈奴建功立业的必要条件。所以，汉武帝将二者联系起来，或与当时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匈奴战争的现实需要有关系。

汉武帝以英年即位，励志于击匈奴以保国家雪国耻。自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设马邑之谋始，经过河南战役、河西战役和漠北战役等三次大规模战役的打击后。一方面匈奴被重创，远遁漠北苦寒之地，“漠南无王庭”<sup>[36]</sup>，但却并未因此臣服，仍是汉边郡的巨大威胁。史载“匈奴数使奇兵侵犯汉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sup>[37]</sup>，说明匈奴依旧需要进一步防范打击。另一方面，由于连续多年的对匈奴作战，汉损失巨大，尤其是军马因此变得严重不足。仅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出征前“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sup>[38]</sup>，由此可见对匈奴作战的马匹损耗严重之一斑。再，军马补充培育周期较长，这就造成在此战后的14年内，汉“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sup>[39]</sup>，形成“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sup>[40]</sup>的局面。故此，汉武帝接连多年推出多项政策以期能补充军马。元狩五年因“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如淳指出“贵平牡

马价，欲使人竞蓄马”。<sup>[41]</sup>有学者指出这一举措“违反经济规律，难于长期推行”<sup>[42]</sup>，故可想见实行这一措施想取得理想效果较难。其后，汉武帝为获取马匹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sup>[43]</sup>，即强迫想通过买爵免役的富人出马。这般强征暴敛式的举措肯定会损耗国家公信力，显然不是长久之策，只能作权宜之计以解燃眉之急，另寻其它更妥帖的方法也就势在必行。元鼎四年初，汉武帝出巡郡国，看到“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杀“北地太守以下”，下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sup>[44]</sup>，通过官借母马与民代养而收息的方式以增加国家马匹。元鼎五年，汉武帝进一步发扬上年的政策精神，“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sup>[45]</sup>即在全国范围内要求贵族官吏们按级别出一定数量的母马到亭蓄养繁衍，汉廷则按一定比例收息。多措之下，元封元年，军马数量终于得到一定的恢复，汉武帝灭南越和东瓯后，炫兵于北边，“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sup>[46]</sup>。

综上所述，“马生余吾水中”一事发生在元狩二年，“马生渥洼水中”一事发生于元鼎三年。二马皆从水中出，也就是都与汉初德水相合。从《汉书·武帝纪》对二马的发现经过“马生余吾水中”和“马生渥洼水中”看，二事实质上本为同一性质之事，甚至在汲黯等这样耿直的时人看来不过是得马而已，都未必能称得上是神异之事。由此可明，后者之所以能成为祥瑞，其关键之处在于它的出现若被神化，是有利于汉武帝对现实社会政策的需要。“马生渥洼水中”一事正好发生在汉廷因对匈奴作战而导致“天下马少”的现实困境之中，又恰逢天神太一渐被确立为汉廷的国家最高祭祀对象。因此当渥洼水中所出的马在元鼎四年被汉武帝得到后，他才将之与太一神联系起来并为之写诗作乐以协宗



庙，目的就是想通过神异此事并将之神秘化，一方面展示汉武帝对马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太一”神将之化成祥瑞而昭示出征服天下的美好愿景，进而提振天下蓄养马匹的积极性。太初四年，汉攻破大宛取其汗血马来。司马迁载汉武帝再次作《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sup>[47]</sup>。《汉书》则载为“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闾阖，观玉台。”<sup>[48]</sup>从“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以征不服”到“归有德”、“降外国”、“四夷服”和“九夷服”等，汉武帝笔下所描述与天马相关的内容，正是其内心的独白，其所表露的是汉廷对天下的经略，即汉武帝御“渥洼水出马”“以征不服”所建立下的奇功伟业。

### 三、“建汉家封禅”与“泰山见黄金”

由于史书记载的缺略，“泰山见黄金”一事仅见于太始二年更黄金诏书内，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和经过等今已难详，在该诏书内所涉及的三件祥瑞中最为神秘，故过往史家学者多有忽略或即使注意到也未能详明其原委。其实，透过史书的记载可以发现，在汉武帝时期，泰山与黄金之间具有某种神秘的关联，二者的桥梁是封禅。

封禅是中国古代一种祭祀天地的典礼，是封和禅两种祭祀礼仪的合称。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为封，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为禅。<sup>[49]</sup>“报”即报告，指古代易姓帝王在“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sup>[50]</sup>。司马迁总结历史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sup>[51]</sup>因此汉兴六十年后，即位之初的汉武帝，便“欲议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但却因窦太后而流产。<sup>[52]</sup>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薨，汉武帝再无掣肘，封禅之议又渐被重启。不过，封禅之事“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sup>[53]</sup>，“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sup>[54]</sup>。故而，此时参与封禅大计的除儒生外，还有方士群体，且落到实际处，儒生因羁縻于经典，方士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据史书所载，李少君是最早受到汉武帝信任的大方士。他曾向汉武帝进言：“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首次将黄金和封禅联系起来，并以古代圣王黄帝为例神化其作用可以达到不死。汉武帝听后自然大受鼓动，“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sup>[55]</sup>是后，李少君病死，汉武帝却认为他“化去不死”，还让“黄锤史宽舒受其方。”<sup>[56]</sup>由此可明汉武帝欲“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之痴心。但此事直到元鼎四年(前113)仍未能成功，汉武帝于是深深忧虑“黄金不就”。上有所忧，下必应之。因此，栾大因乐成侯的举荐走入汉武帝视野。汉武帝在让栾大“验小方”后封他为“五利将军”，让他继续李少君的事业。但一年后便因“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讎”而被汉武帝诛杀，影响有限。<sup>[57]</sup>

在栾大之后最受汉武帝信任方士的是公孙卿，他借元鼎四年宝鼎之事向汉武帝进献“鼎书”，将汉武帝得鼎与“黄帝故事”建立神秘的联系，称黄帝得到宝鼎后“迎日推策”并最终“仙登于天”，而武帝得鼎“与黄帝时等”。有学者指出，“宝鼎所传达的启示因而不仅在于鼎本身的来源和象征意义，更在于其出现的时间点与黄帝得鼎有直接对应关系，可以为武帝指示成就比肩黄帝的圣王事业，并最终‘仙登于天’的法门。”<sup>[58]</sup>故此，汉武帝览鼎书后极为喜悦，特地召见公孙卿。公孙卿于

是托名其师齐人申公向汉武帝说“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仙登天矣。”又详细述说黄帝铸造宝鼎的经过：“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使汉武帝大受鼓动，发出“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的向往之言。<sup>[59]</sup>

汉武帝获宝鼎后，积极筹备封禅事宜。但封禅之说虽起于上古，却“人人言殊”，并在口耳间渐被神化。在时人的叙述中，封禅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皇帝个人能否成仙不死，更关联着一个政权的统治根基问题。查之于近，秦始皇封禅“为暴风雨所击”，世人多称其“不得封禅”<sup>[60]</sup>，最终病死沙丘，秦朝“二世而亡”。究之上古，据管仲所说，封禅者有“七十二家”，他“所记者十有二焉”，都是“受命然后得封禅”。<sup>[61]</sup>到公孙卿转述时，又变成只有黄帝一人封禅成功。故此，汉武帝欲封禅，自然会有深深的忧虑，当然要以前者为鉴。史载，九十余岁的齐人丁公向汉武帝建言：“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而到将要去举行封禅时，公孙卿等众多方士又说“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因此，为能成功封禅，汉武帝想效仿“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也就成为自然之事。是此，择时与“仿古”为汉武帝封禅要准备的重要内容。<sup>[62]</sup>

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先举行了“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骑，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凉如”的古老仪式。四月，他又选了个晴朗的日子，终于登泰山封禅，史称“建汉家封禅”<sup>[63]</sup>。史书特载当日“无风雨灾”<sup>[64]</sup>，夜间“若有光”，白天有“白云出封中”<sup>[65]</sup>。汉武帝因此志得意满，下诏称“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又“震于怪物”，所以不敢不封禅。从此“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并改元为“元封

元年”。<sup>[66]</sup>又仿古制规定“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还“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sup>[67]</sup>趁此良机，方士们“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汉武帝因此“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但此时曾独得陪同武帝上山封禅的亲密侍从“奉车子侯”却“暴病，一日死”。武帝不得不离开，但心中对仙人的向往之心不息，故而向北“并海上”绕行回到充满神秘的甘泉宫。<sup>[68]</sup>

甘泉原是秦及汉初的重要军事战略要地，汉武帝在此大规模兴建宫殿，至元狩四年后逐步成为国家祭祀中心。<sup>[69]</sup>田天指出，甘泉宫集神圣与世俗的诸种功用于一身，汉武帝巡狩四方多次以此作为起点或终点。<sup>[70]</sup>因此，汉武帝元封元年封禅赴海东望无果后返回甘泉宫，自然也就传递出仍心存登仙的渴望。所以史书见载，是年数月后的秋天“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而望气的方士又说自己独自一人看到“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则附和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sup>[71]</sup>表明祥瑞仍将围绕汉武帝所念不断衍生，而其所依据的来源便是和黄帝相关的故事。

元封五年，汉武帝增封泰山并在明堂“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次年春，汉武帝下令建造“首山宫”；是年三月又在河东郡祠后土后下诏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sup>[72]</sup>，把黄金与首山关联起来。联系前文李少君和公孙卿所述成仙的方法，“祠灶”、“化黄金”、“黄帝铸鼎于首山”以及“封禅”，不禁勾勒出一副汉武帝效法黄帝而得出的登仙法门。同时，这也为我们揭示出“泰山见黄金”应是与此相类的一种祥瑞，它应晚于首山化黄金，出现在汉武帝元封六年至太始二年间的某次修封泰山之时。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武帝基本遵循五年一修封，在太初三年<sup>[73]</sup>和天汉三年<sup>[74]</sup>举行了修封泰山的典礼。而太初元年五月汉“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基本完成汉朝应天改制的伟大举措；元封二年夏，天下大旱，汉武帝却听信公孙卿“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的鼓噪，下

诏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sup>[75]</sup>说明汉武帝此时已痴心于效法黄帝以成功封禅不能自拔。据此，笔者认为“泰山见黄金”一事发生在太初三年修封泰山之时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时能趁热打铁，极大地满足武帝内心的渴望，同时将黄金和黄帝故事及封禅紧密关联起来，一方面巧妙地证明了汉武帝已成功封禅，另一方面则投射出汉武帝成仙有望的虚影。

综上，“泰山见黄金”一事或应发生于太初三年，此时汉朝已完成封禅并基本完成应天改制的系列举措，而汉武帝此时也正深深陷入效法黄帝成仙的泥潭中。这件祥瑞的出现，从一定角度看，它一方面代表着汉已成功封禅，得到了天的认可，建立起万世之基，获得了道统和法统；另一方面则是对汉武帝渴望登仙有可能成功的投影。今日来，封禅蕴含着浓厚的迷信成分。但在那个时代，封禅本就如神道设教，充满着神秘性。顾颉刚指出“皇帝的神性越浓厚，他的地位就越优越，一般民众也就越容易服服帖帖地受皇帝的统治。”<sup>[76]</sup>还有学者指出，封禅的核心思想观念是“奉天承运”“天命”，是一个新生政权确立其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终极依据，代表着该政权的天命正统，即能增强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和自信，又能增强臣民对新政权的信心和忠心。<sup>[77]</sup>所论是历史的真相。它可从时人对封禅之事的重视程度管窥一斑。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未能参与目睹封禅之事而发愤病卒，死前慨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sup>[78]</sup>充分说明封禅在时人的意识中意义极其重大，尤其是汉此次封禅非同一般，乃“接千岁之统”，代表了汉朝的政权合法性直接接续三代的法统，开万世之新基。

### 结语

汉武帝是西汉王朝第五位皇帝，即位时汉已立国六十余年。彼时汉一方面国力鼎盛，另一方面仍存多方面的威胁。政治上，尽管汉高祖曾立黑帝时，但汉文帝和汉景帝却未能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汉

在国家法统的建设上依然存在不足，故而汉国家上层建筑仍需完善。军事上，外部威胁依然较大，匈奴实力强劲，经常扰乱汉边疆，更能威胁汉廷的政治中心。所以，历史进入汉武帝时代，时代赋予了汉武帝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建立国家法统和解决国家威胁。太始二年更黄金诏书所涉祥瑞有麒麟、天马和黄金等三种，麒麟被认作是汉之符命，代表着汉获得天命；天马代表着汉武帝所建立的赫赫军功；黄金则代表着汉武帝封禅成功，亦即汉获得天的认可，获得道统和法统。所以，麒麟和黄金这两个祥瑞在一定意义上是代表了汉建立了国家的法统，天马则代表了汉武帝解决了匈奴的威胁。故综合来看，这三件祥瑞所代表的正是汉武帝解决了时代所赋予他必须解决的课题，而这或就是汉武帝为何会在他一生中的众多祥瑞里挑选出这三件祥瑞的主要原因。因此，太始二年更黄金诏书的意义之大也就由此可窥一斑。在汉人的意识中，“新王必改制”，即所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sup>[79]</sup>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政权建立自身法统的逻辑叙述。故而，祥瑞与改制，乃汉武帝时代之主题特色。

作者简介：张建文（1990-），男，汉族，江西余江人，硕士研究生，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解远文（1986-），男，汉族，河南商丘人，博士，商丘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历史文献。本文系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符应与改制视角下的麟趾金、裹蹠金研究》21WW22阶段成果。

###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06页。
- [2]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06页。
- [3]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06页。

- [4]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9页。
- [5]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40页。
- [6]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9页。
- [7]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9页。
- [8]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9页。
- [9]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9页。
- [10]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9页。
- [11]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74页。
- [12] 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68页。
- [13]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495—2497页。
- [14]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498页。
- [15]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498—2499页。
- [1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00页。
- [17]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05页。
- [18]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13页。
- [19]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13页。
- [20]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23页。
- [21]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25页。
- [22] 董仲舒撰，张祖伟点校：《春秋繁露·符瑞》，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页。
- [23] 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178页。
- [24]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84页。
- [25] 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60页。
- [26] 李正宇：《渥洼水天马史事综理》，《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7页。
- [27]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84—185页。
- [28] 赵培：《汉初德水与敦煌“天马”祥瑞》，《文史知识》2019年第3期，第51页。
- [29]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76页。
- [30] 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178页。
- [31] 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178页。
- [32] 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60页。
- [33] 班固：《汉书·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725页。
- [34] 田天：《西汉太一祭祀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第44页。
- [35]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85页。
- [36]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91页。
- [37]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14页。
- [38] 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38页。
- [39] 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40页。

- [40]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11页。
- [41]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79页。
- [42] 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第12页。
- [43] 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165页。笔者认为,千夫为汉武帝元狩六年新设立的十一级武功爵之第七级,结合元鼎四年和五年的马政政策看,可以推断此策具体施行当在元鼎初年,应早于“马生渥洼水中”一事。
- [44] 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172页。
- [45] 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173页。
- [46]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89页。
- [47] 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178页。
- [48] 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60-1061页。
- [49]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注引《史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55页。
- [50] 陈立撰,吴泽虞点校:《白虎通疏正·封禅篇》,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78页。
- [51]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55页。
- [52]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84页。
- [53]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55页。
- [54]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97页。
- [55]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6-1217页。
- [56]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86页。
- [57]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87-1388页。
- [58] 郭津嵩:《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第92页。
- [59]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93-1394页。
- [60]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71页。
- [61]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61页。
- [62]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33页。
- [63]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403页。
- [64]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98页。
- [65]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35页。
- [66]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91-192页。
- [67]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36页。
- [68]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37页。
- [69] 李都都:《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15页。
- [70]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64-170页。
- [71] 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37页。
- [72]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98页。
- [73] 太初三年“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见班固:

- 《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01页。
- [74] 天汉三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见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04页。
- [75]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400页。
- [76]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7页。
- [77] 何立平：《巡狩与封禅：封建政治的文化轨迹》，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5-6页。
- [7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295页。
- [79] 司马迁：《史记·贾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492页。

## ●学术动态●

### 商丘市首届应天书院与应天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召开

为打造更具特色、广受欢迎的应天书院文化名片，促进应天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6月3日上午，商丘市首届应天书院与应天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汉梁楼人文学院应天国学堂召开，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商丘市文旅局、商丘市社科联、商丘市文联、商丘市民协、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负责同志莅临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共商丘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吴金山、副校长郭文佳以及人文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博士教授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吴金山首先致欢迎辞，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道明、商丘市文广旅局局长史新艳同志讲话，然后大家合影留念。

开幕式结束后，张学勇与高建立院长共同主持了学术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从多个视角阐释了应天书院、应天文化以及书院文化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尽显学识的精深与广博；整个研讨会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互动环节中，商丘市文联主席刘瑞芳、市社科联二级调研员赵继彬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学术研讨结束后，商丘师范学院副校长郭文佳同志就会议进行总结，充分肯定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并与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就我校应天书院建设、书院文化研究以及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教育有机结合、推动现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最后，吴金山再次向与会领导和专家莅临本次学术研讨会表示真挚的感谢。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应天书院与应天文化学术研讨会圆满落下帷幕。

### 我院历史学专业纳入一本招生

近日，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我院历史学专业从2023年起纳入本科第一批次招生，计划招生数80人。这是历史学专业继2022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以来又一次重大突破，实现了商丘师范学院本科第一批次招生零的突破。

## ● 教学天地 ●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校秘书人才 培养中的应用

□ 焦泽智 张松林

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状提出了“两个结合”“三个务必”伟大思想，为秘书学人才培养规定了方向，高校秘书学专业应当把握新方向、新格局，培养出



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卓越秘书人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面临接踵而至的挑战”，秘书学毕业生该具备什么样的具体应对措施，这是人才培养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如何主动“求变”，如何合理“应变”，让秘书学人才培养具备新文科发展的时代性和融合化<sup>[1]</sup>。

## 一、强化“马哲引领”优化“秘书教育”

秘书职业以事务性强为特点，以多方工作为基础，同时需具备在重要决策中及时发声、合理发声的能力。具体到秘书工作，及时掌握并处理信息，合理把控并解决问题，是秘书实践的第一要务，也

是秘书的必要技能。对于高校而言，要想培育理论素养和办事能力兼具的卓越秘书人才，不应仅止步于具体的技能培训，要通过秘书人才培养逻辑的改变提高秘书人才的认识能力，拔高思维高度和工作深度。

秘书就业层面，用人单位对秘书的要求正逐步由事务性转变为决策性，原因在于：秘书职能的辅助性工作在减少而决策层面需求在增多，单一的“辅助性”功能已不能概括秘书工作的完整过程。网络化的办公模式也要求秘书以各种现代化办公技术为依托，基于已有信息进行收集、汇报并在一定程度上相机决策。这不仅要求秘书具有基础性工作的工作能力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求秘书具有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并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目前为止的高校秘书教育当中，对于秘书的培养模式仍以两个向度为基准：一个是理论向度，借助理论教学，以培养秘书思想、加深理论建设为前提，依托教学环境进行“理论型”秘书培养，这也是传统的秘书培养模式；另一个是技能向度，以具体职能事务为出发点，借助实践和虚拟实践，为

秘书技能培养创设一个宽松的空间,以“实干型”秘书人才为培养目标进行培养,相比于传统培养方法,这属于秘书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今,为顺应新时代的秘书标准新变革,高校应当为秘书培养加入一个新的向度:哲学向度。也即:在保证秘书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实干能力的前提下,提高秘书思考的纵深性和全面性。

## 二、变“何为正确”为“为何正确”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文秘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秘书职业的特性使然,也是时代对秘书提出的新的挑战。

<sup>[2]</sup> 依托新媒体兴起的信息化浪潮让基于网络空间建立的信息传播、交流更加快速,但同时,在信息交换讲求即时性的前提下,秘书作为“镜头前的人”,反应空间被大大压缩。面对需要快速反应的具体、棘手的问题,由于问题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干扰秘书判断,秘书难以在所学理论中第一时间找出合理解法。

基于此,回退到高校秘书教学上,不难发现,对于秘书的培养,传统的理论教育所培养的秘书人才思维趋向单一化:面对变化的问题习惯于用唯一的方法去解决,这在面对多样化的工作环境中,难见成效。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对秘书要求的不断增多,秘书工作人员需要的不再是传统简单的知识授受,而应当是对应变能力的实际培养。所谓将哲学融入秘书教育和秘书实践,也正是基于哲学中重视实践的学科传统。正如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3]</sup> 虽然这句话来源于马克思对神秘主义的批判,但对于秘书所不了解的那些事情,也同样可以引用相关的思想:我无法判断这件事情是否正确,但我又必须解决它,那么我就需要判断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否正确,并且找出能够解决事情本质的方法,用实践去解决问题。

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sup>[4]</sup> 具

体到培养环节,应当适时加入哲学思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来应对不同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在秘书的理论教学、具体实践或者是虚拟实践当中,相比于过程的严丝合缝,对结果的要求要更深一层;要结果的正确,而非硬搬所学的部分事例。培养秘书人才的自我思考能力和认知判断能力,才能强化秘书人才对应急事务的处理能力,也才能保证在未来遇到更加复杂、更加急迫的事情时,做到最及时、最合理、最正确的应对方法。

## 三、变“被动处理”为“主动处理”

如果把领导的要求定义为“需求线”,那么秘书的工作就是不断靠近需求的“追逐线”。<sup>[5]</sup> 追逐并非被动跟随,而是提升大局观、秉持主动态度。通常情况下,在大体工作相同或相似的同一个环境中会存在一种假象:可能一个部门十年来的运作模式没有大的变动,秘书实际职能也同样随着大环境的安定而没有变化,因此秘书就会陷入一种“职业习惯”思维,对部门的事务开始常规化处理,失去了对事务主动的思考能力。从结果上看,这属于职业倦怠;从过程上看,归因于被动处理。

追根溯源,目前高校在秘书实际教学过程中,强调秘书工作的“被动性”,而忽视了秘书工作中存在的“主动因素”。从教学过程上看,以技能教育为核心的秘书教育存在一个固有的弊端:把秘书工作固化为某些具体的方面,而不是站在宏观的社会化、科学化视野进行问题审视。对于秘书培养的具体过程当中,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宏观的培养模式代替单纯的技能培养模式,是解决秘书工作积极性的长效之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传统的技能培养导致学生对于秘书的认识属于对一个职业的直观认识,而没有将这一职业认识为一种全面的实践活动,而这种直观认识的结果就是:我们只能达到对单个人或者单个机构、单个环境的直观,而忽视了整个行业的必要要素和职业要求。<sup>[6]</sup>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现实:每一个学校的不同的秘书学学生都认为自己所学的、



所见的是真正的秘书要做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都了解真正的秘书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方面，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秘书教育，旨在强调学习马克思以实践为基准的哲学思想，通过对这种思想的教育、传播，提高秘书学学生对于实践的主体性追求和对秘书职业的正确认识。对于秘书工作而言，提高实践尤其是主动实践在秘书工作当中的分量，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动求真、求实的思想是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工作问题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sup>[7]</sup>，但这个“正”应当主动去“守”，而非被动去“守”，应当有作为，守正的同时兼顾创新，因为“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秘书作为工作主体，以守正为目的的工作固然无可厚非，但只有在明辨是非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才能够真正做好秘书的实际工作。

#### 四、变“统筹实践”为“细化实践”

在具体权力上，秘书的权力并非体现在职务本身，而是体现在秘书处在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的“关节”上，由此衍生出的权力。<sup>[8]</sup>秘书的权力性质的具体性决定着秘书事务的具体性，在实践层面，要求秘书不仅要精通工作中共性的内容，也要熟悉不同工作之间“个性化”的工作方面。

在秘书学培养逻辑中，以培养理论扎实、能力全面的综合性人才为主要标准，在具体实践上，以秘书工作的总体性培训为主要方面，也即在不同部门之中秘书工作所具备的共性。这样的实践情境创设，以培养秘书基本能力为目的，但结果就是以对不同地区、岗位等秘书工作具体化实践能力的牺牲，换来秘书工作共性部分的熟练。因此，在秘书培养上，不仅要以能力为要求，而且要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基准，培养秘书学学生的学科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他们的“哲学思维”。要想摆脱专注于课题的思辨本身，我们就应用实践去解决它。<sup>[9]</sup>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上坚定地站在“哲学的任务应当是改变世界”<sup>[10]</sup>这一立场上，认为人应当以“改

变世界”为自己的追求，重视现实性的每一个问题，并且用现实性的理论和实践去解决它。这样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显然是秘书工作人员所需要学习的，也是作为一名秘书本身所需要的基本思想。高校作为秘书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担负着专业性、综合性较强的秘书人才的培养责任，所重视的是秘书人员的实际效能，诸如走上工作岗位后与工作岗位的适应与匹配程度、在工作单位中对新生事物的了解和掌握能力、对于不同情况的应急应对和细节处理等等。秘书工作的事务性体现在细节上，要求秘书本人既有“改变世界”的哲学追求，又有“脚踏实地”的具体实践，在这个层次上，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的秘书教育，对于具体秘书工作的加强而言，很有必要。

同时，在秘书实践环境创设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秘书理论相结合，把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同秘书实践相结合，在实践层次上将秘书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现实性为基准，一切从现实出发，在具体的实训模式和训练环境中，尽可能还原到具体工作人员的一日场景，不论是计划还是细节，都应当做到和秘书工作的现实性相一致。然而，建构场景终究带有虚拟特征<sup>[11]</sup>，在具体培养中，通过有条件的实习和对秘书工作的参观体验，也同样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情景建构方法，以学生在真实环境下进行实践为前提，提高学生对秘书工作的认知水平。

#### 结语

针对秘书人员或者有志于从事秘书这一行业的人员而开设的秘书教育，创设初衷在于培养秘书适应时代、适应工作的能力。在当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加入到秘书人才的培养当中，不仅符合当下红色教育的思想主流，而且强化了秘书人才在相关行业的工作能力、应变能力和决策能力。在目前技术日新月异、时代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基本内核，锻造出属于秘书的“秘书哲学”，才是强化秘书实践能力、永

葆秘书素养的明智之举。

作者简介：焦泽智，河南洛阳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秘书学专业2021届毕业生，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张松林，河南开封人，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樊丽明. “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0, (05): 4-8.
- [2] 张东. 经济转型期高职文科专业可持续发展教改策略——以文秘专业为例 [J]. 秘书之友, 2018, (10): 4-7.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1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7

- [5] 李欣. 关于秘书工作的自身结构和秘书部门的办事效率 [J]. 秘书之友, 1988 (03): 4-8.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2
- [7]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N]. 人民日报, 2019-09-04 (001)
- [8] 李松, 秘书腐败, 失控的隐形权力 [J]. 瞭望, 2009: 2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2
- [11] 石恪, 伍国桃. 高校秘书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评《秘书学专业“知识+能力+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 (04): 131.

## ●学术动态●

### 人文学院获批2项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公布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专项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我校共有6项课题获批立项，人文学院张松林老师申报的《基于“目标·过程·互动·认同”的中学语文教师培育模式研究》、孙佳老师申报的《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情境化命题研究》成功获批。两项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立项，彰显了人文学院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和科研活力，有助于带动更多的教师积极投身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也为我校申硕工作提供了强力的学术和办学特色支撑。

###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周书灿教授应邀到人文学院讲学

2023年6月8日上午9点，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周书灿教授应邀在汉梁楼国学堂做了题为“‘以文证史’的考据困境与《穆天子传》研究范式转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主持，历史学系主任薛立芳、副主任于志刚、历史系教师魏清彩、杨金华及历史学专业20级、22级百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 ● 学子文苑 ●

## 从“宝历年样”看中晚唐藩镇割据

□ 薛雯丰 指导教师：舒笛

## 引言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对于探讨中晚唐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比如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就根据藩镇本身情况的不同将藩镇分



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并从进奏院的设立、宦官监军、藩镇相互制约诸方面分析唐政府后期对藩镇的控制。李治安的《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认为自安史之乱后，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转变为外重内轻。藩镇问题是中晚唐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历来是研究的热点，以往的研究都将藩镇割据视为唐衰落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学者在诸多研究实证的基础之上，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唐帝国已经相当成功地应对了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特别是穆宗以后，朝廷与藩镇之间建立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政治运作模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sup>[1]</sup> 以往的研究大体上仍将中晚唐放在一个日渐衰落的背景下研究，藩镇尾大不掉

之势也反映着唐后期对地方无法有效行使权力的困境。

传统政治史主要关注权力，但是需要分梳的是“朝廷”与“皇权”是否能完全等量齐观。就中晚唐而言，唐王朝的衰落是众所公认的，但中央衰落、藩镇崛起是否等同于“皇权”的衰落？对于“皇权”可进一步分为“权力”与“权威”不同的层面。传统制度史研究，无论是对具体职官起源、功能、作用的静态解剖，还是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的复原，所关注者多集中在“权力”这一维度，即分析权力的制度化及如何有效运作。因此，既往对唐廷与藩镇关系的论述，大体上仍基于对双方实力消长的分析，而对政治权威在其中的作用涉及很少。通过“宝历年样”这一缩影可以揭示唐后期中央与藩镇微妙的关系，即由对抗走向共生，“惯例”取代了制度形成了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对中晚唐历史走向影响深远。

## 一、“宝历年样”内涵

所谓“宝历年样”是指，宝历元年十二月（825）刘从谏通过示好中央从而充任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后，其侄刘稹欲效仿宝历年间刘从谏承袭“故事”，因而将其称为“宝历年样”。《新唐书·刘从谏传》

载：“时李逢吉、王守澄纳其赂，数为请，敬宗乃以晋王为节度大使，诏从谏主留事，起将作监主簿，检校左散骑常侍。晋王帝所爱，从谏馈献相望，采几，拜节度使。”<sup>[2]</sup>刘从谏刻意隐瞒其父刘悟之死，秘不发丧，上表留后并通过贿赂当时的宰相李逢吉、宦官王守澄使敬宗同意他接任节度使一职。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是刘从谏之侄刘稹欲领昭义节度使时所采取的策略几乎与刘从谏无异。朝廷与藩镇似乎形成了某种“惯例”，它逐渐取代了制度，发挥着隐而不彰的作用。《资治通鉴》载：

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王协为稹谋曰：“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使押牙姜盎奏求国医，上遣中使解朝政以医问疾。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谕指云：“恐从谏疾术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廖，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sup>[3]</sup>

刘稹欲接任节度使一职，听从谋士王协建议，效仿“宝历年样”即“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这四条建议便是“宝历年样”的内涵所在，其中包含着中央与地方错综复杂的关联。

### （一）严奉监军

隋末唐初，以御史为监军。玄宗时，宦官开始出任监军。“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sup>[4]</sup>天宝六载（747），高仙芝攻小勃律，宦官边令诚为监军。<sup>[5]</sup>大概在天宝末年，宦官出任监军已渐普遍。安史之乱前后监军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以前的监军，主要“莅戎于征讨”<sup>[6]</sup>，即出征打仗时，由朝廷派中使随军监察。安史之乱以后，内地方镇林立，监军也普遍设置。凡兵将出战朝廷临时必派监军使、都监或都都监“贞其师律”<sup>[7]</sup>，而且在各个方镇遍置常驻监军机关，“护兵于镇守”<sup>[8]</sup>。宦官监军作为皇帝的耳目监视藩镇。为顺利接任节度使一职，得到皇帝和中央的认可，刘稹必定要“严奉监军”。

### （二）厚遗敕使

“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高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过，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sup>[9]</sup>“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sup>[10]</sup>宦官除任监军监视藩镇外还肩负替中央打探藩镇内部动向，以辅助朝廷决策的任务，若发现藩帅无力掌控部下，便推迟赐予旌节，同时在藩镇内部物色对朝廷更为恭敬之人成为新的藩帅或者由众人再次推选出新藩帅。毫无疑问的是，新的藩帅必须要对朝廷更加恭顺，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对于朝廷的意图，藩帅自然心领神会。“自至德已来，方镇除授，必遣中使领旌节，就第宜赐，皆厚以金帛遗之。求媚者唯恐其数不广，故王人一来，有获钱数百万者。”<sup>[11]</sup>对于藩镇贿赂宦官，皇帝心里则十分清楚。《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合中，每赐一物，宜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赐李希烈旌节；希烈赠之仆、马及嫌七百匹，黄茗二百斤。茗上闻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归者，皆潜弃所得于山谷，虽与之，莫敢受。<sup>[12]</sup>

对于贿赂行为，皇帝是暗许的，甚至以贿赂钱财的数目来判断藩帅是否足够恭顺，这再次反映了在“皇权”与“朝廷”不可等量齐观，在中晚唐应对中央权力衰落的各项举措反而刺激了皇帝个人权力的强化，中央的权力衰落反而皇帝的权威加强了。

### （三）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

刘稹之乱中，手下大将薛茂卿骁勇善战，“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七十一，距怀州才十余里”<sup>[13]</sup>，但是“茂卿以无刘稹之命，故不敢入”<sup>[14]</sup>。怀州靠近东都洛阳。刘稹部下认为，薛茂卿“太深入，多杀官军，激怒朝廷，此节所以来益迟也”<sup>[15]</sup>。可见刘稹并不想与唐廷真的撕破脸皮，只是想对朝廷

施压，获得名分。杨弁在太原起事后，曾试图与刘稹联合，亦遭昭义军中反对：“我求承袭，彼叛卒，若与之，是与反者。”<sup>[16]</sup>刘稹乃“械其使送京师，使康良佺屯鼓腰岭，败太原兵，生擒卒七百”<sup>[17]</sup>。刘稹主动进攻河东叛军，示好朝廷，反映出其不敢挑战朝廷的权威。李德裕认为刘稹“居丧求袭，阻命专权，数遣乱军，侵轶邻境。比者河阳、晋绛，未有重兵，侵犯颜行，屡焚庐舍。又疆场之吏，收得彼管簿书，皆呼官军为贼，来即痛杀，可谓悖言肆口，逆节滔天”<sup>[18]</sup>，尤其是“侵轶邻境”超越了昭义镇的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了与唐廷的“政治默契”，所以迟迟不授以旌节。刘稹之乱三十年后，刘广叛乱，控制昭义，希望朝廷赐予节钺，但朝廷采取了拖延战略，刘广军中躁动不安，有人献计挑起与河阳的战争：“泽本属郡，可厚赂以招孟人，出兵掠其壁，据天井、劫河阴，以惊周郑之郊，此乃疾雷不及掩耳，则节旄可翘足而待也。”<sup>[19]</sup>即计划南下天井关，进逼洛阳，借助军事行动施加压力，迫使唐廷接受现实。天井关位于泽州以南的太行山顶，是山西进出河南平原的要冲，同时也是昭义南部的门户，“寇堞星联，建筑之势，万夫莫仰”<sup>[20]</sup>，天井关一旦失守，则洛阳必不可守。虽然军事上具有可行性，但是它违背了与唐廷的政治默契，刘广的“叛乱”就真正成为了叛乱。李裔给了刘广建议：“敛潞人财以饵他人，则师必兴怨，诘可俾其出疆以图胜捷，且留后宜恭顺以俟朝旨，安可动众以望恩荣。”<sup>[21]</sup>李裔认为，只有对朝廷表现出更恭顺才能获得朝廷的认可。综上种种事例，侧面反映出“四境勿出兵”的实质是不能破坏与唐廷的政治默契，这也说明唐廷在中晚唐的正统性是在上升而非下降的事实。“城中暗为备”则是藩镇为了得到朝廷认可所采取的最后措施，一旦朝廷不愿授予旌节便通过军事威胁迫使朝廷承认其合法存在。

刘稹希望通过这四条建议达到“潞府请以亲王遥领，令稹权知兵马事”<sup>[22]</sup>的目的，其中的“亲王遥领”耐人寻味。最早的“亲王遥领”记载如下：

朝廷不获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

同平章事王縉為幽州節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搜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后。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sup>[23]</sup>

代宗大曆三年，河朔藩鎮內亂，朱希彩殺李懷仙自立，這是安史之亂後河朔藩帥的第一次更迭。這一事件迅速吸引了朝廷的注意，同時也引來了藩鎮內部的憤怒。“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率眾討之。”<sup>[24]</sup>當時朝廷雖無力討伐，但也並未承認這一現實，而是授予王縉節鉞，朱希彩僅為御史中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最初朝廷希望通過自己正常任命藩鎮長官的方式來恢復對河朔地區的控制，命王縉攫取地方大權，但是遭到了朱希彩的抵制，最終勞而無功。這一偶然性的事件成為了“故事”的開頭，類似的“遙領”不斷在朝廷和藩鎮之間上演，成為了公開的“默契”或者“慣例”：“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節度也。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sup>[25]</sup>這一“默契”在中晚唐都得到了奉行，甚至中和三年樂彥禎取代韓簡為魏博節帥時，儘管僖宗尚流亡在成都，但仍“暫領雄藩，宜遵故事”<sup>[26]</sup>，下詔命建王震遙領。通過親王遙領制度，既照顧到了藩鎮的利益，又成功維持了朝廷的體面，使得中央與地方的政治緊張得以緩解。

“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所揭示的是中晚唐藩鎮與中央博弈的一套行為模式。在這套模式裡面，宦官作為皇帝和中央的代表，探聽藩鎮內部動向，為朝廷決策提供情報依據，一旦發現藩帥行為跋扈，無力掌控部下便推遲旌節的授予，迫使藩帥發生迭變，趁機扶持更恭順的藩帥，而藩帥為獲取旌節，自然要對宦官禮遇有加，以巨額財物相賄賂，借此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恭順，若朝廷無意授予旌節，則暗中備兵，通過軍事手段威脅朝廷以賜予名分。在這種行為模式中體現了朝廷與藩鎮互動的政治默契，朝廷所求的是藩鎮

对中央、对皇权的恭顺，而藩镇所求的是朝廷赐予的“旌节”，即合法性与正统性。虽然时常会有一些跋扈的藩镇叛乱，但总的来看，双方还是心照不宣的践行这一套“宝历年样”的程序。

## 二、政治默契形成的原因

藩镇割据是中晚唐特征之一。安史之乱之后，藩镇遍布内地，藩镇的设置既有时势推动，也有偶然因素作用其中，即使是最为跋扈的河朔藩镇也不例外。在唐前期，除羁縻府州外，朝廷对地方拥有实实在在的控制力。经历安史之乱后，藩镇遍布内地，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短时间内难以重塑中央权威。因此，藩镇割据的局面并不是一幅静态对立的画面，而是一个逐步形成的动态过程，并且随着中央与地方实力的变化而此消彼长。无论是对于朝廷来说，还是对于藩镇而言，这样的局面都是全新的。朝廷想要从藩镇手中收回实权，重塑中央的政治权威，而藩镇则想要保护自己的种种利益，所以二者不得不用政治军事的力量相互逼迫，期以达到目的。

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初，不仅朝廷和藩镇的关系不稳定，而且各藩镇之间关系也不稳定。“时河朔节度刘济、王士真、张茂昭皆以兵壮气豪，相持短长，屡以表闻，迭请加罪。”<sup>[27]</sup>甚至发生了田承嗣吞并相卫这样的事情。可见，此时的政治默契尚未形成。元和中兴成功的一大原因在于田弘正的主动归附，它短暂地改变了藩镇和中央的力量对比，使双方达到了相对平衡状态，但无论是唐宪宗还是田弘正都无法改变当时的政治生态，这也就决定了元和中兴不会是长久的。宪宗死后，藩镇旋即复叛，朝廷对于地方的重新控制沦为昙花一现，在长期的战争中双方都认识到力量的边界和行为逻辑。

与唐前期相比，中晚唐政治的运作更加依赖于惯例与默契，而这种惯例与默契的形成，并不是制度的产物，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代宗、德宗、宪宗诸朝，中央和地方不停地战与和，逐步达成的妥协。<sup>[28]</sup>因此“遥领亲王”这样的“故事”才会不断上演，“宝历年样”成为了藩镇与中央心照不

宣的“惯例”。

## 三、政治默契的功能

因为政治默契是经过长时间朝廷与藩镇的军事斗争从而达到双方实力相对平衡而形成的，所以其功能必须要从朝廷和藩镇两方面来阐释。

### （一）朝廷方面

对于朝廷来说，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不仅保全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权威性。在对待藩镇问题上，李德裕认为“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sup>[29]</sup>，牛僧儒认为“假以旌节，不足以逆顺治之”<sup>[30]</sup>。虽然二人党派对立，但都注意到朝廷官爵对于藩镇的重要性。在中晚唐的史料中，藩镇对于朝廷名号爵位的渴求并不少见。《旧唐书》载：

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必惭。今中使往彼，其势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僭奔还，奏曰：“杨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宝义、兼他使焦奉鸾尹士恭，并为志诚禁留矣。”志诚遣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复赐官告批答，文颖不受而归。朝廷纳裴度言，务以含垢，下诏谕之，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sup>[31]</sup>

杨志诚以跋扈闻名，据说曾“造袞龙衣二副及被服鞍鞯，皆绣饰鸾凤日月之形，或为玉字”<sup>[32]</sup>。然而，如此骄横的藩帅仍需以朝廷检校官衔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会昌伐叛之后，皇帝欲赐李德裕检校太尉衔。但李德裕认为：“伏见国初已来，授此官惟有七人，尚父子仪，犹以恳辞而免。近者智兴、载义，皆超拜太傅太保。只缘朝廷重惜此官，裴度守司徒十年。竟不迁授，以臣僭越，必致颠挤。”<sup>[33]</sup>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何弘敬死前“不为生太尉也必矣”<sup>[34]</sup>的遗憾。即使在唐廷威望已荡然无存的昭宗晚期，刘仁恭所谓“旌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sup>[35]</sup>之语，可见唐廷的正式承认是藩镇统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

中晚唐藩镇渴求爵位官衔的实质是为了获得朝廷赐予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朝廷借此巩固强化自己的权威。前人就已注意到在晚唐，既往跋扈的藩镇转而对朝廷十分恭顺，“自张仲武、王元逵、何敬弘归命以来，皆有效顺之成劳，无抗衡之异志”<sup>[36]</sup>，甚至在黄巢乱后犹存遗意，“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sup>[37]</sup>，这一变化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节帅个人的政治取向，而是折射出唐廷政治权威发挥的作用。

## （二）藩镇方面

对于藩镇来说，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可以宣示自己的正统性，使自己的半独立统治合法化。杨志诚以“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为借口改换官职，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普通军士闻之并理解其象征意义，而“盛饰以待新恩”，则暗示每一次中使到来，宣敕新加检校官的场合，都会成为藩帅借机宣示其政治权威的舞台。即使是与朝廷只有羁縻关系的敦煌归义军，朝廷所授予的检校官衔也是藩帅渴望的对象，如张淮深求取朝廷节钺、检校官不成，则在归义军内部自称御史大夫、户部尚书、河西节度使等官衔，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sup>[38]</sup>刘仁恭所谓的“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也是在“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即假借朝廷名号巩固自己的半独立统治。

李德裕的“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挑明了唐廷与藩镇的“尴尬”关系，唐廷虽无法有效行使对藩镇的权力，但是其正统性和权威性还仍然存在，藩镇虽然“兵力虽强”但若是没有朝廷的“官爵威命”便无法使自己的半独立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双方各取所需，久而久之形成了“默契”。面对跋扈的河朔藩镇，朝廷不得不承认其父子承袭，这固然是个巨大的妥协，但藩帅愿意接受朝廷的官爵名号则表示起码在表面上朝廷权威仍在发挥余热，他们愿意逗留在大唐的政治框架之内，仍认可皇帝天下共主的地位。这种“默契”的关系使得双方各取所需、共同受益，由

对抗走向了共生。

## 结语

自安史之乱之后，藩镇遍设内地，在与朝廷长时间的明争暗斗中，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逐渐认识到力量的边界和行为逻辑，形成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的“宝历年祥故事”。其中所展现的“政治默契”则揭示了中晚唐藩镇与朝廷关系的新变化。唐王朝中央权力的瓦解包括了不再具备进行实际统治的能力与政治权威的消失两个层面，唐廷对地方的控制公认在黄巢之乱后便无力维系，但政治权威仍延续了一段时间。朝廷通过对藩镇的“妥协”保全了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而藩镇则通过朝廷的“官爵威命”为自己半独立统治冠以合法的名义。随着“制度”逐渐被“惯例”或者“故事”取代，一方面，朝廷默许了藩镇半独立的地位，以官爵名号羁縻之，从而构成一种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这促使朝廷与藩镇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共生，对中晚唐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薛雯丰，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学专业2023届毕业生。

指导教师简介：舒笛，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学哲学博士。

## 参考文献：

- [1] 仇鹿鸣.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945.
- [2] 欧阳修.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014.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675.
- [4] 杜佑. 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804-805.
- [5] 欧阳修. 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576.
- [6] 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 [M]. 北京：中

- 华书局,2012:7978.
- [7] 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7979.
- [8] 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7979.
- [9]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682.
- [10] 刘昫.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黄裳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3974.
- [11] 刘昫. 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6803.
- [12]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9780.
- [13]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734.
- [14]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734.
- [15]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740.
- [16] 欧阳修. 新唐书·卷二一四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017.
- [17] 欧阳修. 新唐书·卷二一四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017.
- [18] 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 [M]. 北京:中华书局,2018:152.
- [19]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 长安新出墓志·李裔墓志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316.
- [20]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799-1801.
- [21]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 长安新出墓志·李裔墓志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316.
- [22] 刘昫. 旧唐书·卷十八·武宗纪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595.
- [23] 刘昫. 旧唐书·卷一四三·朱希彩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389.
- [24] 刘昫. 旧唐书·卷一四三·朱希彩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390.
- [25] 欧阳修.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310.
- [26]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卷三六·建王震魏博节度制 [M]. 北京:中华书局,2008:159.
- [27] 刘昫. 旧唐书·卷一一一·房式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3325.
- [28] 仇鹿鸣.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99.
- [29]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767.
- [30] 刘昫. 旧唐书·卷一七二·房式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4471.
- [31] 刘昫. 旧唐书·卷一八〇·杨志诚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4675.
- [32] 刘昫. 旧唐书·卷一八〇·杨志诚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4676.
- [33] 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 [M]. 北京:中华书局,2018:354.
- [34]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059.
- [35] 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守光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2099.
- [36]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二七 [M]. 北京:中华书局,2021:7933.
- [37] 尹源. 唐说·宋文鉴·卷一〇五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85.
- [38]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0-62,78-88.



# 外来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

□ 务姗姗 指导教师：于志刚



由于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繁荣的社会经济以及交通便利的丝绸之路等原因，大量的香料传入中国。唐朝外来香料种类繁多，主要有胡椒、沉香、苏合香、樟脑香、安息香、紫藤香、阿末香、青木香、乳香等。外来香料的来源多样，但主要靠朝贡体系和香料贸易传入唐朝。外来香料在衣食住行等很多方面用途甚广，特别是焚烧和佩戴、建筑、饮食、医药、宗教这几个方面，外来香料为唐朝人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减轻了疾病的痛苦，丰富了唐朝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唐朝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来香料常被视作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它带给人们感官中的记忆也成为了唐人追思往事的媒介。外来香料作为一种舶来品对唐朝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外文化的交汇和融合的体现。

唐代的香料问题研究已取得许多显著成果，但

外来香料作为香料的特殊分类往往被忽略和夹杂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缺少对于外来香料这一单类的整体研究，及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于唐人生活与精神文化影响的研究。本文尝试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整合外来香料的相关史料，探寻外来香料在唐朝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唐人对待香料的不同看法。

## 一、外来香料的品种和来源

关于本文的主题唐代“外来香料”的概念并没有书面定论的解释，本文提及的唐代“外来香料”是指：非中原王朝所产，经各种方式输入的外来香料，即唐代某某地区所产之香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

唐代的外来香料众多，其中主要有紫藤香、胡椒、沉香、樟脑香、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爪哇香、鸡舌香等。概括而言，可以分为藤本类和木本类两种。下面主要择选几种典型的外来香料进行叙述。

### （一）藤本类

藤本类最主要的香料是紫藤香和胡椒。紫藤香是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黄檀藤心材。<sup>[1]</sup> 药物学家李珣曾记载：“其香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美。”<sup>[2]</sup>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降真香。据《说文解字》记载，“真”字有仙人变形而登天的意思。<sup>[3]</sup> 这个名字表现出这种特殊香料和宗教有

很深的渊源，特别是道教。

胡椒，“因其辛辣似椒，故得椒名。”<sup>[4]</sup>在唐朝，它也是一种名贵的外来香料，胡椒的产地说法多样，有西域说、波斯说以及印度说等等，薛爱华认为，其主要产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然后由印度传入了波斯，最后由波斯商人贩卖来到中世纪的亚洲等地。<sup>[5]</sup>因其功能性的多样让它在历史的流传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受人欢迎，甚至在欧洲价比黄金。它不仅是可使用的香料，还可以用于食物调味和治疗疾病。《大唐西域记》记载：“阿吒厘国周六千余里……出胡椒树，树叶若蜀椒也。”<sup>[6]</sup>《酉阳杂俎》中记载：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味履支。其妙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sup>[7]</sup>

其中“摩伽陀”即古代中印度地区的一个王国名字。这条史料此是唐五代史料中对胡椒植物特征的最详细记载。由此也可见唐人认为胡椒产自古印度（即今南亚地区）。

## （二）木本类

相对于藤本类，木本类的外来香料种类更多，主要有沉香、樟脑香、苏合香、爪哇香、安息香、乳香、鸡舌香等。

沉香是指沉香树砍伐后木心坚黑，沉入水中的部分，这部分的比重超过了水的比重，放入水中会沉下去，因此得名沉香。唐人杜佑在《通典·边防志》中称其出自林邑：

沈木香，土人破断之，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故名曰沈香。次不沈者曰栈香也。<sup>[8]</sup>

樟脑香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右旋樟脑，主要来自中国本土和日本，另一种是左旋樟脑，来自东南亚和中亚地区。<sup>[9]</sup>当时唐代最需要的是类似于其的婆罗洲樟脑，也就是左旋樟脑。这种樟脑是龙脑香的主要原料，唐人认为这种名贵的外来香料

并不是寻常人物可以享受的，人们往往将它与龙这种奇幻生物联系在一起，彰显它的珍奇，以博得尊贵之人的青睐。本文论述的主要是左旋樟脑，它还有一个音译而来的名字叫做“婆律膏”。《酉阳杂俎》记载：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sup>[10]</sup>

苏和香是一种流传很久的外来香料，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班固在《与弟超书》中写到：“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与市月氏马、苏合香。”<sup>[11]</sup>关于它的产地史籍记载混乱，有诸多争论，本文引用《唐代外来香药研究》的观点，即苏合香来自今叙利亚，但是经过了大秦、波斯的贸易才来到中国，所以常被误以为是上述两地的物产。<sup>[12]</sup>

安息香和爪哇香主要产自中亚和东南亚。唐代之前安息香并不单指一种香料而是合成物质，而是添加了乳香的芳香树脂或返魂树树脂；中唐前期则表示返魂树的树脂，经历南海运输到中国，又在东南亚出现了替代品“爪哇香”，它在这之后成为返魂树脂的代称。<sup>[13]</sup>由于资料佚失，唐代对于安息香的记载都是模棱两可的，两种香料的分别并不明显。由于返魂树的名称，人们对它的出产充满了想象和向往，《太平广记》记载：

此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之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粒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sup>[14]</sup>

《太平广记》中对于返魂树的记载存在于“神仙”卷中，真实性存疑，记载的内容也把返魂树脂描绘成了一种灵丹妙药，甚至还有复生返灵的作用，但从这样的描写中，也可见出唐人对外来香料的向往追求，这种情感需求为外来香料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乳香又叫薰陆香，是一种香树的树脂，主要出产于红海沿岸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阿拉伯半岛南部等地。<sup>[15]</sup>《广志》中曾记载：其是南海波斯国的一种松树树脂，颜色紫赤如同樱桃，名叫乳香，也就是薰陆香。<sup>[16]</sup>乳香的出产地存疑或者有多个。

《南方异物志》中认为它来自大秦，生于海边沙中，树大如古松。<sup>[17]</sup>薰陆香也常被认为是来自于波斯：“波斯国，都达易水之西苏藩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土多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sup>[18]</sup>

鸡舌香又称丁香，丁香是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舌则是对它未完全绽开的花蕾的外形描述。它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它的除臭性让其在汉朝就广泛用于宫廷之中，朝臣们在朝会的时候，必须在口中含有鸡舌香。<sup>[19]</sup>《通典》中记载：

（杜薄国）出鸡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服。鸡舌其为木也，气辛而性厉，禽兽不能至，故未有识其树者。华熟自零，随水而出，方得之。<sup>[20]</sup>

外来香料主要产自南亚，东南亚等国，因路途遥远而十分珍稀，唐人喜爱香料，加之权贵阶级对待稀有的外来香料的追捧，无疑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用香之风。

（三）外来香料的来源

外来香料流行于七世纪的唐朝上层阶级中，除了与当时追求奇珍异宝和舶来品的社会风气有关，也和唐朝宽容的民族政策、便利畅通的贸易之路有关。外来香料是非唐朝本土所产的香料。它的获取方式主要是朝贡和贸易。

表一：史料所载朝贡国家及香料种类（部分）

| 国家 | 时间     | 品类  | 文献出处              |
|----|--------|-----|-------------------|
| 天竺 | 贞观十五年  | 郁金香 | 《册府元龟》卷970/11399页 |
| 乌菘 | 贞观十六年  | 龙脑香 | 《册府元龟》卷970/11399页 |
| 陀洹 | 贞观二十一年 | 婆律膏 | 《册府元龟》卷970/11400页 |
| 安国 | 开元七年   | 郁金香 | 《册府元龟》卷999/11722页 |

|    |        |        |                   |
|----|--------|--------|-------------------|
| 大食 | 开元十二年  | 龙脑香    | 《册府元龟》卷971/11404页 |
| 林邑 | 开元二十二年 | 沉香     | 《册府元龟》卷975/11455页 |
| 林邑 | 天宝八年   | 黑沉香三十斤 | 《册府元龟》卷971/11409页 |

如上表所示，朝贡活动主要集中在贞观年间及开元年间，进贡的香料主要有郁金香、沉香、龙脑香等。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万邦来朝，朝贡颇多。安史之乱后，朝贡减少，上层贵族需求增多，于是香料贸易愈加繁盛。朝贡活动是上层贵族获取香料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香料贸易则满足了所有阶层的需求。消费需求的大量增加促进了唐代香料市场贸易的繁盛。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是香料贸易的重要地点。洛阳龙门石窟雕刻上关于供养人的记录有：“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达……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养，永昌元年三月八日起手。”<sup>[21]</sup>这位供养人的身份就是当时洛阳香行社的社官，安姓乃昭武九姓，这位香行社官同时也有胡人血统，想必也在唐代洛阳香料的往来贸易中做出了不少贡献。

广州作为海上贸易的港口，是香料贸易的重要中转点，许多外来香料就是运往此地然后再销往中原地区。曾在天宝年间经过广州的和尚鉴真曾言：“（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尺。”<sup>[22]</sup>韩愈也在《送郑尚书序》中说：“（广州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数。”<sup>[23]</sup>这两则史料描绘了外来船舶充满港口，香药货物不计其数的历史景象，足可见广州在香料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地香料贸易的盛况。

除了广州，扬州也是外来香药云集的港口城市。《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鉴真和尚于天宝二载在扬州采购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等近千斤香料。”<sup>[24]</sup>天宝七载，鉴真“又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

如天宝二载所备。”<sup>[25]</sup> 鉴真所购香料种类之多重量之大，侧面反映了扬州香料贸易的发达。

### 三、外来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

#### （一）焚香和佩戴

香料是中古时期一项极为重要的礼仪用品。古代的宫廷中，香炉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唐代的朝堂上，都有规定：凡是朝日，香案要放置在御座的前面，宰相要面对香案站立，群臣就在袅袅升起的香气中商议国事。<sup>[26]</sup> 《太平广记》中也曾记载：“唐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合为相者三两人姓名，捻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阙，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sup>[27]</sup>

佩香之俗自古以来都未断绝，到了唐朝更是盛行不衰。李端《春游乐》：“游童苏合带，倡女蒲葵扇。”<sup>[28]</sup> 庄南杰《阳春曲》：“紫金红囊香满风，金盃玉拭摇丁冬。”<sup>29</sup> 唐人在诗歌中对于外来香料的使用多有描绘，说明其唐代日常佩戴中的流行。王维《洛阳女儿行中》中曾写：“罗帷送上七香车。”<sup>[30]</sup> 《同比部杨员外十五夜游有怀静者季》中也写到：“强识小妇七香车，香车宝马共喧嚣。”<sup>[31]</sup>

不仅如此，《杜阳杂编》卷中还记载了同昌公主佩香囊出行的史实：

公主乘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风香，此香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sup>[32]</sup>

同昌公主是唐懿宗的爱女，出入乘七宝步辇，其中所配香囊都是他国进贡的香料，其中还掺杂龙脑香等名香，这是一种十分奢侈的行为，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外来香料的推崇和喜爱，连皇室公主都以此为贵。

#### （二）建筑

香料也常被用于建筑中，中古时期妃嫔居住涂有胡椒的建筑是不可多得的恩宠，被称为“椒房之宠”。“椒房”这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颜师古所写的《汉书》注中言：“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sup>[33]</sup>

使用胡椒和花椒涂抹墙，有保温，正阳的作用，又因其果实累累，取其繁衍多子的美好寓意。到了唐朝，随香料种类和数量的增加，香粉涂壁的建筑风尚更加流行于贵族中。《新唐书》中曾写，宗楚客建造新房，以柏木为梁，沉香混合红粉涂抹墙壁，一开门香风便迎面而来。连太平公主都感叹“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sup>[34]</sup>

贵族使用香材建造楼阁，象征性远远超过实用性，名贵的外来香料成为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甚至人们想象中的神仙之地也是如此。《太平广记》中曾写一个人对神仙之地的描述：“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sup>[35]</sup> 唐玄宗身为天子，权力的至高点，自然少不了享受名贵香料。《香品举要》曾云：“唐明皇君臣，多由沉、檀、麝为亭阁，何多也？”<sup>[36]</sup> 《太平广记》中曾记载：“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sup>37</sup> 唐玄宗在温泉池中，垒造沉香为山，汤泉水暖，水雾蒙蒙，以此来比拟东海瀛洲仙山的景象。

《新唐书·李白传》中写：“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sup>[38]</sup> 这正对应了李白曾在《清平调》中写过的两句诗：“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但相比宫中沉香亭，更为奢华靡费的是外戚杨国忠建造的“四香阁”，《开元天宝遗事》中曾云：

国忠又用沈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沈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sup>[39]</sup>

沉香木，檀香木价比千金，寻常富贵人家用做香粉已十分奢侈，杨国忠却用其建造楼阁，还使用麝香和乳香掺土和泥涂壁，连宫廷的沉香亭都不能相比，建造这样华丽楼阁的象征意义已远高于实用性，杨国忠权倾一时，建造这座豪华楼阁也是为了彰显自己尊贵地位。

### （三）饮食

随着外来文化的引进，使用外来香料的胡化饮食也流行在社会中。人们常常使用胡椒来调味肉类，以去除肉的腥膻之气。《酉阳杂俎》中曾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sup>[40]</sup>《新修本草》中也记载：“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sup>[41]</sup>可见胡椒用于食物佐料已成共识。

当时最受人们青睐的胡化饮食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胡饼”。胡饼并非一种食物，而是这类外来饼类食物的总称。唐朝长安城中的胡饼店更是随处可见。《唐语林》卷六记载了一种使用胡椒调味的夹肉烧饼：“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sup>[42]</sup>《山家清供》中还记载了唐代著名美食“黄金鸡”：

李白诗云“亭上十分绿醪酒，杯中一味黄金鸡。”其法：寻鸡净洗，用麻油盐水煮入葱、椒候熟擘开，以元汁别供，或荐以酒，则白酒初熟、黄鸡正肥之乐得矣。有如新法炒等制，非山家不屑为，恐非真味也。<sup>[43]</sup>

根据学者薛爱华的考证，鸡舌香也用于烹调中，在唐朝，有一种泡在鸡舌香汤中的精制肉片，这也是一种运用香料腌制肉类的做法。<sup>44</sup>如果说胡椒是在大众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用作饮食的外来香料，那（唐代宝历元年）大暑之日所作的“清风饭”，却只有宫廷内的贵人才可以享用了：

内出清风饭。制度：赐御厄令造进。法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牛酪浆，调事毕，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惟大暑方作。<sup>[45]</sup>

除了日常饮食，外来香料也常被应用于饮酒方面。《齐民要术》中曾记载：“酒一斗、胡椒六十枚、干姜一分、鸡舌香一分，革拨六枚，下筛，绢囊盛，内酒中。一宿，蜜一升和之。”<sup>[46]</sup>这种胡椒酒在唐朝也仍流行，连乡野民间店中也有酿造，太平广记中曾记载：“（李宗回）及到华阴县，县

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盏酒来，着椒葱。’”<sup>[47]</sup>可见这种胡椒酒有驱寒取暖的功效，为唐朝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御寒方法。

唐人嗜好香料并能良好的接受胡化饮食，不仅富贵人家可以招揽胡人厨师专司其职，一般百姓也可以去胡姬酒肆品尝异国风味，在饮食、用药方面，外来香料已悄然融入。

### （四）宗教

上文的焚香是一种日常礼节，而接下来所描述的焚香则多是宗教用香，将香料视为天人之间的联络。唐朝诗人曹唐有诗云：“红露想倾延命酒，素烟思爇降真香。”<sup>[48]</sup>将延命酒与降真香相对应，足以见得这种香料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白居易在《赠朱道士》中也写到：“尽日窗间更无事，唯烧一炷降真香。”<sup>[49]</sup>外来香料常常因为它的名贵和神秘被广泛用于宗教中。据《武宗内传》中记载：“上（武宗）好神仙术……复修降真台，春百宝屑以涂其地……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焚龙火香，荐无忧酒。此皆他国所献也。”<sup>[50]</sup>

李珣在《海药本草》中这样解释降真香：“仙传拌和诸香烧烟直上，感引鹤降。醮星辰，烧此香为第一，度策功力极验，降真之名由此。”<sup>[51]</sup>醮星辰是道教用语，意为醮祭星辰，是道教中极为重要的仪式。星辰在道教中的地位崇高，其实代表了整个道教所崇尚的对象，降真香作为此等仪式中的首要用香，足见在道教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除了降真香，道教还常用沉香和薰陆香作为香方中的配料焚烧。如《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所记载：

烧青木香及薰陆安息胶于寝处头首之间者，以开通五浊之臭，止地上魔邪之气直上冲天四十里。此香之烟也，破浊臭之气，开却邪秽之雾，故天人玉女、太一帝皇随香气中而来下，憩子之面目见焉。烧香夜半时，亦常存而为之，勿废忘也。<sup>[52]</sup>

还有《正一法文法篆部仪》中记载的九和之香：

九和香法，烧之香闻九里，感彻神明。沉木香一斤，青木香三两，甲香三两，薰陆香一斤，詹唐香三两，燮香一斤，青渐香一斤，雀头香一斤，大千枣二十枚。<sup>[53]</sup>

上述皆为道教典籍中记载的制香之法，在信奉宗教的人眼中，香料可以破除浊气，去除邪秽甚至可以通神降灵，招引仙人下凡。这些记载的香料配方多有名贵的外来香料，而且能够“冲天四十里”“烧之香闻九里”，虽稍显夸张，但香料品质绝对上乘。在宗教用香中，香料大量燃烧，产生烟尘，如同云雾般缭绕，像是进入仙境。如果是少量线香，则香气直上云霄，有通天地之感，香料对于宗教创设神秘的超自然场景是非常重要的。

#### （五）医药

中古时期，药品、香料、食物这几种物品并无明确分别，香料既可以焚烧、佐味，也可以医治疾病。唐代对于香料的医疗作用认识更进一步，很多外来香料都有一定的医用价值。据前人考察研究，唐初期的《唐本草》收录了龙脑香、安息香等；唐中期的《本草拾遗》收录了樟脑；唐末五代的《海药本草》记载了降真香。<sup>[54]</sup>

佛教医学认为，旃檀可以治疗热病。《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九：“譬如白栴檀以涂其身，除诸恼热得清凉乐。”檀香还可配合青木香治疗头痛，这些效用在唐朝就被我国医学家获知并且形成药方。<sup>[55]</sup>

因李白《留客中行》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两句诗，人们对于郁金香的印象主要停留在酿酒上的使用，殊不知它在医疗中其实更具功效。《本草拾遗》中记载：

“（郁金香）味苦，平，无毒。主一切臭，除心腹间恶气鬼疰，入诸香药用之。”

郁金香加入其他药物可以解毒，治疗头风，治疗泌尿疾病等等，是一味药方中的重要辅料。<sup>[56]</sup>

同样，胡椒在医疗方面也大有用处，胡椒味辛辣，性热，对于治疗因寒凉所致的疾病非常有效。《备

急千金要方》记载了胡椒治疗咳嗽的药方：

大蒜煎：治疝瘕积聚，冷癖痰饮，心腹胀满，上气咳嗽，刺风，风癫偏风，半身不随，腰疼膝冷，气息否塞百病方：蒜六斤四两，去皮，切，水四斗，煮取一斗，去滓，酥一升，纳蒜汁中，牛乳二升、荜拔、胡椒、干姜，各三两；石蜜、阿魏、戎盐，各二两；石上昌蒲、木香各一两，干蒲桃四两（等等略。）<sup>[57]</sup>

《千金翼方》中也记载了苏合香的药用价值：

（苏合香）味甘温，无毒。主避恶，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痲疹，去三虫，除邪，令人无梦魇，久服通神明，轻身长年。生中台川谷。<sup>[58]</sup>

《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还有“治痲疽始作，肿赤、掀热、长甚速方”的五香连翘汤剂，其中有青木香，熏陆香、沉香等外来香料。<sup>[59]</sup>

李珣《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许多外来香料的医药效用：

（沉香）主心腹疼，霍乱，中恶，邪鬼疰气，清人神；并宜酒煮服之。<sup>[60]</sup>

（安息香）心腹恶气，鬼疰；邪气魍魉，鬼胎血邪。<sup>[61]</sup>

（龙脑香）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明目，去目赤肤翳。<sup>[62]</sup>

（青木香）女人血气刺心，痛不可忍，末酒服之。<sup>[63]</sup>

（郁金香）血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sup>[64]</sup>

外来香料在唐朝药方中的使用不胜枚举，即使同一香料也有不同的医疗效用。香料作为药物使用在唐以前已有使用，迄至唐代，外来香料品种和数量的增多，使得外来香料在医疗中的应用趋于广泛。唐代以后的许多医书都是在唐人编撰的医书基础上进行增补修改，香料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唐代医学的发展，也使唐人治疗疾病得到更多的便利和方法。

#### 四、唐人对待香料的看法

香料作为一种稀有奢侈品，自然得到了唐人的

热爱和追求，香料的使用也更加普遍多样，但是过度追求名贵香料，则会助长奢靡之风，导致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

香料代表了皇帝对朝臣的宠信。唐代香料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使得御赐之物也更加丰富。唐玄宗曾经赏赐大臣张九龄裹衣香面脂，小通中散等香药。<sup>[65]</sup>到了唐代后期，皇帝会定期向臣子赏赐香料，以笼络下臣，表示宠信。如《为郭令公谢腊日赐香药表》中记载：“赐臣腊日香药金花银合子两枚，面脂一盒，裹香两袋，澡豆一袋者。”<sup>[66]</sup>如果能得到皇帝赏赐的香料，那将是莫大的荣幸，臣子还要特地上表示忠心和感谢。王维也曾在《重酬苑郎中》里写到“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sup>[67]</sup>香料实际上也是代表了一种物质奖励，赐香朝臣的行为也是一种御下手段。

香料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李欣曾经在《圣善阁送裴迪入京》中写到：“旧托含香署，云霄何足难。”<sup>[68]</sup>含香署指尚书省，京畿省等之类的官署，这里的香代表了朝臣的身份。中宗时代有一种高雅的聚会，贵族大臣们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韦温常得魁首，因为他“挟椒图所赐。”<sup>[69]</sup>这无疑只有拥有一定权势和地位的人才可以参与。

另外还有人利用龙脑香的尊贵和特殊假扮皇帝行骗。据《太平广记》载：

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綾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裹，引二小小仆。<sup>[70]</sup>

按这条记载，奸人之所以能假借皇帝身份行骗，其衣物、装扮必不可少，除此还必须熏有龙脑香，可见龙脑香代表了贵族阶层的身份，是上层阶级身份的象征。有人以此行骗，这也表明当时的社会共识认为龙脑香是皇室和权贵阶层所独享的奢侈品。唐宣宗时期曾下令废除了一个奢靡浪费的礼仪：“旧时人主所行，黄口先龙脑，郁金香地，上悉命去

之。”<sup>[71]</sup>说明这曾是皇帝出行的旧例。

除此之外，香料也是富有的象征。《新唐书》曾记载唐朝宰相元载被抄家时的情况：“（代宗）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sup>[72]</sup>在当时家中有胡椒八百石，约等于60吨，这并非是普通贵族可以做到的。除了贵族朝臣，商人们也常用香料彰显自己的地位，一位巨富王元宝就好与人相交，使用的器物比王公贵族还要豪奢，所以别人常常十分尊重他。他在寝帐前召二位童子，捧七宝香炉，燃之彻夜。<sup>[73]</sup>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在中古社会的地位并不算高，所以凭借珍贵的香料展示自己的地位，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综上所述，由于唐代国力强盛，外来香料在唐朝社会大量传入，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上都远超前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香料通过朝贡体系与香料贸易的方式来到中国，经由敦煌和广州两个重要中转点最终送达到宫廷和上层官僚手中。外来香料在许多方面都深刻的影响了唐朝人的社会生活，丰富了唐朝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增添了日常生活的情趣，提升了饮食生活的品质，减轻了疾病带来的痛苦，为宗教提供一种想象中的交流纽带等。唐人将香料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名贵的外来香料，尤其得到了上层贵族的追捧，香料因其独特的感官记忆也会成为人们追思往事的媒介，多年后时易世变，唯有此香袅袅依旧，使人感怀。对外来香料的喜爱也体现了唐人包容外物的开阔胸怀，外来香料的传入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缩影，是唐代丝路贸易的具体体现。

香料在唐代主要还局限于上层贵族社会使用，尤其是外来香料，虽然在饮食与医药方面已有下移趋势但仍有限制，随着宋明时期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香料贸易和香料使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化和平民化，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简介：务姗姗，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2023 届历史学（国学方向）专业毕业生。

指导教师简介：于志刚，河南永城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

参考文献：

- [1]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411.
- [2] 李珣. 本草纲目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1945.
- [3] 许慎原著，汤可敬撰. 说文解字今释 [M]. 长沙：岳麓书社, 1997:1114.
- [4] 程超寰. 本草释名考订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296.
- [5]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379.
- [6] 玄奘、辩机. 大唐西域记·卷十一阿吒厘国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907.
- [7]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 酉阳杂俎·卷十八·广动植之三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179.
- [8] 杜佑. 通典·卷一八五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5089.
- [9]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413.
- [10]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 酉阳杂俎·卷十八·广动植之三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177.
- [11]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卷八五·布帛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1456.
- [12] 温翠芳. 唐代外来香药研究 [D].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 [13]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420.
- [14] 李昉. 太平广记·卷四·月氏使者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155.
- [15] 权飞.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唐代香料新探 [J]. 农夫考古, 2016(4). 246-250.
- [16] 洪当. 香谱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4.
- [17] 洪当. 香谱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174.
- [18] 魏征.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波斯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1856.
- [19] 李昉. 太平御览·卷九八一·鸡舌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4345.
- [20] 杜佑. 通典·卷一八八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5103.
- [21] 毕波. 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 [J].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 2013(2):319.
- [22] 真人开元著，王向荣校注. 唐大和上东征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74.
- [23] 董诰. 全唐文·卷五五六·送郑尚书序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5616.
- [24] 真人开元著，王向荣校注. 唐大和上东征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47.
- [25] 真人开元著，王向荣校注. 唐大和上东征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62.
- [26]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 36 条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3.
- [27] 李昉. 太平御览·卷一五七·李景让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1126.
- [28] 全唐诗·卷二八五·春游乐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3240.
- [29] 全唐诗·卷四七〇·阳春曲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5377.
- [30] 全唐诗·卷一二五·洛阳女儿行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1258.
- [31] 全唐诗·卷一二五·同比部杨员外十五夜游有怀静者季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1261.
- [32] 苏鄂. 杜阳杂编.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1395.
- [33]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2885.
- [34] 欧阳修. 新唐书·卷一〇九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4104.
- [35] 李昉. 太平广记·卷一六·张老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113.
- [36] 刘幼生. 香学汇典 [M].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4:173.



- [37] 李昉. 太平广记·卷二三六·玄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1741.
- [38] 欧阳修. 新唐书·卷二〇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5763.
- [39] 王仁裕撰, 曾贻芳点校. 开元天宝遗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58.
- [40] 段成式撰, 方南生点校. 酉阳杂俎·卷一八·广动植之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179.
- [41] 苏敬撰, 尚志钧辑校. 新修本草 [M]. 安徽: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359.
- [42] 王说. 唐语林·卷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207.
- [43] 林洪撰, 章原编注. 山家清供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28.
- [44]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426.
- [45] 陶谷. 清异录.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27.
- [46] 贾思勰编, 缪启愉译注. 齐民要术译注·卷七·笨曲并酒第六十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518.
- [47] 李昉. 太平广记·卷一五三·李宗回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1097.
- [48] 全唐诗·卷一·送刘尊师祇诏阙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7391.
- [49] 全唐诗·卷四四九·赠朱道士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5082.
- [50] 苏鄂. 杜阳杂编.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1390.
- [51] 李珣撰, 尚志钧辑校. 海药本草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43.
- [52] 道藏·三十三册 [M]. 530.
- [53] 道藏·三十二册 [M]. 205.
- [54] 傅京亮. 中国香文化 [M]. 山东: 齐鲁书社, 2008:13.
- [55] 温翠芳. 唐代外来香药研究 [D].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 [56] 温翠芳. 唐代外来香药研究 [D].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 [57] 孙思邈撰, 魏启亮、郭瑞华点校. 备急千金要方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559.
- [58] 孙思邈撰, 李景荣等校释. 千金校方校释·卷三木部上品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54.
- [59] 孙思邈撰, 魏启亮、郭瑞华点校. 备急千金要方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674.
- [60] 李珣. 本草纲目·卷三四木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1936.
- [61] 李珣. 本草纲目·卷三四木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1962.
- [62] 李珣. 本草纲目·卷三四木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1965.
- [63] 李珣. 本草纲目·卷一四草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857.
- [64] 李珣. 本草纲目·卷一四草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882.
- [65] 董诰. 全唐文·卷二八八·谢赐香药面脂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2924.
- [66] 董诰. 全唐文·卷四五二·为郭令公谢腊日赐香药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4622.
- [67] 全唐诗·卷一二八·重酬苑郎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1296.
- [68] 全唐诗·卷一三四·圣善阁送裴迪入京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1364.
- [69] 王仁裕撰, 曾贻芳点校. 开元天宝遗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37.
- [70] 李昉. 太平广记·卷二三八·大安寺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1836.
- [71] 苏鄂. 杜阳杂编.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392.
- [72] 欧阳修. 新唐书·卷一四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4714.
- [73] 王仁裕撰, 曾贻芳点校. 开元天宝遗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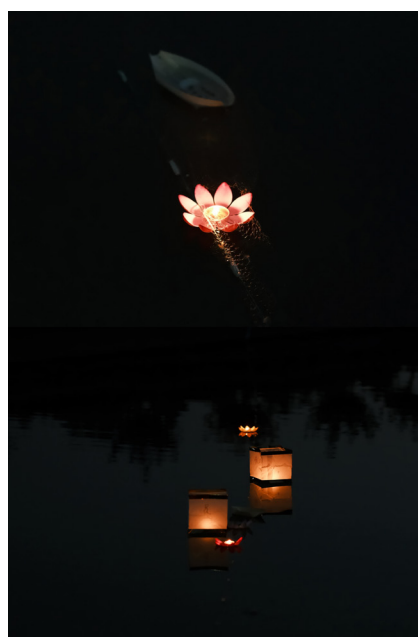
● 艺术空间 ●

归德府衙（摄影：高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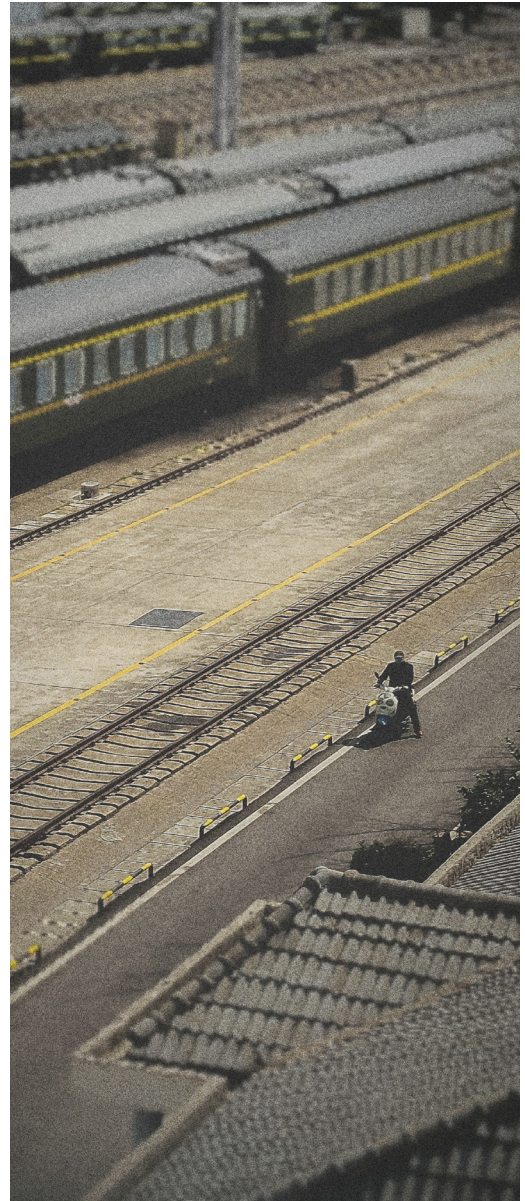


暮春上巳 (摄影: 孙佳等)





人间光影 (摄影: 李昊宸)



封面设计：朱长征

志道 弘毅  
乐知 笃行

应天文化季刊

(2022年创刊)

2023年夏之卷（总第6期）

总 编 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副 主 编：冯志伟 李卫军  
卢忠雷  
执行副主编：常丽洁 李瑞华  
本 期 编 辑：孙 佳 于志刚

主管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编辑出版：《应天文化季刊》编辑部  
E-mail: ytwbjk@126.com  
联系地址：河南省商丘市平原路55号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